

Title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
Author(s)	田中, 仁; 赵, 永东; 刘, 晖 他
Citation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75504
rights	
Note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20世纪30年代的 中国政治史

——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

[日] 田中仁 著

赵永东

刘 晖

刘柏林

江 沛

译校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资助

本书译自日本劲草书房 2002 年版《1930 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 中国政治史

——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

[日] 田中仁 著
赵永东
刘 晖
刘柏林
江 沛 译校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政治史: 日文/田中仁著; 赵永东、刘晖、刘柏林、江沛译校. -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688-311-2

I.2… II.①田…②赵…③刘…④刘…⑤江… III.①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1920~1930-日文②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20~1930-日文
IV.D693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423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天津市雍阳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绪 言	(1)
一、本书主旨	(1)
二、学术史	(3)
三、视角与方法	(9)
四、本书结构	(12)
第一部 革命战略的转型	
第一章 根据地构想的展开	(17)
一、东征与统一战线工作	(17)
二、红军会师与西安新形势	(25)
三、西安事变与陕甘宁边区成立	(31)
结 语	(39)
第二章 党、军队、“国家”	(41)
前 言	(41)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党军政关系	(42)
二、党组织的分裂及其整顿	(50)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党军政关系	(59)
结 语	(68)
第三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	(70)
前 言	(70)
一、苏维埃革命路线与反日问题	(70)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构想	(78)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革命”	(89)
结 语	(96)
第二部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与中共的白区工作	
第四章 平津地区	(99)
前 言	(99)
一、一二·九运动与平津地下党	(99)
二、中共的统战工作与刘少奇	(105)
三、白区工作与华北的新形势	(111)
结 语	(114)
第五章 上海	(115)
前 言	(115)
一、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116)
二、路线“转变”与“临委”的成立	(118)
三、救国会与上海地下党	(124)
四、“全救”的成立与政治形势	(131)
五、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形成	(136)
结 语	(142)
第六章 西安	(144)
前 言	(144)
一、《八一宣言》的传播与“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	(146)
二、“西北大联合”构想与“三位一体”的成立	(153)
三、西安事变与中国政治的转变	(160)
结 语	(166)
第七章 武汉	(168)
前 言	(168)
一、全面抗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69)
二、“临时首都”武汉的诞生	(176)
三、保卫“大武汉”与长期抗战的准备	(187)
结 语	(194)

第三部 领导人群像

第八章 王明	(199)
前 言	(199)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	(201)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实践	(209)
三、“昆仑山的神仙”及其挫折	(218)
结 语	(227)
第九章 张国焘	(230)
前 言	(230)
一、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长征	(233)
二、第二中央的建立及其失败	(238)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张国焘	(247)
结 语	(256)
第十章 毛泽东	(258)
前 言	(258)
一、权力中枢的参与和军事指导	(261)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军事问题	(267)
三、全面抗战与领导权的确定	(273)
结 语	(277)
终 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共的危机与新生	(280)
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312)

序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田中仁教授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已由日文译成中文，就要和广大中国学人见面。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书籍的交流永远是最有影响力的。这部书一定会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共鸣。

我和田中教授相识与来往，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深知他是一位有作为、有正义感的学者。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的事。那时日本学界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访华团，团长是池田诚先生，顾问为芝池靖夫先生，事务局长为西村成雄先生，副团长为林要山、安井三吉、山本恒人诸先生，秘书为太田秀夫、久保亨、加藤弘之诸先生。事务组成员有铁山博、张壁东，团员有田中仁、田尻利、大谷正、吉田絃一、奥村哲、副岛昭一、石岛纪之、古厩忠夫、田中慕子、松野昭二、铃木滋、松野周治、锻冶邦雄、石田浩、三次惣次。田中仁先生是代表团中较为年轻的学者之一。他们来到南开大学，与我们中国现代史专业的教师共同举行学术座谈，我于是和田中仁先生相识。

第二次见面是1984年春天。我从美国讲学归国时，池田诚代表关西区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和立命馆大学，邀请我到东京和京都访问演讲。我和内子先在东京中央大学演讲，受到野泽丰等数十名史学家的款待，逗留了三天，然后到京都，和池田诚、芝池靖夫、西村成雄、田中仁四位先生朝夕相处，畅谈数日。学术的交流和谈心，把我们连结起来。池田诚曾说，他与我们的交流主要由西村成雄来承担。此后我们多次见面，并彼此以书相赠，切磋琢磨，相互勉之。我们相约：以学术交流架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田中仁先生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有一种强烈的、浓厚的、持续不断的兴趣。这部书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

产党的危机和再生为主题,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产品。

该书开宗明义地讲:“本书的主旨在于,从不同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政治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结构中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及实态予以清晰地把握与阐释。”从全书结构和对一些问题的表述上看,作者实现了自己的旨趣,有自己研究的独到之处。

选择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做研究,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此时,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逐步进行军事扩张,中国处于严重危难之际,最需要全国集中力量对付外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面对日本侵略,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南京政权,在国内以“党国”体制为中心,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种资源实施高度集权,没有充分考虑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于是在外交政策上步步退让,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及野心的膨胀。不少有识之士、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及部分地方实力派的抗争,或被镇压或被压垮。此时,中国共产党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政策,在南方诸省交界地区建立起大片苏区根据地,以武装割据形式对抗国民党的统治。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尚属稚嫩,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王明等缺乏对中国国情的真实了解,却代表共产国际发号施令,造成中共政策的诸多失误。1934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江西苏区及其他各根据地相继失陷,中共及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中国革命陷于低潮。长征途中,又出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及红军的严重局面。中共及红军主力进入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幸而共产国际正确地倡导统一战线,确认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中共又适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展开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政策,暂时缓解了中共的生存压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再次体现了中共群体高度的政治智慧,从此开辟了国共结束内战、携手合作的途径,中共得以由此基本解除生存危机,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走向复兴。中共历史上这一极其复杂的生存及再生期的研究,历来是考察中共党史的关键所在。田中仁先生对此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思考,以“从危机到再生”六个字概述,是非常恰当的。

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是通过客观真实的描述,进而接近历史真相。田中先生多年来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包括档案文献、当事人的著作和回忆录,以及现代学人的著作,不倦地研修,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那个时代国内外相互交织的诸多政治、社会因素作了细致的考察,对每一事件发生的原委进行梳理,产生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其中有的认识是从资料中引申出来的,有的是受到他人成果的启发,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研究体系并形成一些独特的思考。作为一位日本学者,能对中共党史的关键时期有如此精深理解与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我期待作者在中国现代史领域中有更多的著述出版。

魏宏运谨识

2007年6月22日于南开大学西南村猗斋

自序

我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1981年提交的硕士论文《关于陈绍禹(王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的形成》。当时,日本正兴起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热潮,因而《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2卷)、《毛泽东集》(10卷、中文)、《王明选集》(5卷,中文)等文本资料相继出版,东洋文库(东京)也收集了包括俄文、英文版在内的王明的全部相关资料。我的硕士论文即在整理王明著作版本的基础上,尝试着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王明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实证性研究。

1982年夏,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组织了访华团,我是其中最年轻的团员,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开始了与中国学术界交流的第一步。1986年,拙稿《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刊发于《党史研究》,由此得以与诸多的中国学人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1985年后,我的研究视野逐渐从王明个人转向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与中共这一政治势力发展的相关领域。

本书的具体构思形成于1986~1989年间。那时,本人作为日本文部省(现称文部科学省)的在外研究员,得到了在中国研修的机会。在半年的时间里,李良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对我的研究计划给予了指导;与杨奎松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当时)进行了定期讨论;从虞京海先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当时)得到了教诲及上海地下党关系资料;章开沅先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当时)为我提供了在武汉较好的研究环境。这些都是我研究得以进行和不断具体化的重要动力。另外,1989年和1991年在南开大学先后举办的两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的发言机会,也是我重新思考自己观点的宝贵机遇。

本书日文版于2002年7月由日本劲草书房(东京)出版。2004年3

月,本人通过该书获得大阪外国语大学授予的博士(国际学)学位。

十几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东亚尤为显著,中国的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受此影响,目前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发生着新的、质的变化与发展,这是每逢学术交流活动都会产生的实际而深刻的感觉。为能适应这样的新环境,并在构建东亚知识共同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愿更加努力,深化研究。

田中仁

2006年12月于日本大阪

附记:对长达25年之久,一直热情鼓励我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魏宏运教授,为本书翻译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的江沛、赵永东、刘柏林老师和刘晖同学,同意出版中文版的日本劲草书房和中国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及赞助出版的大阪外国语大学表示诚挚的谢意。

绪言

一、本书主旨

本书主旨在于,从不同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政治史角度,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政治结构中主要力量之一的中共如何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及实态予以清晰的阐释。

1928 年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国民政府,通过 1930 年中原大战的胜利,确立了其对中国政治的领导权。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民族意识”,因“抗日救亡”的舆论而上升为中国政治的“普遍意志”,直至 1945 年抗战结束,在 15 年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①。抗战时期(1931~1945),是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史(1928~1949)中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阶段,同时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抗日民族意识”的增长,对于此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规定性的作用,主要的政治力量都将“抗日救亡”作为首要的课题。抗战的前半期,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并未完全形成,而在后半期,全民族抗战的基础已然形成,持续抗战的局面不断强化,战后中国政治走向也渐渐明朗,前后期在内容上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从 1935 年“华北事变”开始,历经 1937 年 9 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到 1938 年在“临时首都”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及召开国民参政会,这段时期不仅仅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战时体制的转折期,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史的重要转折期。

众所周知,以 1935 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为契机掀起的民众救亡运动热潮及 1936 年的“西安事变”,都在促使中国政治体制向战时体

^① [日]西村成雄:《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二〇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東京:研文出版 1991 年 9 月版,第 59~71 页。

制的转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由于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意识到了“抗日民族革命”的重要性,由此摆脱了自身的危机,并在 1949 年获得了国家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政治路线具体化的开端清晰可见。

表 1: 中国共产党历年党员数量表(1921.7~2001.7) 单位:人

年 代	数 量	年 代	数 量	年 代	数 量
1921.7	57	1946	1350000	1957.9	12720000
1922.7	195	1947.1	2220000	1958.11	12450000
1923.6	420	1947.12	2700000	1959	13500000
1926.1	994	1948.7	3000000	1961.6	17000000
1927.4	57900	1949.12	4500000	1969.4	22000000
1927.7	10000	1950.6	5000000	1973.8	28000000
1928.7	40000	1950.12	5800000	1977.8	35000000
1930.1	65000	1952	6000000	1982.9	39660000
1934.10	300000	1953.10	6380000	1987.10	46000000
1937.7	40000	1954.2	6500000	1992.10	50000000
1940.7	800000	1955.2	7000000	1997.9	58000000
1942.7	730000	1956.6	10730000	2001.7	64000000
1945.4	1210000	1956.12	12000000	2002.12	66000000

资料来源:马宇平、黄裕冲主编:《中国的昨天与今天:1984~1987 年国情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85~686 页。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 页。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

由表1可知,1934年10月、1937年7月和1940年7月,中共的党员数量有一个由30万下降至4万再上升到80万的变化过程——30万党员是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时期,4万党员则是在苏维埃区域(以下简称“苏区”)解体且中共面临生存危机之时,80万党员是在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起因、在抗日战争形势下中共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力量壮大的象征。本书的主旨就在于,分析在中国政治史由国民政府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的转变期(1935~1938年),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克服生存困难、重新焕发生机的实态。

二、学术史

所谓“不同于中共党史、革命史的政治史”的概念是什么呢?以往的研究,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危机与再生是怎样理解的呢?

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1年,在中共中央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所收入的文章中^①,毛泽东亲自对其思想体系加以系统的修改^②。胡乔木在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依据《毛泽东选集》对中共历史进行了评价,这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的“定论”。这一“定论”的基本框架如下:

1.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的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主义势力。由此,可以理解以西方冲击为契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① 1950年,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组成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对所收录的文章进行了修改、讲解和注释工作。1951~1953年和1960年,《毛泽东选集》4卷先后出版(共收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表的文章158篇)。1962年,选集的修改工作重新开始,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直至1991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的第2版。与第1版相比,新收入了《反对本本主义》,部分文章的校订与注释进行了修改。1977年,在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将毛泽东写于1949年至1957年间的70篇文章编成《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当前,这本书并未得到正式的认可。

^② [日]今堀誠二:《毛澤東研究序說》,東京:勁草書房1966年版,第4頁。

义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到完结的过程。

2. 这一革命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外战争、农民战争、政治改革、大众的民族运动、革命运动(战争)等^①。五四运动之前,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之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3. 1927年的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接受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战略指导,直至获得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1935年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党内领导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叛变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是新军阀,它没有民族性和近代性。因此,在将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同时,革命的主题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4.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半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由于中国政治激进化和“左”倾错误思潮影响严重,农村武装斗争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被大大地突出。由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完全被作为政治史进行解释,政治史就是革命史,革命史实际上又被中共党史所替代,而中共党史又被解释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其他一系列“错误路线”间的“路线斗争史”。

一般而言,中共党史、革命史与政治史间的关系是:党史应属革命史的范畴,革命史又应属政治史的范畴。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最初基本上是以《毛泽东选集》和1945年及1981年中共中央的两个“历史决议”为基准,以党的组织性结论作为基本框架对其发展过程进行论述。中国的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被解释为“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

^① [日]横山英:《辛亥革命研究序说》,广岛:新历史研究会1977年版,第13页。

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全国各族人民大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①。换言之,在中共领导下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历程,就是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1959年,李新等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前言中提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②。由此,作者已经显示出将中共党史与革命史作为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即是政治史一部分的思路。

1950~1970年间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如前揭胡乔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③、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④,包括倡导“整体历史”观的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为代表性著作,实质上都具有在《毛泽东选集》影响下考察历史或再解释的基本特点。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80年起,随着大量相关资料陆续整理出版^⑤,大量相关实证性的研究成果日积月累,对外学术交流也在迅速展开着。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中共党史、革命史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无论是成果还是环境都发生了崭新的变化^⑥。

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危机与再生问题,中共权威的《中国共

① 李新、陈铁键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长编》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1980年再版。

③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 陈夕:《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编纂概况》,《现代中国研究》第4期(1999年),第104~112页。

⑥ 参见方晓主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上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曾景忠主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等。

产党史》做了如下概括：

1. (1928~1930年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

2.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①

这本著作，不仅大量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也对3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进行了系统化阐述，特别强调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权的确立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再生——的根本保障意义。源自于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的认知体系——特别是中国革命真正开始于1927年后武装割据的“井冈山起点说”^②——也在此书得以确认。这一党史研究体系，体现在以国内外资料为基础而执笔写作的革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长编》(12卷)中^③，从经济史角度重新评价国民政府的观点，以及倡导纳入更多新课题的“整体史观”的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④和《新编中国现代史》^⑤等论述中，这些成果都是本研究的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388页。

② [日]古殿忠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と發展》，東京：《歴史評論》第243期，第72~96页。

③ 李新、陈铁健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张宪文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 郭绪印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基本前提。

战后日本对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是从无条件地接受中共党史“定论”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以亚洲暨福特财团的问题^①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为契机,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态势开始有所改变。今堀诚二从不同版本《毛泽东选集》所收集文献入手,通过分析原文,对注重阶级划分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认识与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考察,试图由此把握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逻辑。中西功也通过对中共“六大”、“七大”和“八大”的不同纲领及其政治主张与中共发展过程的概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战争史观提出批评。与此同时,中西功通过自身的中国体验与日本现实政治问题相联系进行考察,突出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些所提到的成果,代表着当时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向。此外,从中共成立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史学界还翻译、收录了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资料987篇^②。由竹内实监修的、以原文形式对1917~1949年间毛泽东429篇论著进行的整理工作,与中国1949年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文献有着明显的差异。所有这些工作,为推动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可参见田中正俊等所著书的概括^③:(1)从更广泛的视野考察民众斗争;(2)着眼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和城市民众的动向;(3)评价国民政府的积极作用等。研究成果中包含有着相当数量的与“定论”不同的新的研究方向的论文^④。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国史开始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国

① 1962年,亚洲福特财团所资助的中国研究,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间引起极大争议。有人认为,这些资助的研究对学者自主的研究与日中学术交流并无大碍,但有人认为,这些研究的资助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远东政策而设立,不应该接受。通过这些争论,也可以对日本在战前与战后有关中国研究的方法与倾向有所了解,成为进行再探讨的契机。

②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12卷,東京:勁草書房1970~1975年版。

③ [日]田中正俊、野澤豐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第7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版。

④ [日]久保亨:《“天安門”以降の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東京:《歷史評論》第500期(1991年),第303~313頁。

民政府所具有的民族性及其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得到了认可^①。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对1949年中共的胜利进行了多方面考察,相关成果有了较多的积累^②。由于对中国革命史面貌认识的相对化倾向,对于1949年中国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中共的军事胜利,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尽管与传统的“定论”不尽相同,但其尚未勾勒出中国革命史的全新面貌^③。

日本学者中西功提出了与前揭“井冈山起点说”相对照的论点:

1.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认识到,“半殖民地”社会的条件及其政治、经济的不统一性,是红色根据地得以存在的决定性条件。这种对城市与乡村的革命斗争的不平衡性及全国敌我力量的分析,还不能揭示红色根据地得以存在、发展的全部条件。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厉行对以往军事战略的批判,仍然认为保卫苏区是当前首要的任务。在此,还看不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端倪。

3. 1937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首次对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制度与人民大众间的矛盾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中国“半殖民地社会论”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演变,至此,毛泽东才有了民族解放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的观点^④。

受中西功观点的影响,古厩忠夫认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

① [日]笹川裕史:《中國國民政府研究》,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版,第49~68頁。

② [日]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版。

③ 有關“中華民國史”與“革命史觀、中共史觀”的相互關係,以及軍事問題在其中的地位等問題,參見[日]姬田光義編著:《戰後中國國民政府史の研究:1945-1949年》,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年版,第1~28頁。

④ [日]中西功:《中國革命と毛澤東思想》,東京:青木書店1969年版,第197~228頁。

成,是由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及中共的政策与实践三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构想为媒介,实现了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过渡的系统化^①。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安井三吉,他认为,通过相关文献的分析,从抗日战争的性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位和未来国家政体构想这三点来看,中共的革命路线的确定期应该是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②。

综上所述,本书旨在借鉴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初日本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的观点与方法,试图对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实态进行解析。此外,对苏维埃革命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一个明确的划分,这是由于各个时期面临的革命对象、政治战略目标以及形势判断都不尽相同,今井骏对此也有非常明确的看法^③。与重新解释中国革命史结构的课题相关联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的系统化及其条件应该得到充分地考察,这是本书的重要论点之一,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参见本书第10章)。

三、视角与方法

本书视角的设定、分析方法的确立,是用以下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

第一,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运行轨迹是在专制主义(1900~1912)、军阀主义(1912~1928)、民族主义(1928~1949)和社会主义(1949~)四个阶段间进行转换的,西村成雄认为它是围绕国家建设(制度化)、民族与

① [日]古殿忠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と發展》,東京:《歴史評論》第243期(1970年),第72~96页。

② [日]安井三吉:《抗日民族統一戦綫と中國共產黨の“路綫の確立”》,東京:《歴史評論》第243期(1970年),第97~117、124页。

③ [日]今井駿:《中国革命と對日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戦綫史研究序説》,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13~35页。

社会的整合(社会基础的确立)的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①。本书所要考察的20世纪30年代,应该属于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不尽相同的前提是,第三阶段中国政治的基本特性是民族主义的,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整合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第四阶段,中国政治有了一些新的特性,是社会与民族整合的并行推进过程,这两个阶段的交叉点,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只有清晰地理解了这一关系,才能理解本书着重对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基本形态进行剖析的价值与意义。

西村成雄还进一步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域权力、地域社会间的相互浸透关系来把握,描绘出了一幅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鸟瞰图。笔者认为,由中央政府权限的让渡来寻求统治的合法性的地方政府和由地域社会的认同而来的地域权力是不尽相同的,承认这一点,是考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意义一个极有价值的视角(参见第二章)^②。

第二,从杨奎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方法与表述,其对利用原始资料所做的严密论证以及在构建新的历史图像过程中,始终体现着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思路。也就是说,要把中共的政治选择放在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过程中去考察,中共之所以选择极其现实的方针,是由大量的原始资料可以证明的。另外,杨奎松也持有与前揭“井冈山起点说”所象征的“定论”的框架有关系的立论。他认为,

① 参见[日]西村成雄:《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二〇世紀中国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東京:研文出版1991年版,第49~51页。

②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政治史研究(民国时期)中的基本概念。例如,在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1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2年版)中,这两个词语均大量使用。而从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来看,几乎没有这两个词语。这是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共力量列入“归顺”的地位。笔者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应有状态,是考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史各个重要课题的关键所在。在本书中,笔者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使用了引号,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政策体系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如西村成雄所言,这种主张包含着实现对社会、民族整合的志向和实实在在的内容,所以笔者没有使用引号。

“井冈山起点说”和“定论”是成立的,将其本身作为归纳考察的对象并进行具体的论述,由此成功获取作为一般性政治史研究的“特性”。尽管研究对象涉及中共党史的全部,但是能够发现其采纳方法的一个特色。正如探讨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国共谈判的过程^①,中共与张学良的关系^②,以及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等那样,都是把中共的主张、活动与第三方的关系作为考察的对象。这样一来,以置身于上述诸多关系之中的中共这一政治势力自身发展实态的解析为目标进行探讨,亦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书充分吸收了杨奎松的研究成果,特别注重对20世纪30年代中共发展实态的考察。与杨奎松认识相同的观点有:(1)20年代末以后,指导游击战争的毛泽东在莫斯科声望日高,而这却是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加以排斥和抑止的结果^③;(2)西安事变前后,中共的统战工作赢得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真正的同盟者”,但这一成果的获得,却不是照搬使用“军阀”这一概念的莫斯科指导方针的结果^④;(3)1938年,深知因王明(陈绍禹)的作风而引起中共领导层内部摩擦的共产国际,指示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进行整顿^⑤;(4)1939~1941年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莫斯科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发生转变及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展开,使得莫斯科与中共(毛泽东)

^①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及《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在这些著作中,杨奎松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共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共的基本主张进行了具体论述。

^③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91~411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24~429页。

^⑤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80页。

在政策层面出现分歧^①,这是要予以特别注意的一点。

第三,日本学者加藤哲郎指出了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世界纲领”^②的诸要点,一边试图重构共产国际作为“世界政党”的历史形象^③。加藤哲郎还将共产国际史进行了如下划分,第1期:1919~1923年的“革命形势”期(“直接革命的危机”期与“初期统一战线”期),第2期:1924~1928年的“相对稳定”期(“布尔什维克化”期),第3期:1929~1933年的“大恐慌”期(“社会法西斯”期),第4期:1934~1943年的“法西斯与战争”期(“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与肃清”期)^④。在此基础上验证“世界纲领”的形成过程及其自身的特质与构造,并通过研究面向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转换,进一步认识纲领的“特质”。在此书中,第一,对与其他时期性质不同的第3期共产国际的组织与特质有了较为明确的阐述;第二,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纲领性质的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受到了限制——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无谬性”的确认,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包含着承认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理论,“自由”、“民主主义”等概念的意义转变,作为对苏联新宪法进行积极评价的前提而被提出——加藤哲郎反复斟酌当时诸种观点,既阐明了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隶属于共产国际的实态,又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四、本书结构

本书第一部分“革命战略的转型”共分三章。在第一章中,考察了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11页。

② 《共產主義の世界綱領》,[日]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4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年版,第325~368页。

③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

④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57页。

中共失去了南方苏区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经过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三位一体”关系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时期对其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构想的演变过程——对何时确定陕北地区作为中共革命运动策源地的时间——进行探讨。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的组织结构——党、军队、政权关系——开始从中共、红军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合,转变为中共、八路军与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三者的构成。第二章,考察了上述中共党政军关系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建制变化特征。第三章以前两章为基础,重点探讨使中共从危机中再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共在此过程中是如何放弃苏维埃革命路线并获得“抗日民族革命”认识的。

本书第二部“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与中共的白区工作”共分四章,主要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在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的实态及活动状况,进而观察处于向“抗日时期”转型的中共组织在各大城市的恢复及发展过程。第四章讨论了作为“一二·九”运动大舞台的平津(北平、天津)地区,第五章考察了展开救国会运动的上海地区,第六章分析了发生西安事变的西安地区,第七章则对 1938 年曾作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的武汉地区进行研究。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政治结构相关联的诸种要素,如中国政治形态的巨变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学生、知识界与市民阶层的动向,租界所扮演的角色,国民政府中央集权化的进展与地方实力派的对抗,从内战走向合作的国共关系的展开等,其与中共的相关联系是必须加以考察的。同时,本书也试图对以往因中共在军事与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的侧重而产生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

本书第三部“领导人的群像——协调与纠葛”共分三章。对这一时期中共的三位领导人王明、张国焘和毛泽东所发挥的作用,当时中共的实态及所面临的政治课题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王明(1904~1974),1925 年加入中共,1931 年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由此取得了对中共的领导权。1931 年秋,王明访问苏联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中央局中担任指导中共的角色。张国焘(1897~1979),参加了 1921 年中

共的成立大会,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大”。1931年1月,张国焘回国后担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2年10月,率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移动,并进行川陕苏区的建设。所以将王明、张国焘与毛泽东(1893~1976)一起列为考察对象,是由于王明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上的代表人物,而张国焘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数量上都远远优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此外,在传统的“定论”中,一直存在着“王明左倾路线”(1931~1935年)、“王明右倾投降主义”(1937~1938)、“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1935~1937年)这样的评价。本书从与党史、革命史有所区别的政治史角度,分析上述人物的作用、其与传统评价不尽相同之处,力求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上重塑这些人物的形象。

第一部 革命战略的转型

第一章 根据地构想的展开

——由军事保障到制度保障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中共党史学界修正了以往那种在长征初期的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就确定了“北上抗日”方针、长征的目的地是陕甘宁(陕北)地区的传统说法,当时红一方面军一边探寻与第二、第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的合作,一边为寻找新的根据地而进行转移,只是在了解到位于陕甘交界的苏区仍然有红军活动时,长征的目的地才真正确定下来^①。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本章将对陕北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策源地的观点及其阶段进行考察。如果先下一个结论的话,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西安事变时期实质上就已确立,特别是由于1937年9月下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从一种“构想”向具体的现实的转化。

一、东征与统一战线工作

1. 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与东征

1935年6月,在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汇合之后,红军共有10万余兵力。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8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将这一决定加以具体化^②,此时,中共中央对陕北尚无明确的认识。9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与反对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分道扬镳,率所部七八千人进入甘肃,他们认识到:“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的中心,在

^① 王庭科:《红军长征研究》,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43~63页。

^② 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71页。

现阶段来看,可能性是很小的”,并将当时的战略方针修改为“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①,显然,保存兵力的目的与方针都发生了变化。

9月20日,北上部队将到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的先头部队改编成陕甘支队^②。根据在当地了解到的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陕甘支队再度改变方针,决定前往陕北苏区^③。也就是说,在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确立“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方针^④,由此决定将陕北地区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⑤。11月初,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第15军团会师后,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名称。

然而,榜罗镇会议虽然决定了“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的方针,却并不意味着就此确定了陕北地区即为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因为,第一,自1934年10月红军丢失瑞金后,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为了获得新的机遇,中共转变革命路线的急迫性日益增加。但1935年10月29日发表的《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声明:“我们经过了上万里的长途远征……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第十五军团)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⑥从这份文件中并不能看出路线转变的意向。第二,这一时期,除陕北地区的万余名红军部队外,红军主力还有在四川北部活动的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和转战湖南、四川、贵州等省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约1.7万

①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③ 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④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⑥ 《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2~583页。

余人^①。此时,以陕北的中共党组织“从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参见第九章)。第三,由于陕北地区面积狭小、人口较少、粮食及工业品不足等地理与经济条件,万余红军的给养以及红军的再扩大都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11月中旬,中共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张浩在传达与中共政策转变相关的共产国际重要提案的同时,认为共产国际并不反对红军主力向北及西北地区展开及接近苏、蒙边境的做法,据说这也是斯大林的意见。此后,中共就以红军主力到达苏、蒙边境并获得苏联的军事、技术援助为目标,其“国际路线”得以具体化。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②、《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③,决定红军经山西进入绥远以实施“国际路线”^④,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2月开始的东征战役,就是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发起的,但是,因为蒋介石在3月向山西派出了中央军部队,5月,红军退至黄河以西。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

②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597页。

③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23页。

④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以前的版本——如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北京:编者内部版)等——均省略了一些地方,对照中央档案馆所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0册是很明显的,文件集所收入这一决议,与以前的版本在用词上也有明显不同。如《六大以来》下册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两处提及“打通抗日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0册中却是“打通苏联”的字样。此外,《六大以来》下册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省略的部分中,有苏军与红军共同实现上述战略的字样以及为实现“打通苏联”任务的具体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0册,第595~597页)。《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0册的注释称本来决议即有。《六大以来》下册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将“打通苏联”的部分改写成“打通抗日路线”,可能是由于这一口号与省略部分相抵触的原因。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仍然沿用《六大以来》下册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的说法。

这一期间,有关“从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观点曾发生了三次动摇。第一次,1935年11月20日与25日,张闻天(洛甫)致信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提出了进攻宁夏、夺取五原、包头等接近外蒙边境地区以建立根据地的意见。对此,毛泽东与彭德怀提出了进攻宁夏的难度很大和在山西迎击阎锡山的晋军及此后谋求绥远的见解,因此张闻天的意见并未成为现实。第二次,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①这一方针由于要从陕北苏区脱离,而在党内引起了失去根据地的忧虑。1936年1月底至2月初,中共中央把实现与苏联的合作视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提出当前要着眼于红军与苏区、游击区的扩大,并对此进行整顿^②。第三次,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决定经营山西的基本战略方针及红军向河北、河南和绥远等地展开^③。这一方针以及由此展开的东征战役,因为蒋介石调集大批中央军进入山西而受阻。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过以后,中共对四面的“剿共”军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后述)。对于依靠军事力量在陕北进行维持的中共来说,提供了在政治上保障苏区存在的新的可能性。

2.“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

共产国际“七大”新的方针,促使中共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相关认识,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共开始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提出了与周边的地方势力相互结盟,在政治上保障了陕北苏区存在的新的设想,并展开了系统的统战工作。

^①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57~359页。

^③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页。

1935年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由副总司令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张学良所率的东北军从河南、湖北移至西北地区^①。9~11月间,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东北军三个师被重创,而南京方面反映冷淡,这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其自身以及东北军的前途。1935年底,张学良会见了当时住在上海的反“满”英雄李杜,委托他与中共进行接触。1936年1月,张学良还到上海虹桥疗养院,慰问了东北出身的爱国人士、因《新生》事件而名闻一时的杜重远,并向杜重远吐露了自己的心情。此时,对张学良及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刘澜波、栗又文、苗淳然、孙达生、刘鼎等^②,利用各种途径赶赴西安^③。1936年1月,在与红军榆林桥战斗中被掳的高福源等被释放回来。张学良为寻求与中共代表的谈判,再次把高福源派往陕北苏区。中共决定由李克农与张学良协商。与此同时,争取张学良与东北军成为中共统战工作的重点和所能期待的最重要成果。1月20日,张学良与李克农的会谈开始。张学良提出,在东北军与红军现驻扎地间开始建立起经贸往来的关系。2月,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与李克农会谈中,达成了在第67军与红军间停战、通信、通商的意向。3月5日,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的会谈中,双方商定在西安设中共常

①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②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页。参见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26页。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240页。

③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6页。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221页。

驻代表^①。

这一时期,身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9月~1933年4月)期间曾重用过的秘书长南汉宸,此时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工作,他通过第17路军(西北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向杨虎城传递了中共《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杨虎城接受了宣言,为了与中共的合作具体化,他向南汉宸提出派遣人员的请求。南汉宸把王世英派遣到杨虎城处。中共中央又把汪锋派到杨虎城处以探寻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让他担任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②。

在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间形成友好关系的新形势下,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了延安会谈(王以哲、刘鼎、李克农等列席)。会谈期间,双方回避了对蒋介石更深一层的分析,认为当前中国政治中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此,红军与东北军间应该实现事实上的停战,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王以哲间应该保持畅通的交流渠道。延安会谈意味着中共、张学良(东北军)与杨虎城(西北军)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初步形成(参见第六章)。

西北地区是中国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大量东北军士兵及家属的涌入,对杨虎城及陕西社会各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由于都是蒋介石意欲打击的“杂牌军”,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具有共同的生存危机感。此外,由于华北事变的发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在刺激中增长。以此为契机,张、杨间良好的关系逐渐形成,而且,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工作,也对他们间友好关系的加强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使得陕北苏区的政治性保障有了可能性。

^①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388页。参见黄启钧:《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三次“洛川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米哲沉著、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4页。

3. 红四方面军的动向

1935年9月,率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一部约8万人南下的张国焘,在阿坝会议上指责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的行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主张采取南下的“进攻路线”^①。15日,张国焘又提出了“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甘川陕的先决条件”^②。而且,到10月7日,更提出了南下天全、芦山的“绥崇丹懋战役计划”,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击溃杨森、刘文辉6个旅并占领了懋功、丹巴地区^③。15日,由于军事作战进展顺利,张国焘宣布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并发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党籍的命令^④。此后,红四方面军为从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成都平原展开,发动了“天芦名雅战役”,并于11月中旬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但在百丈的消耗战后,更大的进攻已是不可能^⑤。红四方面军致力于当地党组织、政府和军队的建设,由于这一地区是藏族聚集地,在短时期内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参见第九章)。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制定“康道炉战役计划”,并决定从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撤退。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退至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到大草原的地区^⑥。

3月15日,张国焘指出:“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够和敌人拼消耗”,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② 《红四方面军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225页。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341页。

④ 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⑤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44页。

⑥ 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计划^①。25日,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向转战贵州、云南等地的红第二、六军团,发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合流的指示^②,这就为红军主力三大部队的汇合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大大分散了南京国民政府对陕北苏区的压力^③,并有利于红军主力会合的可能性。在张国焘方面,红四方面军从南下时的8万人减少至4万人^④,和前述陕北的“三位一体”关系的初步形成及对红军的影响相比较,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实力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变化与其说是起因于毛泽东和张国焘军事指挥能力的优劣,还不如说是统战工作的成果。

这一时期,张浩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1936年1月16日,张浩的调停人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⑤。对此,张国焘不得不致电张浩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⑥。24日,张浩承认陕北的党组织代表中共,把毛泽东、彭德怀的北上行动置于共产国际的名义下,并且给张国焘发出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的电报^⑦。作为回复,张国焘称“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

① 《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398页。

② 任弼时:《二、六军团从湘鄂周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39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175页。

④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⑤ 《共产国际派林育英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⑥ 《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名义致国际代表林育英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

⑦ 《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原则上一致赞同”，但有补充与修改之处^①，并提出了相应的组织问题提案^②。由于张浩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认可了陕北中共党组织及其政策，张国焘不再坚持原有的立场，但他仍试图通过双方关系相对化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

二、红军会师与西安新形势

1. 西征战役与共产国际的8月指示

针对“三位一体”初步形成以及第四方面军与第二、第六军团北上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心以“三位一体”为基础，实现“西北大联合”，并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5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口号，“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以下所摘录的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间的电报，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当时形势与战略方针^④。

(1)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2)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

① 《张国焘对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决议的补充与修改致林育英、张闻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② 《张国焘主张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致林育英、张闻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332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96页。

④ 《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二、四方面军诸同志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1页。

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

(3)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1936年5月,蒋介石计划对陕北苏区发动新的攻势,其主力部队的部署,在东面是其嫡系部队与阎锡山的晋军,南面是东北军与西北军,西面由宁夏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负责。中共则相应地确定了“三大任务”: (1)向西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2)向南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 (3)东面坚决地进行游击战争,以抗击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进攻^①,并制定了以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队为主攻目标的“西征战役计划”。18日,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出对“二马”部队驻屯的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展开进攻的“西征战役计划行动命令”,从20日行动正式开始。剿共总指挥部部署由东北军的部队防守环县、曲子地区。26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②。6月20日,中共中央确定了“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③

由于西征战役的实施,到8月末,陕甘宁苏区扩大到北至盐池、定边,南达甘肃的合水、庆阳、固原以北,西临黄河东岸,东西长600公里、南北长300公里的广大面积^④。

① 黄明发:《关于红军西征战役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37~38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③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85页。

6~7月,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一直中断的无线电联系得以恢复,陕北与莫斯科间可以进行直接的通话。随即,中共中央将统战工作的状况以及“西北大联合”的构想,向共产国际做了全面而具体的报告^①。8月15日,根据这一报告,共产国际提出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及停止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认为“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做是可靠的盟友”^②。由此,“西北大联合”构想被迫停止,与东北军的“同盟”关系,也不得不按照新的方针重新确定。

8月25日,中共在致国民党的公开信中呼吁:“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为实现抗日救亡进行两党合作^③。此外,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党内指示,提出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④。9月17日,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发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确认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目标而斗争的党的方针^⑤。而这一切政策变化,均是根源于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

2. 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与“宁夏计划”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7月1日,红四方面军召开甘孜会议,做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议。第二天,红第二、第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两个方面军开始北上。8月1日,到达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包座地区。根据三个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新形势及与张学良的协议,8月12日,中共中央制定“宁夏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1)红军与东北军共同建立西北国防政府;(2)占领宁夏,打通与苏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2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87页。

^③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8页。

^④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1页。

^⑤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页。

联的联系；(3)依托西北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先锋队，向绥远进发^①。25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宁夏计划”。9月11日，共产国际征得苏联的同意，对中共的“宁夏计划”予以批准^②。至此，中共的“宁夏计划”确定下来，以宁夏路线为跳板的“国际路线”得以实施。此时，已经平息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将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调入甘肃，以阻止各路红军的会师。北上的胡宗南部队对西兰公路进行重点防卫，并对部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布防，迫使红军内部也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调整，从10月9日至22日，红军三个方面军终于在西兰公路北侧实现了大会师。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③，为实施“宁夏计划”，战略部署如下：(1)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三个军负责承担进攻宁夏的任务；(2)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与第二方面军防守南线^④。然而，为阻止胡宗南第一军北上及控制渡河地点而展开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由于红军主力部队指挥系统上的问题而未能实现最初的目标，致使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在黄河西岸极其孤立。11月8日，根据事态的变化，中共中央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即：(1)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第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南下占领镇原、宁县、正宁、合水地区并向东展开；(2)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第4军与第31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而动，待绥远东部抗战爆发后向东展开；(3)黄河西岸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地区建立根据地并继续执行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⑤。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344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66～368页。

③ 《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编者印。

④ 《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编者印，第520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1)最初,中共中央并没有让北上的红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设想。(2)从“宁夏计划”制定及实施过程来看,相对于防卫陕甘宁边区而言,红军抵达宁夏以获得苏联的援助似乎更重要。(3)“宁夏计划”受挫后,除西路军以外,所有红军部队都返回陕甘宁边区。同时也应指出,以东进为主要目标的南路军、北路军,并没有退回陕甘宁边区,而是经由此地着眼于向东或者向南的展开^①,这是必须要加以仔细分辨的。

3. 张学良、杨虎城与西安的新形势

“三位一体”关系的初步形成,带动了张学良、杨虎城对各“地方实力派”工作的积极展开,也带动了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5月12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就在西北地区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反蒋抗日”政府,以及实现“西北大联合”构想的具体计划达成了一致的意见^②。此后,由于“两广事件”的爆发,这种构想实现的可能性急剧增大。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起兵反蒋后,曾密电张学良请求出兵支援。张、杨在表示支持两广势力的抗日主张同时,也打探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的动向。在这一过程中,杨虎城与韩复榘、宋哲元达成了六点共识,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的八点主张即由此发展而来^③。5月31日,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发表了《我党在两广的任务》一文,提出中共应在“可能时与李宗仁订立正式合作的协定”^④。但由于“两广事件”因广东的脱离而过早结束,“西北大联合”的构想也因“八月指示”的传达而不得不中止。从下述三个方面来看,即:(1)具体尝试以“抗日反蒋”为主轴联合“地方实力派”;(2)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519、532页。

②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94~99页。

③ 米鹤都:《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诺言问题》,北京:《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8页。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200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9~111页。

在这一过程中,准备了具体的政治纲领;(3)中共具备参与这一政治运动的条件,可以说“两广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剿共策略与东北军内部一部分人的保守态度极度失望,曾经考虑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并率领部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不过他的入党申请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八月指示),但他接受了以争取东北军全体为目标的中共的说服。在张学良看来,实现与苏联的联合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可是苏联即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政治统治能力评价较高,而把张学良纳入了一般“军阀”范畴,没有按照张学良的期望来做的可能性^①。

这一时期,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内容上有什么变化呢?6月,为训练中下级军官,张学良、杨虎城在王曲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团公开的目标是为了剿共而对部队进行整顿,实质上却是为未来的抗日战争培养后备的军事干部。设立之初,由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与刘澜波、解如川(解方)等中共党员负责训练团的领导工作^②。张学良由于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成立)的刘澜波、宋黎等人的介绍而着手组织学兵队,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及西安各团体中募集了300余人作为队员。这些队员以前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多数是中共党员和民族先锋队队员^③。

民众的抗日运动也得到了飞快的发展。1935年9月,杨虎城默许中共组织与联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开展。1936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派谢华(谢兹山)进入西安,组织中共西北特别支部。7月,该支部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通过秘密的联络网向陕北运送物资、武器、干部(参见第六章)。在西安,救国会组织最早只有西北教职员抗日救国会,5~6月间,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陆续成立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9~111页。

②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③ 康博纓:《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学兵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6页。

起来,7月,这些组织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①。据估计,当时救国会曾发展到约30万人的规模②,也促进了东北军所在区域民众救亡运动的开展。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是由东北民众救国会常务委员车向忱提议,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积极运作后,于10月4日正式成立的③。“西救”与“东救”的密切配合,共同将西安地区的抗日形势推向了高潮。

三、西安事变与陕甘宁边区成立

1. 西安事变与“三位一体”的公开化

解决了“两广事件”的蒋介石,决定12月3日在西安召开由其嫡系部队将领、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参加的军事会议,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也集结在潼关一带。次日,蒋介石提出张、杨或者服从命令进行剿共,或者分调至福建、安徽。4月下旬以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部署已有所准备④。12月9日,因为蒋介石对西安学生示威活动下令开枪,刺激起了张学良奋起抗争的念头⑤。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蒋介石与因出席军事会议而在西安停留的嫡系将领监禁,并接管了西安、兰州的政府机构及国民党机关。同日,他们向全国发出了(1)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各党派;(2)停止内

① 徐彬如:《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刘杰诚、张飞军、余清泉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1期,第205页。

② 今井駿:《中國革命と對日作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史研究序説》,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248页。

③ 盛雪芬、车树富:《“西安事变”前后的“东北民众救亡会”》,《中国现代史》1985年第10期,第76~77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83~88页。

⑤ 张学良:《“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

战；(3)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①。从12日至15日，张、杨分别向刘湘、阎锡山、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及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等中央要人发出密电，强调此次举动仅是“兵谏”，既不是内争也不是赤化^②。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

12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1)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2)由何应钦全权指挥军队；(3)决定撤销张学良所任一切职务，以孔祥熙名义致电各“地方实力派”，要求他们按中央的部署集结军队^③。此外，南京国民政府以张、杨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为由，于16日发布了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并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

另外一方面，12日晨，收到张学良通报事件电报的中共中央，认定张、杨的举动是“革命行动”并提出了“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公审”的要求，“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④。14日，毛泽东等人又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建立由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的建议^⑤。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对张、杨的讨伐令，使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也慢慢成熟了。此时，“地方实力派”与苏联的动向颇有意味。宋哲元与韩复榘明确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西安的“讨伐”，阎锡山与张、杨划清界限，自告奋勇充当南京、西安间的调停

① 《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延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② 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1页。

④ 《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关于西安事变后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316页。

⑤ 《毛泽东等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35页。

人。李宗仁、白崇禧与刘湘支持张、杨的行动,但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事变,恢复蒋介石的人身自由^①。种种迹象显示,为了“抗战救国”目标而使用“兵谏”方式,并不能使“地方实力派”凝聚起来。此外,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称:西安事变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亲日派的阴谋^②。中共非常清楚苏联持全盘否定张、杨之举动的观点,并考虑到“地方实力派”的动向,转而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并释放蒋介石的观点^③。苏联的立场,一方面使中共不得不与张、杨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又要极力影响可能获得苏联不可缺少支持的张学良的言行。

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1)东北军、西北军相互呼应,集中于潼关一带,红军南下延安、庆阳地区进行防卫,并视情况下至渭水下游;(2)决定红军参加抗日联军临时委员会^④。23日,叶剑英代表红军参加了西北联军参谋团^⑤。23~24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与宋子文、宋美龄展开谈判。在此基础上,蒋介石最终承诺:(1)“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2)“改组南京政府”;(3)“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⑥。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蒋介石表示:(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

① 华颢、周维强、张政明、汤丽霞:《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1期,第90~91页。

② 《中国发生事变:社论》,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1927~1937),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579页。

③ 有关中共对西安事变方针转变的资料,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5页)。有关共产国际指示电报的评价,请参见第三章。

④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3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⑥ 《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电》,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4页。

挥”；(2)“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3)“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①。中共与张、杨“三位一体”的关系戏剧般地表现出来。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中国政治格局急剧变化，中共放弃了11月8日确定的红军主力向东向南挺进的战略方针^②。笔者认为，中共把陕北地区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策源地的观点，至此得以实质性的确认。

2.“三位一体”的解体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往洛阳，中央军也撤退到潼关以东，一场内战危机暂且得以避免。25~26日，红军南下庆阳地区，并暂时驻扎此地^③。中共此时所考虑的课题是：(1)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以陕西、甘肃两省为抗日运动的根据地；(2)在南京政府内，推动左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以蒋介石为首的中间派的同情，改组南京政府^④。

12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对张学良实施特赦的同时，决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严加限制张学良的人身自由。蒋介石离开公务一个月回奉化老家，张学良也移送奉化。5日，国民政府做出决定：(1)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统一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军事；(2)给予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的处分；(3)自潼关经西安直至宝鸡、天水等地，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军移至渭河以北、东北军移至12月1日前的驻扎地^⑤，并有三四十个师的兵力被派到西安。对此，西安方面制定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军“作战纲领(计划)”，部队于5日至12日部署完毕。也就是说，东北军负责东部正

①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2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42页。

④ 《中央关于释放蒋介石后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⑤ 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6日。

面的防御战,西北军担任渭河两岸的防卫任务,红军主力在淳化、三原、耀县展开,一部进入西安南部的商县地区^①。内战危机再次降临,蒋介石的目标在于,以军事压力动摇西安的“三位一体”关系,并在西北地区实现中央政府的实质性统治。9日,为控制事态发展,蒋介石派王化一与吴瀚涛赴西安提出了甲乙两种方案^②。16日,西安方面提出了释放张学良和以甲案为基础的修正案^③。这一修正案因提出西北地区“特殊化”的主张而遭到蒋介石拒绝^④。中共欲以“三位一体”为基础阻止中央军进攻、实现张学良的释放以完成西北的半独立格局^⑤,蒋介石的应对措施与中共的想法已经清楚地显示出这一阶段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

中央军的军事压力引发了西安内部的分化。由于以张学良返回西安为首要条件,孙铭九、应广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主张为此不惜与中央军开战,这一观点,与主张通过谈判以达到张学良返回西安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西安方面接受了甲种方案,决定在1月29~30日将其部队移驻到渭河以

①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由于这种形势,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赵振军、温瑞茂:《中共中央在陕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90~91页。

② 甲种方案大致是5日各军换防方案。乙种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东北军迁驻河南、安徽与西北军迁驻甘肃。《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之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③ 《杨虎城关于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致蒋介石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8~100页。

④ 《蒋介石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36页。

⑤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56页。

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并支付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善后费用180万元^①。在国民党方面答应认真考虑从陕南撤退的红军部队的经费问题后^②,红军也撤回了驻军陕南的要求^③。此时的和战关键,是如何应对“三位一体”的分裂危机,对此,中共主张以“和平”为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④。然而,由东北军“少壮派”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来看,维持“三位一体”的关系事实上已不可能。在甲种方案下未能团结一致的东北军,遂又接受了乙种方案,3月3日至4月中旬,东北军向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开拔。5月27日,杨虎城离开西安,6月29日由上海出国。红军则退回陕甘苏区。至此,“三位一体”关系彻底解体。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致电2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确定“一致抗日”的基本国策,中共则提出四项保证:(1)停止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军委会的领导;(3)在特区政府辖区内实行普选;(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⑤。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⑥,实质上接受了中共的要求。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156页。

② 《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红军防地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

③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问题致潘汉年电》,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

④ 《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

⑤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⑥ 《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36页。

在此后的两党谈判中,双方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筹划。

3. 国共谈判与陕甘宁边区的成立

1937年3月上旬,经河西走廊赴新疆的红军西路军损失惨重。西路军的目的是获得苏联援助,并据此扭转当时的政治局势,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①。然而事态并没有按预想展开,凉州、永昌根据地与高台、临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二次东进方针,是由于西进行动停止了^②。3月31日,中共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认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川陕苏区就已形成,另立第二中央之时达到了顶点^③(参见第九章)。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时,中共把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一项具体的政治课题,并据此确立新的指导方针。4月15日,中共发表《告全党同志书》。5~6月,陕甘宁边区代表大会与白区工作会议的召开,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边区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来看,毛泽东开始在分析问题时引入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概念,作为对日作战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怎样把“民主”与“抗日”结合起来,提出富有策略性的“民主共和国”设想,以表明中共对待新的政治课题的具体方针(参见第三章)。

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到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段时间内,周恩来与蒋介石等人在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国共谈判。这些谈判,是意欲限制中共的政治权力及其掌握的军队、贯彻中央政府的统治的国民党,与打算仅限于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中共之间的政治斗争,主要议题

^① 周忠瑜:《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12期,第94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22~523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56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369页。

^③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168页。

是:(1)改组苏区;(2)改编红军;(3)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及其组织形态等。由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展开的中日全面军事冲突,事实上使第一、二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以及第二天蒋介石的谈话^②,表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此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

达成协议的两点概括如下,即在8月19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设立总指挥部,国共两党同意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③。2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对红军的改编^④。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1)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⑤。7月15日,在庐山进行的国共谈判中,双方终于就陕甘宁边区的地位达成共识,这一谈判结果,于10月12日获得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的确认^⑥。中共早在5月1日即将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9月又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下辖区域在7月的庐山谈判中得到双方的确认,即包括陕西省的肤施、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神府,甘肃省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省的盐池等18个县。12月,又增加了清涧、米脂、吴堡、绥德、佳县,共计23个县,人口约100万人^⑦。由此,中共作

①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8页。

②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402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0页。

⑥ 王自成、胡新民:《陕甘宁边区历史简述》,《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3期,第18页。

⑦ 王自成、胡新民:《陕甘宁边区历史简述》,《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3期,第18~19页。

为与中央政府对立关系的地方权力(苏维埃权力),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其行政组织也合法转变为地方政府(边区政府)。笔者以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及边区政府公开拒绝国民党派遣有关人员的要求表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共仍然保持着自身政治权力的独立性,这是要予以特别注意的。

结 语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江西省瑞金县,表明国民政府的“中央化”(有效统治区域的扩大)有了进一步扩展,在“堡垒策略”之下,中央军以步步为营的进攻方式,有效蚕食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这也意味着苏维埃革命路线遭受了挫折^①。此后,除陕北地区之外的新根据地建设都无果而终。这样一来,中共仅仅依靠红军的力量已不能保障其自身的存在,中共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生存危机”。

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传达到陕北^②及以此为基础系统开展起来的统战工作,引导中共构建起与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关系。“三位一体”关系的初步形成,不仅仅使中共依靠与两军的同盟关系保障自身的生存成为可能(“政治的”保障),对于因张国焘错误南下方针不断损失的红四方面军而言也是一个刺激,促使了他们的北上行动,使中共与东北军共同在西北地区建立抗日政权的新的政治构想成为可能。“西北大联合”的设想,虽然因共产国际的8月指示而受挫,但西安事变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以及西安民众抗日运动高涨的情

^① 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在瑞金被攻占前后,除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陷落。(参见第二章)。

^② 在张浩归国之前,中共的政治方针已显示出其独立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迈进的可能性,值得特别关注。参见《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71页。有关此资料性质的分析,可参见殷子贤、曹雁行:《1935年10月〈秘密指示信〉考》,北京:《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304~311页。

况下爆发的。陕北成为中共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的主张,伴随着西安事变后“三位一体”关系的公开化得以确定。

共产国际8月指示与国民党合作,由此确立了共同抗战的格局,随着国共合作的日益具体化,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必须依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自身存在的“制度性”保障才成为可能。

从西安事变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中国的抗战形势已经日益明朗化,日本军部再用“就地解决”方针这种惯用的政治手法,已经不可能平息卢沟桥事变,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意味着国民党政权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其“中央化”的目标,中共在确保其权力独立性的同时,也成功确保了其自身的政治主张有一个具体实施的区域。

^① [日]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對中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古屋哲夫編:《日中戦争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第15~16页。

第二章 党、军队、“国家”

——组织的实际状况及其重组

前 言

1927年9月,中共倡导苏维埃革命,计划通过“党军”,创建地方权力,这成为中共完善政党、军队、政府三个系统组织的契机。30年代中期,党、军与政府间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和变化。1937年,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的政治体系出现了新的形态,1938年9~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党的一元化组织机构。此后,中共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体系,为夺取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规定了此后中国国家的性质。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从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起,直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止,集中对这一时期内中共党、军队和政府间的关系、以权力为中枢的人事变迁、一元化组织机构的确立以及基层组织形成理论的变化进行探讨。

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共始对其党、军队及政府间关系进行重新整合,9月调整结束后,中共组织形态面貌一新。本章将集中考察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这一时期内中共组织形态的变化,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大会前后期间是党的最高机关”,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的期间指导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①;与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此同时,不仅发生了事关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重大变革,而且六届六中全会使党的一元化组织体系进一步明确,这就为抗战时期后半段中共组织更新的完成及其对中国政治史主导地位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党军政关系

1. 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镇压,中共党员从 59790 人锐减为 10000 人(参照前揭《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表》)。1927 年 6 月通过的《党章》改正案规定,把组织系统划分为全国—省—市、县—区—生产单位(第 17 条)，“省的范围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可随时更改”(第 31 条)^①。由此,原有的区委改为省委,市、县地方委员会改为市、县委^②。9 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工人、农民、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政权”,以起义部队为基础创建“党的军队”红军,同时实行农村的土地革命。1928 年 6 月,中共地方组织由广东、福建、云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顺直、山东、山西、东北、河南、陕西、四川等 16 个省委(临委)和南洋临委,共有 37 个特委、400 个县委、36 个市委、41 个区委、138 个特别支部构成,党员人数增至 4 万多人^③。6~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以“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部分,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这样的文字为开头的新党章^④。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案》(1927 年 6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4、147 页。

^②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80 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 页。

^③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 页。璞玉霍、徐爽迷:《党的白区斗争史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

^④ 《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68~482 页。

在随即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了以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为核心的新领导层,为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决定选派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常驻莫斯科^①。

1930年6月,设在上海的以向忠发为首的中共中央推行暴动政策,李立三路线达至极点,暴动的失败使中共白区党组织损失惨重^②。1931年1月,共产国际派遣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③。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9月,为应付不断出现的中央政治局成员被捕、背叛的行为,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博古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④。11月,王明访问苏联并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由此形成了以王明为中介使中共贯彻共产国际意见的体制(参见第八章)。

这个时期,农村的苏维埃革命发展迅速。1930年,全国的苏维埃地区扩大为江西省81县,湖北省40县,福建省14县,广东省25县,广西省12县,湖南省23县,河南省3个县,安徽省4个县,江苏省5个县,浙江省6个县,长江流域以南扩大到209个县^⑤。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对苏区和红军进行整编。1~11月,中央政治局将全国苏区分为7

①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4~3015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227页。

② 在李立三路线推行过程中,有11个省委受到了国民政府镇压。湖北、福建、浙江省委和武汉市委,直到1937年秋都未能重建。璞玉霍、徐爽迷:《党的白区斗争史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③ 有关巴布尔·米夫(1901~1938)的情况,请参照グリゴリエフ・ア・エム著,毛里和子译:《バヴエル・ミフ:ソヴェート革命の戦略を練る》,ソ連科學アカデミー極東研究所編著(毛里和子、本莊比佐子譯)《中國革命とソ連の顧問たち》,東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977年版,第133~155页。

④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⑤ 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数字为原表记值(记载各省的数字合计为213县)。

个特区,并把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特区划定为中央苏区^①。另外,红军主力部队在同年夏季也壮大到10个军7万多人。从4月到1931年1月,中共将各部队名称统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达到统一整编的目的^②。1931年1月,又将苏区全部划归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管辖,并设置了在苏区中央局领导下的统一指挥调动红军的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③。为指导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工作,2~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上述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由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当地的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④。

1931年11月,苏区、红军和工会的代表610人聚集江西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成立了由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成立了“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⑤。至1934年夏,“共和国”政府以江

① 王园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两个特区的统一没有实现。1931年秋,赣东南苏区编入闽粤赣苏区,成立了中央苏区。

② 郑惠主编、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1、1557页。这个时期,赣西南、闽西地区成立了第一军团,湘鄂赣地区组建了第三军团,随后两个军团合编成第一方面军(第1321页)。

③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187、189页。

④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14页。1931年6~7月,中共鄂豫皖临时委员会和同省的苏维埃政府、中共湘鄂西省临时委员会和同省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第220~221、214、216页)。还有,11月成立的第四方面军成了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党内的权力根基(第219~226页)。

⑤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37~139页。军事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机构上,从党的组织系统改移到了政府的组织系统。据说,对外曾使用过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笔者认为,应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政治改革“质”的基础上,考察机构上变化的方向。

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五个省组建了中央苏区^①。

此外,张国焘于1932年1月率领第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在湖北枣阳地区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后转战于四川省北部地区,并成立了川陕苏区(参见第9章)。1933年1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主要成员来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博古)。随之,在上海成立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主要负责白区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事务^②。

1934年1月,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地省委代表参加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改选中央政治局并设立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形成中共中央核心的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名单如下^③:

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会):

书记(常务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张国焘。

中共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项英、张国焘、周恩来、任弼时、王明、陈云、博古、洛甫、康生、毛泽东、王稼祥

^① 这些都是由中共省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军区而构成的。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207、252~259页。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61~6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1929~1935年间,有关经过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参照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51~275页。

^③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1~2月,中共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洛甫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以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第237~240页)。

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邓发、凯丰、关向应。

此次会议有三点值得留意。第一，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作战，苏区明显缩小，然而中共党员数量和红军兵力却有所增加，共有30万人^①。这表明，为取得对中华民国“最终决战”的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全苏区进行的总动员不断深入和发展。第二，根据《党章》规定，这次会议是由省为单位编制而成地方组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代表召开的，但是此时的“省”（即中共的省委）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中共“六大”时的16个省委（临委）中，确认继续存在的只有江苏、河北、东北、河南、四川等五省^②。另一方面，苏区的省委相继成立；六届五中全会时，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闽浙赣、湘赣、川陕、鄂豫皖达九个之多^③。第三，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当中，王明和康生滞留在莫斯科，张国焘滞留川陕苏区，只能通过电信与在瑞金的中共中央保持联络沟通^④。

2. 根据地的丧失与党组织

1934年4月，随着广昌的陷落，中央苏区已无法继续保留。5~7月，红军主力（第一方面军）决定撤出苏区，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为

① 武可贤、孙志敏、郭桂英编：《简明中共党史辞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马宇平、黄裕冲编著：《中国昨天与今天：1984—1987国情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69页。

②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40、175~186、298~307页。另外，顺直省委于1930年11月被撤销后，又成立了河北省委（第182页）。

③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3、254~256、258~260、262~263、266、273~274、283页。

④ 除此之外，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身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分会主席、第3军政委的关向应（第490页）不在瑞金。顾作霖于1934年5月在瑞金病故（第584页）。

指挥红军的行动,由博古、李德(奥特·布朗温^①)、周恩来组成了“三人团”^②。此后数月发生的下列事件,可以从国民政府推行的“围剿”作战和中共调整战略方针方面得以理解。

(1)7月,第七军团6000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11月抵达闽浙赣苏区与第十军会合组成第十军团。该军团北上后于次年1月被击溃。同月,国民政府占领了闽浙赣苏区^③。

(2)8月,国民政府军占领了整个湘鄂赣苏区^④。

(3)8月,第六军团9700人撤离湘赣苏区。1~11月,第六军团3300人和第三军4400人(恢复第二军团的名称)会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⑤。

(4)10月,第一方面军86000人撤离中央苏区^⑥。

(5)11月,第二十五军2980人撤离鄂豫皖苏区^⑦。

随着南方根据地的丧失,中共的活动空间日益萎缩,中共与共产国

① 有关李德(奥特·布朗温)的情况,请参照姬田光義:《中國革命に生きる:コミンテルン軍事顧問の運命》,東京:中央公論社1987年版。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③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61页。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9页。

④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5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5、1891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⑦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际的电信联络也难以为继^①。1934年11月,中共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冲破国民政府军封锁线时,人员已减至三万人,且与第二、六军团的会合也被阻挡,1935年1月终于到达了贵州省遵义^②。1月15~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川陕苏区的张国焘,留在瑞金的项英以及湘鄂川黔苏区的任弼时和关向应外,包括其他十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在内的20人出席了这次会议^③。会上,由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提出了纠正军事指导错误的《提纲》,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不同意外,这个《提纲》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的赞同。会议决定,补选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同时取消“三人团”(军事指挥依然由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在军事方面具有最后决断权)。会后,洛甫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④。这样,除王明和张国焘之外,中央书记处成员还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和陈云组成,军事领导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团”,形成以周恩来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的领导体制^⑤。

1934年以后,在中央苏区分别成立了苏区中央分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中央军区(书记、主席、司令员均为项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领导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的五个军区和第一军团共计16000人开展游击战^⑥。另

① 1934年9月,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党中央和莫斯科之间的通信也被迫中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

③ 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489、490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④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大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4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91页。

⑥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382页。

一方面,1934年3月至次年2月间,上海的中央执行局连遭六次镇压而陷入瘫痪。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撤销了该局。1935年底,白区的中共党组织只剩下上海的“文委”、河北省委、香港的海员组织等几个小组织^①。1933年9月后,满洲省委遵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来的“一二·六指示”^②,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9~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停止了其对东北的指导。此后,满洲省委直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领导^③。

1935年1~4月,中共中央(第一方面军)原打算在川西北、滇黔川边、黔北、滇东北、川西开辟新根据地,这些想法最终未能实现;而后先转向四川,考虑到该省西部(川西)建立根据地可能性不大,就摸索北上向甘肃省南部挺进(参见第9章)。另一方面,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3月渡过了嘉陵江,抵达了四川西北部。5月,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该政府作为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以实现四川全省和西北地区的赤化^④。6月,第一方面军20000人和第四方面军80000人会师懋功,在两河口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并夺取甘南地区,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显然是对第一方面军主张的确认^⑤。与会十名政治局委员(包括候补),属于第四方面军的只有张国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璞玉霍、徐爽迷:《党的白区斗争史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6页。

②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党的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5页。

③ 李良志撰、田中仁译:《抗日民族統一戦綫樹立における王明の役割について》,《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第2號,1990年,第242~243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9页。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517页。

焘一人^①。因此,通过这个决定也就理所当然。6~7月,中共中央补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对两个方面军的编号也做了更改,第一方面军由一、三、五、三十二等四个军组成,第四方面军由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编制而成。8月,张国焘提出要求第四方面军的九名干部进入政治局,结果只有陈昌浩和周纯全两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②。8月,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和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第一、三、四、三十一军组成,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随行),在矛盾与争执中开始北上。

二、党组织的分裂及其整顿

1. 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和党军政关系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指挥左路军南下,同时要求右路军随其南下。9日,毛泽东与洛甫、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商议,认为不可能说服张国焘,遂决定一、三军立即北上。红军由此分裂为由张国焘率领的南下部队8万人和北上部队的1.4万人两部分^③。10月5日,张国焘

①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就要会合之时,党中央为重建白区党组织和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派遣陈云赴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3页。陈、周的补选在六中全会上没被追认(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5、60~61、267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北京:编者内部版,第256页。

在卓木碉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并采取了如下措施^①：

(1)停止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职务，撤销党籍，予以逮捕。免去杨尚昆、叶剑英的职务并给予处分。

(2)由 38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

(3)成立由任弼时、王明、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刘维汉、曾云六为正式委员，何长工、付钟为候补委员的中央政治局。

(4)由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成中央书记处。

(5)由 11 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并由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组成常务委员会。

随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南下挺进成都平原并展开进攻作战。11 月，西北联邦政府（主席：邵式平）重建^②，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藏族政权、大金省苏维埃政府、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等汉族政权^③。

另一方面，改编为陕甘支队的北上部队抵达陕北苏区。11 月初，

①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1935 年 10 月 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0 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1～344 页。当时，杨尚昆是第三军政治委员（第 319 页），叶剑英是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第 318 页）。

② 西北联邦政府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方针（沙窝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5 页），改编为川康革命委员会（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20 页）。

③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4～350 页。

该支队7000人与陕北的第十五军团会师,总人数达到1万人^①。改称“西北中央局”的党中央领导阵容如下:

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中共中央书记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王明、康生、张国焘、项英

中共中央政治局:项英、张国焘、周恩来、王明、陈云、博古、张闻天、康生、毛泽东、王稼祥、关向应、刘少奇、朱德、邓发、凯丰(何克全)^②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和政府的重组整顿得以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命令》是宣布恢复第1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③。

张国焘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的决议^④,传达至中央委员,并自称“西北中央局”,采取回避与第二中央断绝关系的姿态。而张国焘没有让朱德留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极大损害了其行为的“正当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78~279页。第15军团由1935年9月到达陕北苏区的第25军与当地的第26.27军组成(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④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558页。

性”。相比之下,毛泽东出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向最终获得党内军事领导权的道路迈进了一大步。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会上提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并非是基于“国民党中国”与“苏维埃中国”的最后决战这一两分法理论,而是中共新的政策体系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及其具体化方向的规定(参见第3章)。同时大会决定“避免直接介入共产各党的内部组织问题”^①,这本身证明了中共对共产国际具有独立性。9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向中国内地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报》(后改为《救国时报》)。代表团撰写的《八一宣言》就发表于10月1日发行的《救国报》上^②。这一政策广泛传播于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得到了广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使抗日的运动推向高潮,而且白区党组织获得了再生机遇(参见第三、五章)。

11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张浩到达了陕北。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③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④。决定(1)“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目蒋介石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战术上的总路线,把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将其所有政策转

① 《共產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執行委員會の活動について:決議》,[日]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6卷,東京:大月書店1983年版,第162~164頁。

② 杨若云、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37、339頁。

③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23頁。

④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597頁。

变为民族策略^①。(2)决定开始实施从山西到绥远获得苏联援助为内容的“国际路线”。为使白区工作得以重建和再生,中共中央同时还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开展工作^②。

张浩承担了调整陕北中央与张国焘关系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双方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③。1936年1月,张浩把自己当做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调解人,承认陕北中央的正统性和毛泽东北上行动的正确性。由此,张国焘与陕北之间的关系恶化,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参见第一、九章)。

为使“国际战线”战略能得以具体实施,中共于1936年2月发动东征,被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阻止。5月初,红军返回到陕北苏区。另一方面,中共的统战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局面。以西安为据点指挥“剿共”作战的张学良(东北军)和陕西地方颇有势力的杨虎城(西北军)已在暗中与中共接触。4月经过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杨虎城与王世英

①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09~610页。改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是在1936年1月中旬(参照《红色中华》第294~252页的发行原表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3条规定,全国苏维埃大会是“共和国”的权力机关,在大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这一称呼的改变,在程序上可能是由在陕北的毛泽东、洛甫、林伯渠、邓发、李维汉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的(有关主席团的构成,参照《红色中华》第148期)。

② 赵舒:《张闻天与瓦窑堡会议》,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5期,第23~30页。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③ 1月17日,政治局决定张浩参加政治局的工作。参见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此外,党内公布《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是在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558页),参见《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会谈,就“共同抗日”和停止内战,加强合作达成共识^①。这样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初步形成。另外,4月就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以重新建设华北地区党组织为目标,对国民党、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权势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统战工作^②。另一方面,在川西汉族、藏族混居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方面军,成为国民政府军的主要攻击对象。故此,3~4月,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缩小战线,人数也降至4万人^③。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化始于1935年6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东北党组织发出指示书信之际^④。第二年2月,代表团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⑤。据此,人民革命军6个军改编为抗日联军6个军。之后又发展扩大为11个军3万人^⑥。然而,由于该部队只在东北地区偏东地带活动,并不具备与关内红军联合作战的条件。南方的苏

①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34页。余鼎章、杨拯英、李宁:《试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343页。

② 参照本书第4章。为强化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北方局成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和华南的若干组织,并向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派遣干部开展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党史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1页,参见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7页。

③ 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④ 李良志:《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北京:1989年版,第244页。在年初时,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便指示满洲省委全体领导访苏,4月,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自主性活动。1936年6月,满洲省委停止全部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在此前后成立的东南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临省委、哈尔滨特委。参见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412页。

⑤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资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0页。

⑥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

区中央分局,1935年3月项英、陈毅等转移到赣粤边以后,就与党中央及各游击区失去联系。各游击区只得开展独立的艰苦作战,直至新四军成立为止^①。

2. 三个方面军会师与中国政治的转变

1936年3月,张国焘提出第四方面军北上,同时,在前一年的11月对脱离了湘鄂川黔苏区后转战于贵州、云南两省境内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北上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指示^②。这样就出现了构成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在“三位一体”初步形成和第二、第六军团北上的新形势下,也希望尝试通过“西北大联合”的实现,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5月,中共制定了重点打击宁夏军为目标的“西征战役计划”,由彭德怀为司令员并兼政治委员的西部野战军实施作战。

6~7月,中共面对主力部队可能会师、与莫斯科通信恢复等大好局面,重新建立和加强组织的工作初见端倪。面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政治的转机和交替逐渐成形并日益具体化,在考察这些事态的发展过程时,有必要先确认下述各点与中共的关系及真正的内幕如何:

(1) 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权力中枢。

(2) 机构上属于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但实质上却是独自握有相当实权的地方势力。

(3) 随着城市抗日运动的高涨,在中国政治上救国会势力发展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后盾欲从根本上解决中共问题的蒋介石,1935年以后,通过莫斯科、北方局、董健吾、张子华等渠道,成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28页。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1页。

^② 《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398页。任弼时《二、六军团从湘鄂周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北京:编者内部版,第239页。

功地与中共有了接触。对此,中共以“八一宣言”倡导的抗日联军构思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1936年6月,北方局提出了改编苏区、红军的体制和机能,并提出应承认国民党的指导地位。7月,国民党将在北方局方案基础上制定提案交给了中共。这样,国共秘密谈判进入了政治决策的阶段^①。另一方面,由南京政府推行的“中央化”进程,从地方势力的角度来看,意味着是丧失自己的政治、军事地盘之举。同时,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出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局势,假如没有“抗日”主张这个媒介,那么“反蒋”的提出也就并非易事。地方实力派认为应和既与苏联有着特殊关系、又主张“抗日”的中共进行接触。尤其是广西、四川和华北等几处的地方势力,一致同意与中共携手“抗日反蒋”。从1934年到1936年,新疆的盛世才就表明亲苏立场,并从苏联获得多方援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苏共党员的名义参加了各种活动^②。从1935年末到翌年在上海成立的救国会组织,都是由著名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可公开部分和由中共党员掌握的中枢部分所形成的非公开部分组织而成。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达上海,地方党组织与中央的关系得以回复。5月底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正在获得倾向抗日的各政治团体的支持,并且拥有多种联系渠道,在城市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参见第5章)。

8月15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停止与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的指示^③。据此,中共改变“反蒋抗日”方针,实施与国民党全方位的关系改善及合作(参见第1章)。

6月,张国焘决定取消第二中央,并令部队北上与第一方面军会

① 杨若云、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8页。

②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8~122页。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15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2期,第86~87页。

师。之后,第四方面军与第二、第六军团(第二方面军)成功会师^①。这样一来两方面军就开始北上,8月1日到达四川、甘肃省边境。另一方面,党中央制定的“宁夏计划”(占领宁夏,继而打通苏俄)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从10月9日到22日,在西兰公路北部三方面军也顺利会师。11日,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由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②。

11月末到12月初,张国焘和朱德一起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保安^③。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了如下改组,从而实现了红军部队的集中指挥和统一领导^④。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

主席团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

弼时

①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焘和任弼时为正副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

②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当时的实力,第一方面军3万,第四方面军3.3万,第二方面军1.33万人。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因三个方面军的会师,西方野战军(第一方面军总部)改称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兼第1方面军总部)。之前,第四方面军已经改称为“中国抗日红军”,因此,此时中共军队的名称,可以被统称作中国抗日红军。另外,第一方面军东征时的名称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西征之时,又称作“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这与前面提到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行,由此推断军队的名称也由“中国工农红军”改为“中国人民红军”。同上书,第332、335页。

③ 有学者指出,他们抵达保安的日期为11月30日(也有说是12月1日),参见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页。张国焘则认为是12月2日(参见《我的回忆:第3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第1231页)。

④ 洛甫任“负总责”的党中央延续了陕北的组织结构,构成了分裂前的组织样式。不久,张浩脱离了政治局工作。(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3页)。

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员：朱德

中国抗日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软禁蒋介石，接管了西安、兰州政府国民党机关，14日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西安事变）。17日，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抵达西安并会晤张学良，具体探讨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驻防事宜，决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①。25日，在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情况下，张学良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由此避免了内战的危机。南京政府软禁张学良后，对西安施加压力。西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作战纲领计划”，决定了三支军队各自的驻防位置。遵照决定，红军主力移防于淳化、三原和耀县，一部分进驻西安东南的商县地区^②。因中央军的封锁，引起了西安内部的分化，因为“二二事变”，“三位一体”难以为继。1937年3~4月，东北军换防南下，苏联要求红军也返回陕甘苏区。6月，杨虎城出国。由此，“三位一体”无奈解体，面对抗日抗战态势的形成，中国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转折。

3月末，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停止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政治委员的职务^③。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党军政关系

1. 中共的体制化与党组织

1937年2月10日，中共在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阐明，

^①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13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②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③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国民党确定“一致抗日”的国策实施条件是：(1)停止武装暴力的方针；(2)改称苏维埃政府、红军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国民革命军；(3)在特区政府管辖区域实行普遍选举；(4)停止没收土地政策^①。对此，国民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②，放弃了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成为了具体的政治课题，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党的方针，于4月15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③。5~6月间，为落实贯彻决议精神，召开了苏区代表大会和白区工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虽然初显成效，互有妥协，而国民党却以东北军撤离西北地区为契机施行高压政策，要求苏区一分为三，并向红军派遣指挥及政训人员。3月26日，蒋介石向周恩来阐述：(1)应保持行政区域的一体性；(2)应探讨设置总指挥部。6月8日蒋介石又再次会见周恩来表明自己的见解：(1)由中央政府派遣边区政府的长官；(2)把中共军队改编为3个师45000人，不同意其设置总指挥部。对此，中共决定：(1)陕甘宁边区7月实行民主选举；(2)如蒋介石不同意设立总指挥部，即以“八一”为期限，实行独立改编^④。

卢沟桥事变后，导致了日中全面军事冲突。7月下旬，蒋介石督促

①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这段文字表明中共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改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5月1日又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中共是如何对“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重新定位的，可以参考《红色中华》（1937年1月改名为《新中华报》）发行时原表记的变化。即1936年11~12月，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紧接着1937年6日又改称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

② 《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36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抗日抗战而斗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204页。

④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5页。

红军改编并开赴前线。但中共没有同意由政治训练处代理指挥权的方案。8月4日,蒋介石同意设置总指挥部并公布了改编后的红军编号,18日发表了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决定。22~25日,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意味着作为政府机构的军事委员会向党的机构转变)。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三个师45000人改编为八路军。其主要内容如下^①:

总指挥:朱 德 副总指挥:彭德怀

参谋长:叶剑英 副参谋长:左 权

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副主任:邓小平

第115师 师长:林 彪 副师长:聂荣臻 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第120师 师长:贺 龙 副师长:萧 克 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第129师 师长:刘伯承 副师长:徐向前 政训处主任:张浩

这样,中共军队在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前提下,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进行了实质性的改编。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改编是以保留

^①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9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3页。有关这一命令有必要做补充说明:其一,9月12日,八路军曾被改称过第十八集团军,但其后就使用八路军的名称。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其二,由于实行改编,政治委员被废止,政治部改为政训处,10月16日又改回到原来的机构名称(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

了有着不同来历的三个方面军机构的形式而得以实现的^①。8月下旬到9月末,八路军的3个师开赴山西省前线^②。

7月17日,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废止,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尽快使中共的所有军队开赴前线,国民党于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于第二天发表蒋介石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开始^③。

陕甘宁地区原有陕北区、陕甘省、陕甘宁省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1937年3月以后被陆续取消,9月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这一新体制。6~12月,各级议会选举开始实施,边区议会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和边区议会的监督下,开展活动并行使行政权力^④。至此,边区政权逐渐成为构成中华民国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也是受边区人民信赖的地域权力机构,这一点与苏维埃时期有本质的区别,是作为具有“政党、军队、政府”关系的政治权力而成立的。与此同时的中共政权,以日本军占领

① 第115师以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为核心,第120师以第二方面军为核心,第129师以第四方面军为核心改编而成。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3页。

② 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及鄂豫皖地区的第二十八军一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于12月在武汉成立,第二年1月移至南昌。各地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各个支队(计13000人)随后奔赴了抗日前线(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③ 1937年8月以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分别在南京、西安、武汉、重庆、桂林等地设立,这实际上就是中共事务所,除运送抗日物资和有关人员的任务外,还是统一战线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据点。陈广湘:《抗战时期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上海:《党史信息报》1988年7月16日。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454,459~460页。

④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0,477~478页。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8页。1938年11月,边区议会改称为边区参议会(刘建业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8页)。

下的农村为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开展的游击战中不断扩大。

2. 抗战初期的中国政治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基本方针,见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意在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红军应该采用的战略战术,强调中共及其军队“独立自主”的方针^①。对此,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应该发挥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迅速实现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日合作,但对中共领导层的能力存有怀疑。当时滞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成员王明、康生、陈云、邓发和王稼祥5人中,除了生病需要疗养的王稼祥外,其余4人都决定回国,这样中共中央便进入了集体领导的尝试期^②。11月29日,王明回国。以留苏派人员为主构成的党组织中枢便集结到了延安。

12月9~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共有毛泽东、王明、张国焘在内的13人出席。会议通过了王明所作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③。决定尽快与国民党进行真正的了解与合作,并且决定:(1)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的党务工作;(3)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领导新四军。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以便实现由洛甫、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构成的集体领导^④。

设立在武汉的长江局,积极推动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抗日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发展,并在南部中国党组织重建方面取得了显

①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5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第2版,第83~168頁。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③ 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余子道等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6~545页。

④ 杨若云、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页。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著成果^①。奔赴华北的八路军,在1937年以后,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各地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第2年4月,八路军将部队化整为零,把部队分布在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绥远等广阔地区展开游击战。新四军也在长江流域占领区开始了游击战^②。

另一方面,12月政治局会议改组的中央书记处未能胜利而有效地实现所期望的集体领导体制,延安和武汉之间在沟通思想意识方面也发生了严重摩擦。会议决定,王明在武汉会见蒋介石之后,立即返回延安主持统战工作^③,但王明认为与延安相比,武汉的工作更重要,故而将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自己就任书记职务^④。问题是,王明并非尊重延安的中央,其态度似乎要否认中央的权威。对此,杨奎松举有以下事例^⑤:

(1) 未经书记处同意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⑥。

(2) 2月10日,未经毛泽东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毛泽东谈

① 参照本书第7章。截至1938年9月,长江局在15个地区建立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人数达到67780人,占全国党员人数的27%(璞玉霍、徐爽迷:《党的白区斗争史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当时全国党员人数为251000人。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506页。1938年10月,八路军扩大为156000人,新四军为25000人。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511页。1938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同志1个月之内返回延安”(第513页)。然而直到9月10日前后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他才回到延安(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⑤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⑥ 《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3页。

话”^①。

(3) 3月24日,用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送了《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②,而把书记处撰写发给大会的电文束之高阁^③。

(4) 不同意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的时段划分,拒绝该书在武汉发行^④。

(5)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建立是先斩后奏,以此攻击书记处。

(6) 停止在延安发行中央机关杂志《解放》,主张在武汉制版、印刷。

(7) 擅自总结3月政治局会议,并以个人名义发表^⑤。

(8) 以陈、周、博(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名义,向地方组织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指示。

(9) 以在延安的政治局人数为根据,攻击洛甫和毛泽东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表指示、文件^⑥。

通过为汇报工作而被遣往莫斯科的任弼时,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共领导层内部摩擦的事情。根据任弼时的报告,共产国际做出反应,强调在国共“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和“抗日优先于一切”的前提下,提出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但同时也指出:(1)“拥蒋”并不意味着

① 《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该文献由王明起草,经长江局全体人员修改后发表的(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

②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488页。

③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4页。

④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讨抗战建国诸问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9~1154页。

⑤ 陈绍禹(王明):《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5卷,东京:汲古书院1975年版,第95~116页。

⑥ 由于张国焘退党,朱德、彭德怀、项英常来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因此,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凌驾于延安之上。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2)中共应该通过游击战来开辟敌后根据地，并扩大自己的军队，同时可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行“民主”。在中共领导层问题上共产国际也不得不表态，提出加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团结^①。7~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返回延安。9月14日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1)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真正地运用和实践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统一战线的胜利，取决于党的一致性及领导层的团结；(3)应以毛泽东为首，在其领导下解决问题^②，领导层要有和谐、团结一致的气氛^③。

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以及“各方面负责人”36人参加会议^④。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据此形成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决议，规定党员的岗位是前线和敌后^⑤。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与中原局，改组东南分局为东南局。会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变更如下：

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明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陈云、康生、王明、刘少奇、王稼祥、任弼时、项英、博古、彭德怀、凯丰、邓发、关向应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这一时期，恰好与共产国际清除王明的后台米夫的时间重叠，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也被重视起来（第78页）。

②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页。

④ 王秀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第231页。

⑤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759页。

由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权力,通过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得以巩固。根据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在六中全会做了政治报告,会后主管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些都使毛泽东的领导权力在政治、组织两方面得到充分扩大。

六中全会通过了两个决议,即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权限及相互关系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另一个是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下设置区党委会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目的在于改变原来“中共中央”文件有时出自党中央以外的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等的局面^①。或意在克服由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以及中央与长江局之间的矛盾,从而确立以党中央为核心的一元化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的决定》是根据党的地方组织已经难以省为单位进行编制这一现状决定的。如前所述,省委有两类,既有按照中华民国行政区划规定的,又有遵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省规章而设置的。前者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几乎全部消失,1936~1938年期间由北方局和长江局又重新组建了几个,当抗战全面爆发时,在日军占领区的省委被编入边区党组织。而后者由于苏维埃根据地、游击区的消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废除,也都不复存在。这样只有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党组织作为省委被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在迅速扩大。党组织如此的变化,从出席六届六中全会“各方面的负责人”也可以得知,不只是省委代表,而且也包括中央机关、八路

^① 可以回想起“八一宣言”是以中国苏维埃、中共中央名义而发表。另外,有关上海中央局用中共中央名称发表的文献,参见曹雁行、殷子贤:《关于上海中央局用中央名义发表文件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358页。

军和陕甘宁边区等政府相关人员^①。

确立了组织体系的党中央,在各重要区域设置中央局,并将全国纳入谋政的视野范围。1938年11月以后,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同行,指导党组织工作,设置在新四军军部的东南局(书记:项英)统辖东南各省和新四军的党组织事务。进而于1939年1月,管辖长江以北陇海线以南范围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河南省竹沟成立,同时,负责长江流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和统战工作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宣告成立^②。

结 语

本章阐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遵义会议上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书记处)成员的毛泽东,在其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主席1937年7月)的过程中,确立和巩固了军事指挥权,到六届六中全会,其领导权已由军事方面扩大到政治和组织方面。

第二,五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书记处成员中,有驻莫斯科的王明和当时领导川陕苏区的张国焘。相比之下,六中全会则全部是居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前者反映了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分散特性,而后者则表明中共领导层在确立大政方

^①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36名“各方面负责人”中,从1937年7月到六届六中全会止,能够确认的其间担任省委领导职务的人员有:彭真(晋察冀省委书记);潘汉年(江苏省委书记);曾山(江西省委书记);张文彬(广东省委书记);朱理治(河南省委书记);贾拓夫(陕西省委书记);郭述申(湖北省委书记);高文化(湖南省委书记),仅8人而已。晋察冀省委成立于1937年11月,第二年4月改称为北岳区党委。参见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447页。

^②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492、524、527、539页。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670页。

针时,可以通过书记处成员的直接对话来实行。基于这一点,通观两次全会之间的历史时期,可以得知遵义会议对书记处的改组和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都是在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电讯联系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其政治含义显而易见。笔者认为,这里有必要在上述的背景下,对书记处书记陈云向莫斯科传达遵义会议决议^①和与第二中央交涉中作为被“共产国际认可的调停者”张浩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关注,包括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②对毛泽东在确立政治、组织上的领导地位时产生的效用。可以肯定,共产国际的权威和指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中共权力核心的人事变动有着决定性的深远影响。

第三,对于“政党、军队、政府”关系的调整:(1)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军队的统属关系由政府系统移向了党的系统。(2)“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本身,就意味着中共的权力由地方权力向地方政府转换(参见第一章),不过想再次确认的是,由于边区议会的成立,使其同时具有了地方权力的两重特性。

第四,本章确认了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地方组织原理的变化,就省一级的水平而言,(1)以中华民国基准编制而成的省委员会;(2)对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省的省委员会;(3)通过梳理抗日根据地委员会的推移,可以清晰地看到同一时期地方组织建立、构成的变化情况。

由此可知,六届六中全会在军事、政治、组织的各个方面都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权威,明确了书记处的实体化,党对军队的指挥权(其机构上的保证)和边区权力的两重性,以及通过中央局和区委员会建立而成边区的党组织的构筑,在“抗日时期”中国政治史后半期的中共组织建立上实现了一元化的组织机构。

^①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475页。

^②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2页。

第三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

——苏维埃革命路线与“抗日民族革命”

前 言

至此,笔者认为,由于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受挫,中共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其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生存危机”,为了保存已有的军事力量,中共全面展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从“政治的保障”(即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的“三位一体”局面)成功演变为“制度的保障”(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确立了把陕北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策源地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组织结构得以全面的更新,其结果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权的确立,产生了与抗战后期的中国政治相适应的“党、军队、政府”关系。

本章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以中共路线与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关系及该路线废除后革命战略的转换问题为焦点,对20世纪30年代中共克服危机并获得新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探讨。

一、苏维埃革命路线与反日问题

1. 中共“六大”与苏维埃革命路线

1927年9月,中共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原则,提出组成由无产阶级、农民、士兵代表构成的“苏维埃政权”^①。由此,以“党指挥枪”创造

^①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371页。

出地方权力(以推动土地革命破坏农村旧有权力及支配结构),纪律十分严格的红军,在农民的支持下于国民政府中央权力分散的“间隙”(几省交界地带),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中共的苏维埃革命路线,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及中共武装暴动政策的失败后,在1928年6~7月中共“六大”上确定下来的。在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两大任务。通过无产阶级、农民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及资产阶级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苏维埃),这一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中有具体的表述^①。这条革命路线的确立,是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分化(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两极)以及革命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的认识为前提的^②。

中共“六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这次大会认为,“一战”后的世界进入了“第三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崩溃,也即革命的高涨),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全面的危机”。这一认识,一方面导致了“左”的战略决策,使各国共产党陷于政治的孤立,另一方面则强调帝国主义各国对苏联进行战争干涉的可能性,要求各国共产党坚决保护苏联^③。此外,《国际纲领》对“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强调,极大地制约了各国共产党对本国特点的

① “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与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6)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与工作;(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施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苏联。参见《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② 《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328页。

③ 《共產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綱領》,[日]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4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年版,第325~368页。

分析和对于本民族特殊性的把握^①。

以“六大”之后共产国际推行“左”倾路线,以及李立三等中共领导层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原大战等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为起因的暴动政策破产之后,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博古、洛甫等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参见第八章)。王明等掌权之后,中共开始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巨变的中国政局(王明于1931年秋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赴苏)。

2.“下层”统一战线与“进攻路线”

1931年9月22日,中共指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并企图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也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在这一事变中,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和扩大民众的反帝运动,并将之引向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上去。为此,(1)要将打倒国民党政权作为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2)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进行,必须依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力量^②。主张在反帝运动中,通过组织下层统一战线,以争取广大小资产阶级者,通过“揭露”反革命的领导人的欺骗宣传,以争取广大民众对革命的同情,使他们最终参加到白区的苏维埃革命中来^③。

随后,各地的苏维埃运动都在不断地发展中。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中共认为,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④。以此为契机,中共政策一变而为对国民党政权展开“进攻路线”。1932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基于国民

①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205~221,255~279頁。

②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424頁。

③ “下层”的统一战线战略,是中共在共产国际“初期统一战线”观点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参见[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228~230頁。

④ 《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463頁。

党统治已面临全面崩溃、中国革命的时机已快速成熟的认识,提出所谓的争取苏维埃革命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取得首先胜利和改良主义的在野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一“主要打击中间势力论”^①。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的上海抗战,是第十九路军与民众相结合的新型战争。但是中共认为:这次抗战不是蔡廷锴、蒋光鼐等国民党军阀领导的,他们的作战具有欺骗性,呼吁组织武装的工人、农民、士兵,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②。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日宣战,但它是以打倒国民党政府为前提的,认为中心城市的夺取才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实现^③。

全国的救亡高潮此时已告一段落,而中共的“进攻路线”更加明确。1932年5月,中共在《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认为中国革命的危机不仅是存在,而且是发展着的^④。6月,苏区中央局在《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也认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是帝国主义公开反对中国的战争的开始,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红军的直接冲突将要到来,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不过是其马前走卒而已^⑤。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以城市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共将之与苏维埃革命运动同等看待,不仅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灵活多变的政策,反而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远。

1932年8月至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第12次全会认为,世

①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7页。

②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5页。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638页。

④ 《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2页。

⑤ 《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61页。

界形势处于向革命和战争新周期的过渡时刻,并为每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策略。要求中共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广泛地和一贯地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保证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领导权^①。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主要是在认识到“九一八”事变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无法发展为苏维埃运动。采用这种策略的目的,在于争取把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团结在革命的一边,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具体表现在:一、“共同抗日的三个条件”^②,二、“一月来信”^③,三、关于群众抗日运动的评价。

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已迫近中央苏区;日本军队则占领了山海关。面对这一现实,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共同抗日的三个条件”,要求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组,同红军一样具有人民军队的性质^④,目的在于揭露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反革命本质^⑤。

1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满洲各级支部”的信(即“一月来信”)中,号召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其中也包括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结成上层统一战线。上层统一战线虽然可以称作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课题(反日),而与地主、资产阶级的领导人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但“一月来信”又规定,所提出的上层统一战线仍是以下层统一战线为基础的。而且,由于上层统一战线的提出是

① コミンテルン執行委員會:《國際情勢と共產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諸支部の任務についてのデーゼ》,コミンテルン執行委員會:《極東の戦争について,帝國主義戦争と對ソ軍事干渉に反對する斗争における共產黨員の任務について》,[日]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5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年版,第387、394、406頁。

②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548頁。

③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5頁。

④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548頁。

⑤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未完)》,瑞金:《斗争》第22期第8~14頁。

以东北的特殊性(日本的殖民地)及中共党组织的“不成熟”为前提的,因此也不能直接在关内采用^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在《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中特别指出,在反帝斗争中,也可以采用武装暴动以外的形式(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反日会”等)进行^②。1933年2月,中共中央在“致各级党支部的一封信”中提出,193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众团体救国会议,虽然不是中共领导的,但却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意愿,并呼吁召开第二次会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承认该组织的独立性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坚决而又灵活”的党派活动,以掌握这一组织的领导权^③。

日本占领热河及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共的进攻路线得到更进一步强化。中共中央在《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全国革命斗争更加激化,而第五次反“围剿”,则将成为“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革命的一方则有“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④。1933年11月20日,桂系、第十九路军、第三党联合起来,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根据共同抗日的三个条件,虽然同福建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⑤,但认为福建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内部动摇和崩溃的表现,批评福建政府同任何反革命政府没有本质区

①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页。

② 《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508页。

③ 《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关于召集全国民众团体的救国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74~75页。

④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275~276页。

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571页。

别,他们的主张只不过是“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①。

这一时期,尽管中共依照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确定了方向,但是以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为基础的新政策的实施和“进攻路线”更加极端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所作的《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声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分”^②。他无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是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空隙的现实,对中华苏维埃在整个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缺乏分析。因此,既没有把苏维埃和整个的中国社会联系起来,没有说明苏维埃革命路线下的武装暴动,也没有提及反帝斗争中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因此也不可能触及苏维埃革命路线的实质。

1933年1月,德国的纳粹法西斯政权成立,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政策。同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指出:世界正逐渐进入“战争和革命新阶段的间隙”,新的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在德国和日本^③。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作了前面所述的报告,认为要接受世界形势的新认识,对中共提出新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的新形势作了如下论述:(1)1932年5月签订的中日停战协定,说明蒋介石“完全公开投到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中去”,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的危险性;(2)各派军阀在士兵和下、中级军官的革命精神的推动下,必须在剿共和反日反蒋两者间作出选择;(3)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发生了一种显然的变化。就是发生了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的‘左’倾情绪”^④。这也就是说,(1)“九一八”事变后,以民族的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451页。

②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3卷,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版,第58页。

③ コミンテルン執行委員會:《ファシズム、戦争の危険および共産諸黨の任務:デーゼ》,[日]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6卷,東京:大月書店1983年版,第67、70~71页。

④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3卷,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版,第95、98~100页。

武装自卫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是现代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①,并可据此解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2)为在“反日反蒋”群众运动的浪潮中认识福建事变提供了一个视角;(3)提出了与评价“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相关的几个问题。在谈及“反日群众团体”提出的“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时,他声称党对此应该“坚决支持”^②。基于此,王明指出:中共新的任务就是,接近所有的民众组织,参加民众会议,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争取而不是瓦解军队,并提出要改善以往固定的、分散的、机械的、教条的工作方法^③。

1934年2月,中共中央在给满洲省委的信(即所谓“二月来信”)中,提出了联合各种抗日游击队,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的方针^④。9月至11月,中共满洲省委开始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领导,在代表团所派代表吴平(杨松)的领导下,于翌年展开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反日总工会筹备会的工作^⑤。

1934年4月20日,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10人在内,共有1779人作为“发起人、赞成人”组建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⑥。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纲领是以共产国际1933年10月27日致王明、康生的中央政治局指示信为基础的^⑦。指示信对纲领的各个项目列举如下:(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

①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81頁。

②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83~84頁。

③ 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本莊比佐子主編:《王明選集》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93~96頁。

④ 《中央給滿洲省委指示信》,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41頁。

⑤ 李良志撰、田中仁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樹立における王明の役割について》,《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第2號,1990年,第242~244頁。

⑥ 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綱領》,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686頁。

⑦ 周國全、郭德宏:《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頁。

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一切与日本帝国主义敌对的势力。在此基础上，信中还附记道：“要用一切力量和办法贯彻这一纲领；并最好由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去印行”^①。

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反日五大纲领”，这一纲领，是中共把“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的主张，按照“围绕中国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观点模式化的产物^②。中国共产党关于苏维埃革命的观点依然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反民族性”上是一致的，“民族的危机”与苏维埃的危机是同一程度的问题，并且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不存在相区别的逻辑。从这一点上看，两个纲领的本质是不同的。江西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是，以中国政治的资产阶级均质化为起因的国民政府统治，向相对稳定、强化的方向倾斜，以及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情势变化中未能提出影响全国的政策和策略，而且，后者也是苏维埃革命路线自身的问题。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构想

1. 共产国际新方针与瓦窑堡会议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在确立以法

^①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1页。宋庆龄是经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加入中共的，其组织关系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处。由于上海地下党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组织遭受破坏，宋庆龄便以个人身份继续按照共产国际的思想进行活动。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24页。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北京：《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② 关于“反日五大纲领”和“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的区别，博古认为，后者是为了让大众理解前者的具体的解释手段（通俗化），他论述道：仅仅有这个纲领，还是不够的。要用这个纲领为群众了解，要使群众了解中国是有力抗日的，必须进行具体的解释……我们必须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来通俗化这个纲领。“反日五大纲领”的内容参见《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在做了些什么和将做些什么？博古同志在七月八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瑞金：《斗争》第69期，第1~20页。

西斯为主要敌人的论调的同时,还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并且引入了“和平”、“自由”、“民主主义”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把“人民”、“民族”、“爱国主义”当作有利的符号来把握,“本质”相对于“形式”,“特殊、具体”相对于“一般、抽象”,这些主张的逆转所形成的价值转换,规定了中共新路线的具体方向^①。

大会分配给中共的任务是,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众运动相结合,推动苏维埃运动的扩大,不断地壮大红军的力量^②。王明在大会上所作题为《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报告中,就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③。他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其根据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不断激化矛盾,“好些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发生分裂,并在它们中间形成民族革命的左派”,他认为,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底胜利发展”的中国,“正遭逢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问题”,是“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问题。在他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中应该包括:(1)将“暂时的、不可靠的和动摇的”同

①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 1991 年版,第 418~419 頁。

② 《ファシズムの攻勢と、ファシズムに反対し階級者階級の統一をめざす共産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の任務:決議》,[日]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 6 卷,東京:大月書店 1983 年版,第 173 頁。

③ 王明的大会报告共有 5 个标题和 26 个版本。最初是 8 月 7 日的苏联《真理报》予以简要介绍。王明:《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演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 7 卷,東京:勁草書房 1973 年版,第 527~560 頁。9 月以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上刊登了此演说概要的速记(本书使用的底本,出自 1935 年莫斯科出版的德文版小册子——Wan Min,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den kolonialen und halbkolonialen Ländern und die Taktik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的日文版——王明:《植民地および植民地諸國における革命運動と共產黨の戦術:コミンテルン第 7 回大會演説》),[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 7 卷,東京:勁草書房 1973 年版,第 527~560 頁。中文版本刊载于 9 月 15 日的《救国报》后,10 月又以《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标题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参见《王明著作目錄》,東京:汲古書院 1996 年版,第 61~64 頁。

盟者以及赞成抗日救国的政治势力和军队,都团结在苏区和红军周围,开展“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现有的苏区政策转变为“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全民的和民族的性质”^①。

1935年10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登载于代表团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报》上。《宣言》认为,华北各省事实上已经沦入日军之手,“抗日救亡,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尽管指责酿成此祸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为“卖国贼”,但又提出“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解决……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号召包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及“一切党派、社团”、商会、“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在内的各党派、各团体,组成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和“抗日联军”,同时提出了作为“国防政府”行动方针的“十大纲领”^②。

“抗日救国”口号中的“国”的含义,是指拥有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国土和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民族社会^③。《宣言》以“国”这一概念为起点,民族危机及其解决方案得以展开。这一宣言改变了以前苏维埃政

① 王明:《植民地および植民地諸國における革命運動と共產黨の戦術:コミンテルン第7回大會演説》,[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1973年版,第528~536、539~540、549~550頁。

② “十大纲领”的内容是: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七、实行民主自由,解放一切政治犯;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参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524页。

③ 王明:《植民地および植民地諸國における革命運動と共產黨の戦術:コミンテルン第7回大會演説》,[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1973年版,第533頁。

权和国民党中央政权势不两立的立场,为中共向新的政策体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贼”、“人民公敌”的批判,也是以这个“国”为前提的,这与过去的苏维埃革命对“反革命”的理解是不同的。同时还要注意,这一“国”的概念,不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民主改革时使用的那种“国家”概念。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遣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新的精神。中共接受了这一方针,并于12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把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共党总的策略方针,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和最高的形式”,苏维埃与红军处于统一战线的核心位置,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对其部分政策进行调整,使之具有民族性质^①。种种情况表明,中共的政策已经基本上转移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了。这个决议还有几点值得注意:(1)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有再次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但也由此激起了“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国“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形势”^②;(2)“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是中共的基本原则^③,建设“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同中共“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是直接联系的,在本质上都把卖国贼、蒋介石视为“反革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05、606、609~610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604页。

③ 作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行动纲领的“十大纲领”,“决议”公开声称:“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斗中,求得这些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纲领的实现。”《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609页。如果对同一“决议”中所阐述的“十大纲领”与“八一宣言”进行比较,可能看出两者表述的顺序不同,“八一宣言”中没有“十大纲领”中的第一项,此外,除了将第十项分成两个部分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

命”^①；(3)为了建立“下层的与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②。这些主张表明，中共政策的调整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引到以往的政治路线上去了。

但是，中共政策转变的前提，是将共产国际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内部会形成左派的民族革命派”的观点，理解为“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军阀”有抗日的可能性^③。一方面，认为“汉奸、卖国贼”集团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其统治基础是地主、买办（“汉奸、卖国贼”这一政治定性，也产生了相应的经济评价）阶级^④。这个中国的资产阶级，又被分成“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可对应为“大资产阶级”，后者则可以对应为“中小资产阶级”^⑤，这是中共路线转变的前提。中共对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为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616、609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17～618页。

③ 王明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词的意思是指中国资本主义构成的经济部分，即中国资产阶级。这一点，与后面所述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是不同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构成中的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差异，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同时参见[日]池田誠、田尻利、山本恆人、西村成雄、奥村哲：《中國工業化の歴史：近现代礦業發展の歴史と現實》，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年版，第80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599、605～606页。

⑤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提出下述见解：瓦窑堡会议在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阵营的不统一，“科学地”预见“非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此外，还提出了重工业部门的“非民族化”与轻工业的“凋落”的观点。参见：《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页。

方向^①。

2. 抗日运动的高涨与“西北大联合”的构想

1935年6月,中日之间相继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11月,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此可见日本在强行推行华北分离活动。由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导致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以北平学生为中心的民众抗日运动的高涨(即一二·九运动)。而且,共产国际的新方针的传播,给处于严重破坏状态的上海、天津、北平等白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带来了重组的机会(参见第四、五章)。

1936年3月20~27日,在东征路上,中共中央在山西省隰县大麦郊地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会议在与东北军的谈判有所进展(参见第六章)以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秘密谈判(参见第二章)的新形势下,主要讨论在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全文后如何贯彻执行的问题^②。20日洛甫的报告与24日的决议指出:(1)“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2)“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③;(3)应该区别“反日”与“反卖国贼”的不同;(4)“中间营垒过去是主要危险,现在不同了”^④。这些观点,显然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方针,对包含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以往路线进行了重新检讨。中共以“情况发生变化”为基础,否定了以前的“主要打击中间势力论”,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轴心,具体提出了对蒋介石以及张学良等诸种势

^① 今堀誠二提出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分法,为“民主共和国”的阶级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这可以被理解为抗日战争时期阶级区分的“雏形”。[日]今堀誠二:《毛澤東研究序說》,東京:勁草書房1966年版,第163~164页。

^②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七大”有关文件的是刘长胜。见李新等主编:《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8页。

^③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

^④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力应有的态度。27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将国民党区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将后者又分为“左派”与“右派”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方针的报告^①,决定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行谈判^②。此时,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往上海^③。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当时中国政治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月底,中共获得了张学良决心与红军一起进行“反蒋抗日”的情报^④。毛泽东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打通外蒙古与苏联间通道、建立西北联合政府的方针(即“西北大联合”的构想)。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宣布成立,这是“一二·九”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在城市各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这意味着“抗日时期”中国政治格局中新的力量的出现。“全救”、陕北的中共中央、西南与西北的“地方实力派”等各种政治力量,在要求国民政府中央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采取了共同的步调。由此,中国政治迎来了新的阶段(参见第五章)。

3. 共产国际八月指示与“民主共和国”设想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张浩从莫斯科带回的密码本,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

② “晋西会议”对共产国际新方针的具体落实,就是于4月25日公布的号召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9页。),以及5月5日发表的号召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2页。)。另外两份文件给予蒋介石的评价仍以“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洛甫的会议报告,《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和“民族反革命派”(毛泽东的会议报告)为前提的。

③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83~89页。

始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7月6日,中共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回电,双方进行直接的电信联络成为可能。由于弗朗斯·斯拜因的人民战线政府的成立以及苏联在和平外交攻势下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重视,促使共产国际方面重新审视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7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专门就中共的报告举行会议,中共提出应改变以往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方针,放弃苏维埃的政权形态,倡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主张。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彻底放弃“抗日反蒋”政策和在中国实现苏维埃的方针^①。

8月9日,抵达保安的潘汉年^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方针^③。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在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手”的同时,也提出了“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的方针,明确了与东北军的“西北大联合”设想的

①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70页。

② 为重建白区工作和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络,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和1935年5月分别将潘汉年和陈云派往上海(胡愈之:《潘汉年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陈云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前后、潘汉年稍后到达莫斯科(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从他们的报告里,中共代表团才了解到遵义会议以及长征在四川的具体情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37页。)。1936年1月至2月初,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会谈,有关于共同抗日问题以后在国内继续商谈的共同认识(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党史研究》1985年4期,第44~53页。杨奎松:《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7页)。4月,代表团让潘汉年回国。7月,他在南京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谢黎萍:《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08页)。在上海呆了几天后,潘汉年赴陕北(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③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具体化步骤^①。

在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对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再检讨。电报对以下三点提出批评:(1)中共党、军队、政府组织的阶级纯洁性可能会受到的损害(由于在入党时不再考虑出身问题,在参加红军时不再对学生或其他军队的军官进行鉴别,有产阶级的代表也可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工作),“使我们特别地感到不安”,“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2)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等同视之的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3)中共声明支持西南军阀集团的反蒋行动,也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指示:(1)“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这是在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的最好手段。”(2)“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3)“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失败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②。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分管联络东北军与统一战线的全部工作^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分工,在表明中共政策转变的三篇文献中,分别由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由洛甫起草体现中共总的指导思想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④。

8月25日,中共发表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声称国民党是“中国最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569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8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页。

④ 三个文件均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8、89~91、92~99页。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33~134页。

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由“蒋委员长”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和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存在，从而承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性质，并提出国民党、国民政府应该决意遵从“全国民意、全民族利益”，转向排除“亲日汉奸”的抗日政策，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9月1日，中共的党内指示也指出：(1)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2)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全体或者大部分存在着参加对日作战可能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3)执行逼蒋抗日的方针，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面前，袒护一方面的态度。”这样，中共与张学良即东北军的同盟关系，也在追求“国民党中央军的全部或者大部有参加抗战的可能”的脉络中得到新的历史评价^②。

中共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已开始转向抗日的一方，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分化与动摇表明他们也有一起走向抗日的可能性，由此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课题。为实现这一目标，争取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大众，推动上层分子和当权者走向抗日，以及扩大、加强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巩固苏维埃政权，是非常必要的。决议还强调：在以“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作为基于一定纲领的政治与军事合作形式的同时，必须保持苏维埃、红军在组织上、领导上的独立性^③。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构想就是：(1)召开由各党、各派、各界和各军队代表组成的“全国救国代表大会”，以决定抗日救国的基本方针（以“国防政府”十大纲领的内容为基本原则），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2)召开由全国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即国会（“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建立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为纲领的“民主共和国”政府等等。在这里，中共的抗

^① 《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8、84～87页。

^② 《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1页。

^③ 《中共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页。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国家构想,问题是如何在对日抗战这一不可缺少的前提下,把握“抗日”与“民主”的关系。

在根据共产国际新精神而发表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中,王明认为:中共的政策,符合“抗日救国”这一“民众愿望”,也会促使国民政府的政策逐渐转向抗日,也为暂时放弃苏维埃革命路线,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①。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从以社会为基础发展至以国家为基础,它的基本结构,也从“抗日救国”转向了“抗日民主”(参见第八章)。

9月,潘汉年携带着毛泽东致宋庆龄以及章乃器的信赴上海^②。10月,中共为蒋介石与周恩来即将举行的会谈制定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③。这份文件,依据了中共在6月向南京提出的北方局案和据此向中共提出的国民党案,并在8~9月间中共转变政策的基础上得以具体化。11月,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举行了两党高层会谈,但未能就红军改编并归南京政府管辖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周恩来也未能实现南京之行^④。

① 这一文献刊登在中共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第118期(1936年12月8日)上,参见[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版,第74~75頁。

② 《致宋庆龄》、《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5页。在后一封信中,毛泽东通过对他们的言行表示支持,也谈及了中共的“民主共和国”的构想,并将之增加在8月25日致国民党的信中。同时,潘汉年还希望与他们保持经常的意见交流。关于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给章乃器等寄的另一封信,参见:《毛泽东同志致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共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5页。)及第八章。

③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448页。

④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6页。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革命”

1.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致三中全会电报”

根据共产国际的8月指示,“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中共与张学良也即东北军的同盟关系,也要在“逼蒋抗日”的整体结构中重新定位。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其背景是“三位一体”关系的建立、西安各界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以及中共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联合并由此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和实施宁夏作战受挫等,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对强制推行“剿共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所引发的。

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中共不仅评价其为“革命的行动”,并且提出以下构想:(1)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成立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与晋绥军的抗日联军;(2)由各地方实力派参加的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3)罢免蒋介石,进行人民公审。但到了12月15日,中共以第三者的身份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其重点在于确保红军主力作战的“范围”^①。20日,中共收到了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下述电报:

(1)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发动已成事实和应当顾及事实,中国共产党要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a. 通过吸收几名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b. 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c. 停止执行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建立联合抗日关系;d. 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96~311页。

(3)我们建议不提议同苏联联合的口号^①。

21日,中共隐藏了电报的第一条而只把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内容向张学良作了传达。因此,张学良认为共产国际对事变的政治成果是认可的,并且对张、杨的政治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这种理解就不难想像了^②。20日以后,中共明显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呼吁南京政府停止军事进攻,召开和平会议就抗日救亡及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如果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话,中共会站在西安一边,这是中共一贯的立场^③。

1937年1月19~20日,就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的中共对形势的分析及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认为那不是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而是在挑起分裂,并对此提出了批评。并进一步提示:(1)由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埃组织,但不以政权形式而以群众组织的形式存在;(4)放弃普遍实行的没收土地政策。由此提出对中共根据地的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民主管理制度转变是否适宜的问题,也要加以慎重的研究^④。在毛泽东与洛甫起草的《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这些提法均有具体化的表述,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这份电报^⑤。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中共以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政策的转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78页。

②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33~334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30~331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7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页。关于《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内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937年2月5日向中共提出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3期,第80页)。在这封电报中,两者在行文上有所不同,表明双方存在分歧,但没有详细说明。

变为前提^①,提出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承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中指出:(1)国家的基本要素在于政权统一、军队统一和军令统一,(2)停止对赤化及阶级斗争的宣传,中共向政府表示“输诚”^②。由于《决议》表示放弃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走势由此得以确定。

2. 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变及苏区代表大会

2~6月,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就国共合作抗日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谈判^③。由于国共再次合作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中共组织体系也面临着就国共再次合作形势进行相应转变的问题。

3月23~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及张国焘问题。对于前者,(1)在23日的报告中,洛甫指出,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民主的权利”,特别强调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赢得领导权的重要性^④。(2)在同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从“主次矛盾”关系的角度对当时形势进行的分析,引人注目^⑤。会议认为,当前急切的问题在于,召开苏区党的代表

① 电报称:“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参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② 《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36页。

③ 郑惠、张静茹、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④ 洛甫:《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4~665页。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间,毛泽东对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进行了评析,并对“矛盾”论的认识方法进行了探讨(参见第十章)。

大会、发出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派遣干部、准备发行报纸、展开宣传工作、提出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正案、确定工人及农民的斗争纲领、对中共党组织的改组进行确认等^①。此外，会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并予以清算^②。从4~6月间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来看，对红四方面军实现了军令的统一（参见第九章）。

5月2~14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第一，当前是抗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其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平），要力争实现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对日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争取民主”，也即是指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变革（“将政治制度上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专制政体，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他认为，只有争取民主，才能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国内才能团结，才能保证巩固和平，一致对外抗战^③。第二，以主次矛盾的角度，对当时的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即：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及国内阶级矛盾为次要矛盾，所以反对中国统一与和平的日本帝国主义与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其他若干帝国主义是不同的，由此决定了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和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分化，后者有参加抗日阵营的可能性。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民主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应该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亲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等各抗日的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①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5页。

^②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168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5~257页。

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①。第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即放弃苏维埃的政权形式(“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入手,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张^②。在报告中,毛泽东从主次矛盾的分析视角,从抗战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抗日”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策略性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构想等方面,对新的形势作了回应,由于声明放弃苏维埃革命,自然就有了提出新的革命路线的必要性。

3. 洛川会议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

国共合作显示出中国抗战态势的形成,使得卢沟桥事变已不可能由“就地解决”的方式实现事态的“平静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发展成为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③。7月14日,周恩来等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抵达庐山,并于15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17日,实现与蒋介石的会谈,但没有就中共军队的指挥权问题达成妥协意见。7月下旬,由于华北战事正式爆发,蒋介石督促改编红军和出兵前线,对于这一要求,中共中央没有同意。8月4日,蒋介石在公布改编后红军的番号的同时,承认八路军总指挥部的设置。18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朱德、彭德怀分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由于国民党的让步,使中共军队指挥权的问题得以解决,此后,有关“宣

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2、254、260、261~262页。

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6~277页。

③ [日]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對中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古屋哲夫編:《日中戦争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年版。

言”和边区政权的问题成为了谈判的中心议题^①。

由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及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即将展开,8月22~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中心议题是:(1)政治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关系问题。张闻天对第一类、毛泽东对第二、三类问题分别进行了报告,在报告的基础上讨论形成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大纲》以及由毛泽东起草的作为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文件^②,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见第二章)。会议在对国民党向对日抗战的转变及对日作战的发动“是值得表扬的”,但对“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与改革政治等问题上则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还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还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还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彻底与真诚合作的程度改变”等问题提出了批评^③。会议认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④。“中国共产党现以满腔的热忱向着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本的十大救国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要“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第10项),其基本策略包括:(1)“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

① 在8月12日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康泽要求删除“宣言”中的强调民主、解释三民主义、与国民党达成谅解共赴国难等三点(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随即,“宣言”与蒋介石谈话均取消了相关内容。此外,中共边区政府问题的核心是正副主席的人选。在“宣言”内容上,中共作出让步,而在其他两个方面,国民党做出了妥协。9月22~23日,“宣言”发表后,蒋介石的讲话也随即发表(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9页)。

②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254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延安:《解放》第15卷第7~8期。

④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6页。

战”(第2、3项);(2)“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第4项)^①。前者应该成为保证中共军队在抗战方面独立性的前提,而后者则是“民主的获得”这一直至全面战争爆发中共所坚持的主张的继承。

9月22日,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公开宣称中共的奋斗目标是:(1)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2)实现民权政治;(3)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②。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共产党人即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③。从蒋介石的谈话来看,国民政府已公开将中共力量纳入体制之内,国共关系由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④。至此,中共围绕洛川会议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十

^① “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318页。

^②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8页。

^③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实录》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402页。

^④ 如前所述,对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启动,国民政府、国民党认为是中共向国民政府的“投诚”。

大纲领”的实现,得出要抓住“抗日民族革命”的认识^①。

结 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中共的总兵力,只有八路军数万人及新四军1.2万余人;1945年,中共已拥有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抗日根据地所控制的人口扩大到9550万余人^②。在分析这一问题时,笔者认为,除陕甘宁边区之外,有必要对所有抗日根据地包括日军占领区的建设进行考察。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是国民革命军(中国军)的一部分,由此,中共的政治主张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形态,也应看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结构中的体制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应该视为中国军队军事活动的一部分。身处边区的中共的统治方式与大后方的国民党是不尽相同的,中共的政治威望不断上升,而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日益低落^③。此外,中共军队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导致了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转化,也引起了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④。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契机,中共基于政治、军事两方面的发展,所设计的“抗日民族革命”构想,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起点,最终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实践中逐渐得以系统化。这意味着,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中共力量完成了从地域权力向地方政府的转变,是走向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道路的重要政治转折点。

①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认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他,才能挽救中国。”参见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延安:《解放》第18卷,第8页。

② 《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83页。

③ 王桢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抗日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3~6页。

④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日军占领区域开展游击战,完全有可能导致敌我双方力量的相互转化。而且实际上真正开展这种游击战争的,基本上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军队。

第二部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 与中共的白区工作

第四章 平津地区

——一二·九运动与北方局

前 言

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为契机,民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经由西安事变而于1937年9月实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中国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转折,形成了对日抗战的新局面。

在日本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平野正所著《从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救亡运动到民族统一战线》^①一书,是在中国80年代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这一时期民众运动发展过程的。安井三吉所著《卢沟桥事件》^②一书,对这一时期平津地区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的性质及其实态进行了分析。本章的目的,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1935~1937年间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活动实态作进一步考察。

一、一二·九运动与平津地下党

1.《何梅协定》与平津中共地下党

从1935年起,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根据6月份签订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冀察、平津地区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力量明显减弱。这一“政治真空”为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① 東京:研文出版1988年版。

② 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

重建提供了契机^①。

1935年2月,随着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失去了统一指挥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②。5月,作为中央代表及北方局主要负责人的孔原被调回,华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由驻天津的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兼管^③。并且,北平和天津两个中共市委都是在1934年被破坏的^④。1935年1月,在许子云主持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及其组织以及党的外围团体得以恢复。但5月国民政府的镇压,又使其受到极大的损失^⑤。在这种形势下,平津地区的中共组织迎来了“政治真空”期。6月,省委(中共北方局)指示李常青、李大章分别在北平、天津重建党的组织^⑥。北平市工委由幸免于5月镇压的王学明(书记)、彭涛、杨子英负责,周小舟担任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北平分会(简称“北平武卫会”)的领导^⑦。李大章和彭真在天津成立了北方局天津工作组^⑧。另外,在

①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26、44~4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③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高文华:《关于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若干历史情况》,《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2~563页。

④ 黄景山、张京民:《“二战”时期中共北京(平)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北京:《北京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4~35页。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0页。

⑤ 黄景山、张京民:《“二战”时期中共北京(平)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北京:《北京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6页。

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58、60页。

⑦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宋柏主编:《北京现代革命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⑧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上海的中央局停止活动后,在镇压中幸免于难的军事委员会(特科)系统的一部分干部,与王世英一起转移到天津,利用合法身份开展上层统战工作^①。

北平武卫会是1935年初成立的秘密组织,负责人是李世庸,有70~80名会员,5月,在遭到镇压后不得不改组^②。7月,长江、黄河及大运河相继泛滥,北平街头到处是难民^③。8月,北平武卫会由彭涛、周小舟、姚依林、黄敬、郭明秋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水灾赈济会问题。9月2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10月,该会在北平市社会局合法注册^④。此时,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新方针传到了平津地区^⑤,左派知识分子以此为基础,开始摸索如何将民众救亡运动具体化并与学生运动相结合的模式^⑥。与此同时,这也使市工委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坚持以往方针的王学明、冷楚,与主张贯彻共产国际新精神、实施政策转变的杨子英、彭涛形成对立意见,甚至发展到市工委会议都无法举行的地步^⑦。11月,省委支持后者的意见,决定:(1)组建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谷景生);(2)派遣李常青任驻北平

① 叶英、冯凯:《南汉宸》,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5页。“中央特科”是1927年由周恩来在上海设立的情报机构,主要负责组织保护、营救被捕者、收集情报、制裁叛徒、通信联络等工作。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62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现代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④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现代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⑤ 当时,北京饭店一层有一家法国人经营的法文图书馆(书店),在此可以购到《国际新闻》、《共产国际》、《救国报》等报刊。参见姚依林:《“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24页。

⑥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08页。

⑦ 周小舟:《我与“一二·九”》,姚依林:《“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同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323页。

特派员^①。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水灾赈济会向北平学生联合会逐渐转变的条件日益成熟,水灾赈济会自然解体。11月18日,北平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成立,主要领导人员有郭明秋(主席)、姚依林(秘书)、孙敬文(总交通)、邹鲁风(总纠察),均为中共党员,由彭涛任书记、谷景生、周小舟组成学联党团支部^②。

2. 一二·九运动与重建市委

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此举在填补这一地区的“政治真空”的同时,也是考虑日军意向的产物。此时,为在华北五省建立“自治”政权,日军正加紧策划华北“自治运动”。11月24日,冀东地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危机感强烈的国民政府,立即派何应钦北上。12月8日,又决定成立由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2日,再分别任命宋哲元及其部下为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市长。12月18日,“半独立”性质的“地方实力派”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③。

北平学联决定以向何应钦请愿的方式开展具体的抗日救亡活动^④。12月6日,北平学联发表“成立宣言”,颁布了9项纲领^⑤,其中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河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1920~198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③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48~65页。

④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⑤ 这9项纲领是:(1)反对分割中国领土的华北防共自治运动;(2)反对一切屈服投降的秘密外交;(3)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救国运动的绝对自由;(4)立即停止内战,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对敌宣战;(5)全国人民总动员,总武装,保卫华北,驱敌出境;(6)成立民众武装自卫组织,领导中华民族革命战争;(7)没收敌货及汉奸财产,充作抗日经费;(8)成立中苏人民互助协定;(9)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北京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148页。

第4、5、6项表明,这个“宣言”并非来自“八一宣言”,而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①。

彭涛、郭明秋、孙敬文和姚依林等人,为12月9日的请愿活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②。当天,虽然他们的请愿行动受到了军警镇压,不少人受伤,请愿也失败了。但此后数日内,北平各校的学生迅速组织起来^③。16日,北平学联举行了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游行。18日,学生运动波及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师、中共党员杨秀峰、温健公、阮幕韩、闻永之等在天津领导了学生游行。19日至25日,不少学校举行了罢课活动,学生自治会相继改组^④。年末,天津学联和平津学联相继成立。在平津地区学生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省委重建了北平(书记是林枫)和天津市委^⑤。

3. 南下扩大宣传团和运动的低潮

为了将高涨的学生运动平定下去,国民政府下令提前放寒假。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成员中的中共党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为扩大运动影响,同时也为了粉碎当局的攻势,锻炼积极分子,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

12月30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决定实

① 《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所提出的第6条和《八一宣言》提出的十大纲领参见第三章的注释。有关“八一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可能是在1935年11月前后。参见:《中國ソヴェト政府及中國共產黨連名ノ反日檄文ニ關スル件》,1~4~5~2~1~1,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存。唐宝林认为,宣言传入平津地区的时间应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见唐宝林:《“八一宣言”最早传入国内的途径和时间》,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3期,第20页。

②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页。

③ 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第5集(1980年),第164页。

④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6~548页。

⑤ 穆欣:《林枫》,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9页。

施南下宣传计划^①。南下宣传团设立总指挥部,由董毓华任总指挥,姜文斌与宋黎任副总指挥。同时组成以彭涛为书记、三名正副总指挥为成员的党组^②。南下宣传团的成员超过450人,编成4个团,在组织和行动上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③。1936年1月2~3日,南下宣传团开始行动。通过在外地的宣传,团员们认识到了组织武装团体的必要性。改组后的北平学联党组(书记为姚依林),考虑到武卫会的范围太小,‘左’倾色彩较浓,开始着手寻找替代的组织形式^④。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举行成立大会,该队建立了由黄敬为书记的党组^⑤。此时,高涨的学生运动,也促进了北平救国会组织的建立。1936年1月,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北平妇女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艺青年救国会相继成立^⑥。

然而,由于学生运动的核心成员在南下宣传团组织下离开了平津地区,国民党系的学生活动开始活跃,处于鼎盛时期的学生救国运动急

①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328页。宋黎:《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高潮:回忆“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190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

③ [日]平野正:《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救國運動から抗日民族統一戦綫へ》,東京:研文出版1988年版,第73页。

④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

⑤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现代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7页。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速衰落。进入2月,国民政府平津当局开始对学生运动实施镇压^①。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北平市委决定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转移到外地。蒋南翔去了上海,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去了天津、沧州^②,林枫、彭涛也转移到了天津。基于这种形势,北平、天津两市委再次进行改组。李雪峰就任北平市委书记,何凤、徐高阮分任组织和宣传部长,另外,在东区、西区、北区和西郊区设立了区委^③。2月,改组后的天津市委,由来津的林枫(书记)、彭涛和李启华组成^④。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的抬棺游行被镇压,学运遂进入低潮。

二、中共的统战工作与刘少奇

1. 刘少奇莅津与学运再兴

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的使命是:使党的新方针适合实际的斗争环境,在加强党组织同时,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⑤。3月底,刘少奇抵达天津。4月,北方局改组,刘少奇任书记,彭真、陈伯达、林枫分任组织、宣传和秘书

① [日]平野正:《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救國運動から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へ》,東京:研文出版1988年版,第79~80、88~89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③ 李雪峰:《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北平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④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58、60页。

⑤ 赵舒:《张闻天与瓦窑堡会议》,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28页。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长职务^①。同月,刘少奇在发表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指出:(1)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将中国革命导向胜利之路的关键所在;(2)为此必须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②。在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新精神实行政策转变后,这篇文章提出了中共北方局相应的具体指导方针。刘少奇还就举行三·三一游行批评了北平党组织的做法,并派李葆华、赵仲池等人改组北平市委。由此,改组后的北平市委由李葆华(书记)、赵仲池、李雪峰等人组成。5月,柯庆施代替李常青任省委驻北平代表^③,随着林枫调任北方局秘书长,易吉光就任天津市委书记^④。

由于1935年1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青团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声称要以抗日救国为目的、将共青团改造为更加广泛的青年团体^⑤。1936年4~5月,所有的共青团员转入中共,平津地

① 与此同时,北方局与河北省委进行了组织分离,后者只管辖河北省内的各个组织,省委书记仍然是高文华。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河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1920~198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09页。

②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此文曾以《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为题,发表在《火线》第55期上。

③ 李雪峰:《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北平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李葆华:《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二月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简况》,同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345、350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河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1920~198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④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516页。郭晓平主编:《中国青年团史:1922~1992》,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程玉海、田保国、林建会、张维克:《青年共产国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257页。

下青年团组织不复存在^①。此外,平津地区的三个学联改组为学生救国联合会^②、武卫会编人民先队^③。北方局考虑以学联、民先队为基础重建青年学生组织,这一时期,平津学联、文教界及其他各界人士联合成立了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④。

4月,日本政府将中国驻屯军^⑤从1771人增加至5774人。5月初,刘少奇指示天津市委:(1)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2)提出“支持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5月28日,天津军警对天津学联组织的反日游行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各界给予热烈的声援^⑥。6月13日,北平学生也成功地举行了反日游行。这些活动表明,随着刘少奇来天津后平津地下党组织的策略转变,该地区在三·三一游行后处于停滞状态的学生运动再度复兴。

2. 对宋哲元工作与中共地下组织的重建

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为转机,在冀察两省和平津地区建立了“半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政权的宋哲元,也成为平津中共地下党最重要的统战对象。直至1936年3月,平津中共地下组织一直将宋哲元视为

① 李雪峰:《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北平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李葆华:《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二月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简况》,同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45页。李雪峰虽然讲述的只是北平的情况,但由此可以推断天津的情况大致相同。

②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2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现代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④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大事记:1935~1937》,编者1985年印,第552页。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1页。

⑤ 1901年后,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为扩大其在华北区域的侵略提供军事支持。

⑥ 程宏毅、杜文敏、姜思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党在天津“一二·九”运动中光辉业绩》,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60页。

“卖国贼”、“逆贼”^①。4月以后,对宋哲元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6月,北方局决定了争取宋哲元的方针^②。按此指示,北平学联对第二十九军展开了宣传工作。5月,改组为华北联络局的“特科”等系统,也对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高级军官展开统战工作。在彭雪枫、王世英领导下,徐冰、杨秀峰、张友渔、许德珩等参加了这一工作^③。

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赴陕北。对此,中共中央派张金吾(张经武)到宋哲元处任联络代表,刘少奇指示王世英派张友渔帮助张金吾工作。9月,宋哲元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中共党员释放出狱。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后,北平学生于12月12日在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后于景山集会。宋哲元派北平市长秦德纯到会。在数万民众面前,秦德纯表示:第二十九军希望与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合作,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④。由此,中共与宋哲元的关系有了质的进展。当时,第二十九军内有一些中共党员在活动,如副参谋长张克侠、参谋处的肖明、情报处长靖任秋、军训团大队长马洪国等,他们对第二十九军的抗日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⑤。

1936年下半年平津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4~5月,在党团一元化(取消共青团)的基础上改组市委组织。9月,天津与北平市委增设了专管学校支部的学委^⑥。第二,以“五·二

①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87頁。

②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頁。

③ 程宏毅、杜文敏、姜思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党在天津“一二·九”运动中光辉业绩》,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157頁。

④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頁。[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89~90頁。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01頁。

⑤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91頁。

⑥ 李启华:《我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頁。李葆华:《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二月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简况》,同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资料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頁。

八”游行为转折点,天津地下党有了新的发展,除过去已有党支部的法商学院、南开中学外,又在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扶轮中学、法商学院商职部、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建立了党支部。此外,塘沽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促成了塘沽区委的成立。至1936年底,天津民先队成员达到了700余人,其中40%为工人、自由职业者和保安队巡警^①。第三,起因于“北平问题”的中共北平市委内部纠纷。6~7月,宣传部长徐高阮批评市委过分重视组织纪律与纯洁性,不能根据新的形势开展统战工作,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党内革命”。10月,刘少奇在所写《关于北平问题》、《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等文章中,就问题所在提出了具体的对策。11月,作为北方局代表的彭真来到北平,对北平市委进行整顿,“北平问题”遂得到了基本的解决^②。

3. 统战工作的核心——北方局

1936年4月后,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是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唯一派出机构。该局的工作重点是:在重建处于瘫痪状态的华北各地中共党组织同时^③,通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尝试开创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北方局的统战工作对象是国民党、知识分子和地方实力派,由“特科”系统担负着这一工作。有关这一问题,需特别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国共秘密接触。1935年底至西安事变前夕,国共间秘密接触的渠道有4条,北方局是其中的一条(参见第二章)。该渠道以1936年5月南京政府提出的合作条件和6月下旬北方局的相应提案为依据

^① 程宏毅、杜文敏、姜思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党在天津“一二·九”运动中光辉业绩》,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168页。

^②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81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③ 关于北方局对白区党组织的建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概括如下:加强对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建立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和华南的若干组织,向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派遣干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1页。或参见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7页。

拟定了“谈话记录草案”。以此为基础,10月11日,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6月的北方局提案涉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口号的变更、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改编、将来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可能性等问题^①。

第二,宣传工作。1936年4~6月间,刘少奇撰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民族解放人民阵线》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自由评论》和《生活日报》上,这也是中共的抗日救亡运动工作具体化以及与党外知识分子合作的重要方式。此外,北方局通过救亡团体发行了《华北烽火》、《国防》、《长城》、《中国人》、《华北评论》、《人民之友》等杂志,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普及作出了努力^②。

第三,刘少奇在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的建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考虑到上海与华中、华南地区的便利联系,有利于组织的安全,刘少奇主张在上海建立全国学联和救国会等全国性组织。平津学联向上海派遣的代表们,积极地参加了全国学联的筹备成立工作。此外,筹备成立“全救会”的各项事项,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钱俊瑞和天津学联赴上海代表黄敬、刘江陵具体负责(参见第五章)。1936年5月,全国学联和“全救会”在上海成立。

第四,对地方实力派人物的统战工作。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统战工作最主要的对象是宋哲元。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三位一体”关系基础上建立“西北大联合”构想的考虑,北方局着眼于配合这一构想而具体建立起“北方统一战线”,并展开了对华北五省地方实力派首脑的工作,其中投入最大且卓有成效的,是对阎锡山的工作^③。

①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3页。

②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③ [日]内田知行:《閻錫山の民衆統制と抗日民族統一戦綫》、《中國史における社會と民衆:増淵龍夫先生退官紀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3年版,第246~254页。

三、白区工作与华北的新形势

1. 白区工作会议的召开

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治格局逐渐朝着对日抗战的态势发展。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将苏维埃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建议,放弃了军事解决中共与红军问题的方针。中共也根据国共再次合作的具体政治问题提出了新的方针。5月,在苏区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与《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对日抗战不可缺少的前提是,在抗日与民主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政策性问题要有明确的方针(参见第三章)。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间,中共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管辖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十年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根据党的新路线制定白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①。5月17日,刘少奇作了题为《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他在论述了随着形势发展而提出新路线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在党内还存在着至今尚未彻底克服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②。会议对报告的讨论一直持续到5月26日,围绕对白区评价是否严厉、白区工作转变的出发点是“左的一贯传统”还是政治形势变化、如何应用合法斗争形式等问题上,与会者间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③。

为统一认识,中央于6月1~3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6日,白区工作会议复会,张闻天作了题为《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指

^①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璞玉霍、徐爽迷:《党的白区斗争史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②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8页。

^③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205页。

出:过去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上所犯错误,只是策略失误;坚决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①。9日和10日,刘少奇在同意张闻天报告的基础上,对其5月17日的报告作了自我批评,说明并非要完全否定以往的工作,报告的确存在着分析不够和过于极端的地方^②。6月10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后闭幕。在主题报告中,刘少奇将以往白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归于“左的一贯传统”的意见未能通过,张闻天在报告中所称“策略失误”的提法得到了认同^③。

2. 华北新形势与平津地下党

西安事变后,北平学运产生了新的保守派组织(新学联),与北平学联产生了矛盾和竞争。尤其是在北平市当局强化对学生自治会、救国会、民先队的取缔后,这种冲突更加严重。为此,北平的中共党组织中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徐高阮、徐芸书等人在否定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同时,主张青年和学生应从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此,1936年12月至1937年1月间,中共北平党组织专门召开学委扩大会议,以统一党内认识^④。1937年1月底,刘少奇发表《论左派》的文章,认为左派力量的共同点在“抗日救国”、“停止内战”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等上面,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由左派势力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⑤。这一精神成为应对新学联问题、解决

①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②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③ 1943年3月,在整风学习报告中,刘少奇对白区工作会议做了如下论述:“反对者在党支部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影响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一起,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参见:《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287页。

④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25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现代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页。

⑤ 《论左派》,《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295页。

内部不同意见的指南。2月初,北方局由天津迁至北平^①。这是由于中共与宋哲元的关系已有实质性进展,加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局面,在华北政治中枢的北平指导统战工作与民众运动是十分必要的。2月6日,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代表全国18个地区队部6000名队员的24位代表与会。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7人当选为全国总队部的领导人^②。为抗日救国的目的,北平学联提出与新学联合作的呼吁,以实现学生运动的统一,这一呼吁得到了许多学生的支持。5月后,新学联的活动开始衰败^③。

以绥远抗战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宋哲元也在明确抗日立场的同时,明确支持“中央化”的方针^④。进入1937年,中日两国在华北地区的冲突与纷争不断,在卢沟桥附近驻屯的日军不断进行演习、勘察和干部的视察活动^⑤。针对这种事态,北平学联和民先队也对学生展开了军事教育。6月,国民政府指示各地大学、高中实行军事训练。北平学联利用这一机会,频繁与第二十九军官兵进行接触,并派党员和民先队员参加在西苑的军事训练^⑥。

7月7日,中日军队在卢沟桥附近发生冲突,北平学联、民先队和各种民众团体积极展开了抗日活动。23日,组成北平各界抗战后援会。29~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失陷,大部分中共党员离开平津两市。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215页。

③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220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现代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

④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114頁。此外,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与中日关系的影响,请参见[日]田中仁:《1930年代における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日中關係》,松田武、阿河雄二郎編:《近代世界システムの歴史構圖》,廣島:溪水社1993年版,第151~152頁。

⑤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版,第147~148、151頁。

⑥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234页。

8月6日,北方局也从北平转移到了山西省太原市^①。

结 语

根据上述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一二·九”运动是由于平津地区的政治格局变化——因日军分裂华北的活动而出现“政治真空”状态——以及共产国际“七大”新精神在当地中共组织中的传达而引起的。第二,1935~1937年间,作为平津地区学生运动组织基础的北平武卫会、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平津学联和民先队等,均处于中共的直接领导之下。第三,拥有左翼文化运动经验的左派知识分子,以由上海转移来的“特科”系统为媒介,在“一二·九”运动中集结起来。第四,刘少奇赴津后,北方局作为中央在白区的唯一派出机构,重建了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开展了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五,1936年下半年,中共与以冀察两省为基础的“半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宋哲元间,建立了秘密的稳定接触关系。第六,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总结报告不得不做修改,这也为他与王明的分歧自1937年底发生、至40年代前半期愈加明显化埋下了伏笔^②。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刚回国的王明对去年10月刘少奇执笔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提出了批评。参见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303、309~310页。关于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的分歧,参见:《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253页。

第五章 上 海

——救国会、救亡协会与上海地下党

前 言

划时代的九一八事变,使“抗日”这一政治课题,成为了此后中国政治的主旋律,虽然当时国共两党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并不十分明确。在这种形势下,知识群体所掀起的“抗日”思潮与运动,在促进中国政治走向抗日抗战态势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①。以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为契机,迎来了大城市民众的抗日运动的高潮,紧接着以上海为中心、成功集结了全国的抗日派知识分子的“救国会”运动,形成了寻求抗日的诸多政治势力的一个结节点。

笔者以为,学界以往对“救国会”的主张与活动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的引导所做的高度评价,其中心论点与《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②和毛泽东的《致章乃器等一封信》^③关系莫大,对这两个文献的性质必

① [日]平野正:《中國の“第三勢力”の系譜をどこに求めるか》,東京:《中國研究》第99期,第23~41页。

② 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115~127页。

③ 《毛泽东同志致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5页。

须要慎重地加以考察^①。笔者对这一运动的评价,即以对1936年11月间内蒙古地区傅作义将军抗战的支援活动和上海华纺工人罢工为契机,城市的抗日运动不断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本章的宗旨在于,对这一时期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进行考察。同时,对与中共路线转变相关的中国政治的新发展,是如何极大地影响着上海救国会的活动也予以详细的分析。

本章所用资料,以当事人回忆资料为主。根据这些资料可知,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被国民政府破坏严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在当事人回忆以外的有关资料中没有找到有关的记载。显然,回忆材料具有局限性,如记忆不准确、由于当时所处位置对事情了解的局限性、有意无意地美化自己等等,因此,对每件事实要查证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才能从中获得基于史实的具体判断^②。

一、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192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③,遭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搜捕,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其结果是,为区别苏区中央成立了上海中央执行局,代表中央领导白区的地下党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事宜。事实上,江苏省委员会(包含上海地区)是

① 在以往有关“救国会”的研究,[日]古殿忠夫:《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の形成と發展》(東京:《歴史評論》第243期,第72~96,132頁)],[日]水羽信男:《抗日民衆運動の展開とその思想》、池田誠編著:《抗日戦争と中國民衆: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第100~121頁、[日]平野正:《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救國運動から抗日民族統一戰綫へ》(東京:研文出版1988年版)的论著已有开拓。笔者对两个文献的性质有自己的分析,前者见于本章,后者见于第八章。

② 1979年7月,上海有关方面专门组织了“上海党史调查组”,进行系统的访问调查。参见《党史资料丛刊》第1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不少回忆资料,在文末都附有调查进行时的时间、整理者姓名,笔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也特别注意了回忆资料的局限性问题的。

③ 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在上海中央执行局的领导下设立的^①。上海(临时)中央局于1933年1月、1934年9月和1935年3月先后组建三次^②,无一例外地受到国民政府的破坏。1935年7月22日的大破坏后,上海仅存中共党员200余人,共青团员300余人^③。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王明、康生5月3日在给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信中称,现在上海的中央组织已无存在必要,8月26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收到此信后便停止了活动^④。

据王尧山的回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状况如下:

一九三四年,上海地下党的各个系统,都失掉了党中央的领导,但是党的部分组织、部分力量还保存着。当时保存下来的力量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的“文委”系统。“文委”领导下的“八大联”中都有党员^⑤。一九三五年,党员数目在百人左右。

(2)共青团江苏省委。它在上海也有各团区委的组织,但和党的系统是分开的。他们联系的一部分团员,都分布在纱厂、烟厂、邮电以及女青年会办的夜校中。

(3)当时“工联”保存下来的党员也不少,主要的力量在纱厂、烟厂;在机器厂、印刷厂、丝厂也有零星的力量。“工联”系统中的党员约有近百人。

(4)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武卫会系统)。“武卫会”名义

① 黄然:《关于1933年上海中央局的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2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② 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4页。马红:《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360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④ 马红:《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66页。

⑤ 左翼文艺总同盟(简称“文总”,1930年7月成立。),是在“文委”领导下的团体。“文总”由“左联”、“社联”、“剧联”、“美联”、“影联”、“教联”、“音联”、“语联”等“八大联”组成。

上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实际上是党员在工作。“武卫会”系统党员有二三十人。

(5)情报系统。当时叫“特科”,也留下了一些党员。

另外,这些系统中的好多党员是在外地失掉组织关系后,跑到上海找组织,找不到就参加到各系统的外围组织中去工作。这些系统当时和党中央都没有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横的组织关系,都是独立开展工作^①。

二、路线“转变”与“临委”的成立

1. 共产国际“七大”与“转变”的探索

1932年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后,苏联大使馆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一个小书店,内有《国际新闻通讯》和《莫斯科日报》等报刊出售。“文委”、“文总”由此得知了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大会决议及有关代表发言的情况,并翻译和油印了有关文件,包括检查材料等^②。

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刊登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报》上。这份《救国报》与《救国时报》(《救国时报》是在《救国报》被法国政府当局勒令停刊后,在原有基础上于12月9日易名创刊的),在1936年初以后,按照《新生》杂志订购者名单大量赠送^③。此外,为宣传“八一宣言”,1935年9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还把“宣言”寄给美国的中共组织,并指示印刷了数万份“宣言”,以各种方式

^① 王尧山:《1937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380页。

^②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页。

^③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185页。

送给南京政府的要员以及各党派、各团体、报社、社会名流、华侨团体^①。由此,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方针、“八一宣言”以及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新提案,得以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中传播。

在经过1935年7月的大破坏后,重建的“文委”以周扬为书记,章汉夫、钱亦石、夏衍、吴敏等为成员^②。9月以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的新精神,“文委”就如何转变活动方式展开了讨论^③。此后,中共各系统也都在探索各自的路线转变问题。这个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文委”系统:

1935年10月上旬:“文总”新的党团组成(书记:胡乔木,成员:邓洁、王翰)^④。

10月25日,“文总”常务委员会在下达的《关于发表新纲领的紧急通告》中指出:“左翼文化运动,必须综合广大群众的积极要求,不问政治的立场和派别,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在反帝抗日反蒋;在保卫新文化等等口号之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以抗日反蒋为最主要的斗争目标。”^⑤

11月上旬,“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收到了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在信中,萧三希望“左联”的工作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机,“要求一个大的转变”;要“追随”、“符合”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应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① 李良志撰、田中仁译:《抗日民族統一戦綫樹立における王明の役割について》,《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第2號,1990年,第246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③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①。

12月,根据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发展,“文总”以及所属“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作出了解散的决定^②。

此后,这些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均转到了各个救国会内工作^③。“一二·九”运动之后,“文委”联络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社会名流,召开了救国会代表与“武卫会”、“全总”、“文总”及各联合会的联席会议。同时,由王翰和“左联”的何家槐建立了领导学生运动小组^④。

第二,共青团系统:

1935年11月1日:为从根本上改造共青团组织,中共中央决定现有团员一律加入到合法、公开的民众组织去^⑤。

1936年1月:共青团江苏省委从巴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共青团中央主张把共青团改变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青年团后决定:(1)继续坚持独立工作,停止发展共青团员;(2)停止出版团刊《群众的团》和《少年真理报》;(3)团员以群众面目出现,参加救国会的公开抗日救亡活动^⑥。

第三,“全总”系统: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页。

③ 武敏、姜萍:《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介》,史先民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这里所述只是“社联”的情况,其余七个团体的情况大概相同。

④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此外,这个“中共中央”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当时停止活动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以及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认真考察的。

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页。

1936年2月16日：“全总”白区执行局决定成立日商纱厂工作委员会（简称“纱委”，成员有陈之一、郭光洲、张维桢、韩念龙、周林）^①。

第四，“武卫会”系统：

1935年11月：“武卫会”党团组织进行调整（书记是林里夫，成员有陈璧如、李建模、袁牧华），为防止国民政府的破坏，党团组织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在最可靠的20~30名干部间保持单线联系，暂时切断其他所有关系^②。

“武卫会”党团的这项决定，是针对“党团中有人被捕叛变，出卖了组织”^③，而采取的一项防护措施。其后，估计这个系统的大多数党员，都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

总之，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上海中共地下党各个系统均在组织和活动等方面进行了重新的部署，并力图通过“救国会”运动开展活动。

2.“临委”成立与救国会党团

1935年12月到1936年2月间，上海妇女界、职业界等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展开了广泛的民众救亡运动。“文委”已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首先“文委”是以领导“八大联”等文化、教育界的左翼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大众组织为目的的，与此相对，救国会是由工人、店员、民族资产阶级、学生等由不同阶级构成且具有职业差别的群众组织^④。与救国会的快速发展相对照的是，被破坏严重的中共江苏省委、区委，同时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6年2月，“文委”决定成立中共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

^③ 王尧山：《1937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④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页。

江苏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以更有效地领导救国会系统的党员开展工作^①。“临委”的组成是:书记邓洁,成员有胡乔木、王翰、丁华、王新元、钱俊瑞。各救国会也相应成立了中共党团,以便有效地管理救国会各系统的党员^②。这些党团组成为:(1)文化界救国会(“文教”):书记钱俊瑞,成员曹亮、王新元、钱亦石、孙克定等;(2)妇女界救国会(“妇救”):书记杜君慧,成员林立、张惠英;1936年夏改组:负责人林立,成员罗叔章、邓洁;(3)职业界救国会(“职救”):核心小组林枫、雍文涛、顾准、王纪华、陆志仁、刘峰;(4)国难教育社:书记丁华、郑伯克,成员张劲夫、王洞若、张敬人等;(5)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书记钱俊瑞,成员王翰、石不烂、张劲夫、钱亦石等^③。

据王翰的回忆,“临委”与“文委”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文委”的成员以前均是领导人,所以我们很尊重他们。但由于他们太忙,还要对救国会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所以对“临委”的工作并不太干涉^④。

3. 冯雪峰、潘汉年来沪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以及王尧山、沙文汉等到上海,以恢复上海地下党与陕北中共中央间的联系。冯雪峰向邓洁传达了在上海暂时不发展党员(“并非一个党员都不允许发展”)的中央指示,理由是:(1)“上海是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地方,随时都会发生白色恐怖,要提高警惕”;(2)“上海地下党遭受的破坏严重,要防止奸细混入党内”;(3)“用革命的群众团体把进步群众组织起来,积极分子在党外的群众组织中留一段时间,晚一些发展入党没有害处,如有不测,也不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440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440页。

④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致于造成大损失。”^①

另一方面,1936年7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胡愈之^②从莫斯科返回上海,胡愈之在救国会内展开工作^③。潘汉年在上海停留数日后即离开,8月8日抵达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④。9月,潘汉年回到上海,并设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⑤,其主要任务是在上海开展统战工作,负责与国民党间的联络和收集白区情报等^⑥。从当时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系统来看,潘汉年等人应该属于中共的“情报系统”^⑦。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402页。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377页。

② 1935年底,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胡愈之成功地使张学良的政治态度逐渐转向积极抗日。为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胡愈之从上海至香港,赴巴黎经由莫斯科前往陕北。参见胡愈之:《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

③ 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胡愈之:《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385页。

④ 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页。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⑥ 王尧山:《1937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383页。

⑦ 许涤新:《战士“覆盆”廿五年:纪念潘汉年同志》,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三、救国会与上海地下党

1. 救国会上层人士与中共关系

此时,担任“上救”(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副总干事、“全救”组织部干事的中共党员徐雪寒,曾对救国会的组织形态有如下叙述:

“救国会是一个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最好组织形式,公开救国领袖有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史良等。他们在社会上有威望,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由他们公开举起救国旗帜,受到进步力量的拥护,国民党就不敢轻易打击他们。

因此通过救国会这个组织形式,可以把许多失散了党的关系的党员,重新集合起来,聚集力量。”^①

这一阶段,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课题是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实现这一目标,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在与中共进行积极联合这一点上,包括离开救国会的章乃器、王造时等人,可以说他们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对这些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有胡愈之、钱俊瑞、钱亦石、王文清(王纪华)、艾思奇、徐雪寒等人^②。

2. “上救”的成立与中共

以1935年5~6月的“《新生》事件”为契机,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掀起了新高潮^③。救国会的前身,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

^① 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吴大琨:《党与救国会》,徐雪寒:《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同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05~406页。

^② 林立:《回忆上海“妇救”和行动指挥部》,钱俊瑞:《救国会内的党组织情况》,同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388页。

^③ 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章乃器等十人一组的一两周一次的“叙餐会”，它开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时期^①。“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他们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明确表示支持北平学生运动^②。此后直至1936年2月，上海的妇女界（12月21日）、文化界（12月27日）、大学教授（1936年1月9日）、电影界（1月）、职业界（2月9日）、国难教育社（2月23日）等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并尝试着建立起各救国会联合组织的可能性。这一时期，“文委”曾为统一各救国会组织的行动召集了联席会议，除救国会代表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武卫会”、“全总”、“文总”的代表。会议的召集人是王纪华，王翰作为“文总”代表出席，文化界代表是孙克定，教联代表是雍文涛^③。如前所述，4人均为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家。此次会议有力地促进了各救国会联合组织的成立，显示出救国会上层人士与上海地下党组织间密切的合作关系。以此为基础，中共地下党对“武卫会”、“全总”、“文总”各系统进行了改组，使各个系统的成员都集中投入到救国会运动中。

3. 救国会的组织与中共

至此，在救国会组织内部，中共党员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反映在干事会、行动指挥部、“职救”组织部以及《救亡情报》等相关事项的各个方面。

(1) 干事会

1936年1月成立的“上救”与5月底成立的“全救”，都设有公开的理事会，但具体的日常工作则由理事会下非公开的干事会负责。胡子

^① 章乃器：《我与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章立凡：《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广州：《人物》1984年第1期，120页。章立凡：《章乃器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页。

^②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胡子婴：《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上书，第389页。

^③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是“上救”干事会的总干事，徐雪寒、朱楚辛是副总干事^①。“全总”总务部长王造时领导下的石不烂、组织部长沈钧儒领导下的徐雪寒以及宣传部长章乃器领导下的吴大琨，是负责各部日常事务的总干事，他们三人常常在一起交流情况。其中，徐雪寒与石不烂是中共党员^②，吴大琨也自称是在“全救”的中共党团书记钱俊瑞的领导下工作^③，是非常接近中共党员或者中共的人物。因此，在“上救”与“全救”内部的非公开组织中，中共党员占据着主导地位。

(2) 行动指挥部

救国会行动指挥部，诞生于1935年12月24日的游行过程中，此后便成为常设机构。为筹备此次游行，章乃器在召开了数次会议后，最终决定成立行动指挥部。王纪华（“职教”）与林立（“妇救”）担任行动总指挥，章乃器、邓洁、钱俊瑞、王翰等人则坐镇后方指挥部指挥游行（如前所述，除章乃器以外的5个人，均是中共党员）。这次游行后，救国会决定保留行动指挥部^④。这个机构是不公开的，由各救国会派代表共同组成，其中，陈家康（“学联”）、孙克定（“文教”）、林立（“妇救”）、郑伯克（“国难教育社”）、雍文涛与王纪华（“职教”）等人，均是活跃在救国会内的中共党员。雍文涛担任总指挥，受邓洁（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的直接领导^⑤。在“一·二八”、“三八”、“五一”、“五·三〇”、“九一八”等纪念日子里，行动指挥部都会组织活动，即使在非纪念日時，

① 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② 吴大琨：《党与救国会》，徐雪寒：《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06页。

③ 吴大琨：《党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

④ 林立：《回忆上海“妇救”和行动指挥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2～423页。

⑤ 雍文涛：《回忆党对“职教”的指导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

也会有必要的活动,通过召开会议进行具体活动的部署、形势的分析和宣传教育活动的研究,通过具体的参加民众活动,积累起经验与教训^①。在这些工作中,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职救”组织部

“职救”是救国会中最有群众基础和号召力的团体,其成员从高级职员(包括自由职业者)到银行与钱庄职员、外资与华商企业及商店的小职员、店员,失学学生等各个阶层的人士。该组织成立时,会员有六百余人,以后发展到一千余人,12月24日游行时只能动员二三百人。在“职救”中活动的中共党员有十人左右,如前述的林枫、雍文涛、顾准、王纪华、陆志仁、刘峰等,以及杨修范、王明扬、陈敏之、石志昂、李希之等人。此外,“职救”中还有数十名积极分子组成的“职员联盟”(LM)。中共的核心小组,通过“职员联盟”的成员控制“职救”的基层组织。据陆志仁回忆,1936年5~6月的“职救”组织部里,在沙千里部长下从事组织工作的王明扬、杨修范、陈敏之、刘峰、陆志仁、杨子发等6名干事中^②,除杨子发不能确定外,其余5人均是中共党员。显然,中共党员在“职救”组织机构中也发挥着中坚作用。

(4)《救亡情报》

作为“上救”的机关报,《救亡情报》创刊于1936年5月。该报由“经理”徐雪寒具体负责编辑事务,由“上救”宣传部长王造时审阅后发行。该报在成为“全救”的机关报后,由宣传部长章乃器和总部干事吴大珉负责^③。因而,《救亡情报》的编辑发行,也与中共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 林立:《回忆上海“妇救”和行动指挥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② 陆志仁:《关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一些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419页。

^③ 徐雪寒:《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

总之,救国会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救国会的中枢机构里,如主持救国会日常工作的干事会,负责指导、计划集会游行等具体活动的行动指挥部,以及在救国会中最有号召力的“职救”组织和救国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编辑部等,都有中共党员在具体负责。由此可见,由救国会上层人士负责的公开机构和由中共党员负责的非公开机构,共同构成了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真正形态。

4. 救国会的活动与中共

如上所述,中共党员在救国会召集会议、实施游行以及通过《救亡情报》进行宣传报道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外的诸多活动中,中共党员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学联”组织

由于上海“学联”(上海市学生联合救国会)没有找到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负责人,因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①。“一二·九”运动以后,“文委”为了领导受其影响的学生运动,决定由王翰、何家槐组成专门小组,集中指导属于各“联”的学生,这个小组事实上就是“文委”(“临委”)的学生委员会,由胡乔木、陈家康、张执一、雍文涛、蒋南翔等负责这一工作^②。1936年春,王翰与胡乔木在复旦大学校外的忆顿楼召集各方面人士,指示将复旦大学的“武卫会”、“社联”、“左联”、共青团等组织合并为“抗日救国青年团”^③。笔者推断,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整顿、改编各校的诸类组织,使上海“学联”更加组织化。另一方面,北平“学联”为争取上海各界对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援并筹备全国“学联”,陆续派陈翰伯、韦毓梅、陈元、刘江陵、董毓华、黄敬、陆瑾等到上海联络^④。这些活

① 章乃器:《我与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②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③ 史业璋:《“一二·九”运动中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党史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④ 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彭瑞复:《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同载:《党史研究丛刊》第5辑,第18、23、25页。

动促成了3月18日全国“学联”筹备会的组成^①,5月27和29日,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先后正式成立。

(2)“工救”组织

同样,“工救”(工人救国会)也是因为没有找到足够资格的公开代表而不得不在地下活动^②。1936年7月,共青团江苏省委决定把上海各方面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救”,团工委领导人袁超俊,以“上救”常务干事的身份将上述决定交给沈钧儒、沙千里等人,并征得了他们的同意。8月26日,“工救”宣布成立,袁超俊就任“工救”理事会主席^③。

(3)“全救”成立的筹备

1936年初,“文教”的中共党团书记钱俊瑞,也是通过“文委”的领导征得沈钧儒等人的同意,开始筹备成立“全救”的工作。钱俊瑞称:“我们同北京派来的刘江陵、天津的黄敬洽商,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联系。”^④

(4)刘少奇的作用

1935年7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受到国民政府的大破坏后,部分成员到北方局寻求避难,因此,上海地下党与北方局间存在着个人间的联系。“一二·九”运动后,这种个人间的联系扩大到两个区域党组织间的接触,随后,从华北来的学生代表向上海党组织说明了自己的党员与团员身份,并带来了北方局的文件。由此,两个组织间的关系成为非正式的“兄弟组织间的关系”。考虑到华中、华南两个区域间的相互联络,更有利于组织的安全,刘少奇主张在上海成立“全救”与全国“学联”的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胡乔木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参见陆瑾:《关于全国学联的回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

② 章乃器:《我与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页。

④ 钱俊瑞:《救国会内的党组织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

组织,并公开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旗帜^①。刘少奇还就《生活日报》的宗旨及救国会运动的性质等问题,向邹韬奋提出了具体建议,邹韬奋接受了这些主张。此外,1936年4月,刘少奇执笔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②,也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5)关于《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③

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是救国会运动的纲领性文件^④。关于这一文献,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从莫斯科归来的潘汉年、胡愈之和滞留香港的邹韬奋三人起草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潘汉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⑤。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必须要留意两点:(1)文献是在沈钧儒等救国会上层人士与中共党员潘汉年的秘密合作下拟定的;(2)潘汉年的观点符合以国共秘密谈判为基础对此后中国政治的展望。此外,章乃器试图写另一篇文章以代替它,结果消减了该文献对群众的影响力,而受到胡愈之的批评^⑥,对此也要进行具体的研究。

显然,在救国会游行集会的动员与进行、机关报的发行、扩大组织力量、理论与策略等方面的指导等各种活动中,中共党员都有积极的参与,可以说对救国会各方面的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②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40页。

③ 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27页。

④ 王金铭主编:《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

⑤ 李起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钱俊瑞:《救国会内的党组织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

⑥ 胡愈之:《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四、“全救”的成立与政治形势

1. “全救”成立的政治意义

1936年5月31日,各行业救国会合并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年底时,全国各地的会员达到数十万人,涉及学生、教职员、记者、作家、绅士、工人、店员、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军队及政界的人士,几乎覆盖了中国城市所有的领域^①。“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仅集中体现在城市的各个阶层,而且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全救”的成立,意味着进入“抗日期”的中国政治格局中又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关于“全救”与中共的关系,在前节已有所论述,那么,“全救”与中共之外的政治势力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它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据吴大琨的回忆,当时“全救”曾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有一定的联系^②。徐雪寒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1)“全救”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及刘湘等人有过交往,并在“抗日反蒋”斗争方面加强合作;(2)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全救”还派杨东荪为代表前往两广^③。“七君子”刚刚被捕之后,在章乃器住宅里最先销毁的文件之一,就是“全救”与西南、西北实力派间的秘密电报^④。这表明“全救”与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接触是慎重而又极其秘密地展开的。当时,陕北的中共中央曾与西北、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就抗日救亡问题进行接触并达成了秘密的协议^⑤,特别是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之

① 李起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② 吴大琨:《党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409页。

③ 徐雪寒:《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④ 吴大琨:《党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⑤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357页。

间“三位一体”的秘密联合,以及与西北、西南各地方实力派间都有具体的接触^①。由此可知,在要求国民政府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转变这一点上,“全救”、陕北的中共中央、西南与西北的地方实力派等政治势力间,采取了相同的步调。

“全救”与南京政府间的关系,集中反映在与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的交往上。据孙晓村回忆,沈钧儒曾与孙晓村、千家驹一起赴南京访问过冯玉祥,沈钧儒向冯玉祥介绍了救国会的活动,冯玉祥对救国会的方针与活动表示完全赞成^②。此外,章乃器也回忆说,宋子文同情救国会,曾通过宋庆龄连续数次给救国会寄了数千元^③。1935年秋至1936年冬,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进行了秘密的谈判,国民党方面是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冲等人主管谈判^④。这表明,中国政治框架中的各种势力除军事对抗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选择,这种认识在国民党权力中枢已经开始产生,支持救国会运动的冯玉祥、宋子文等人的出现,更是显示了权力中枢已开始朝着适应政治变化的方向进展。

“全救”对地方的政治形势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关于这一点,“全救”围绕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的评述意味深长。第一,关于两广事变的评论,章乃器认为:(1)广西的民众运动虽然与“全救”的理想不尽相适,但它至少拥有相当的基础;(2)在对青年的压制以及思想禁锢方面,广西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比较开明的^⑤。第二,由于西安事变爆发,西安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从秘密阶段开始转向公开活动^⑥。第三,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1937年3月31日报道说,(1)在

① 申晓云:《新桂系与西安事变》,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8~59页。

② 孙晓村:《“真堪衡岳比芳芬”:沈衡老对救国会的卓越贡献》,《沈钧儒纪念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6页。

③ 章乃器:《我与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

④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353页。

⑤ 章乃器:《西南事件所给我们的教训》,上海:《救亡情报》第12期。

⑥ 《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缓远,由于大敌当前,抗日活动可以公开举行;(2)全绥远救国联合会已经成立,工人、学生、文化等各救国团体非常紧张地开展工作^①。这些评述表明,一旦人们抗日救亡的主张得到认可,该地区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就会得到快速发展。

(2)上海日商纱厂的大罢工

1936年间的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过程非常曲折。“一二·九”运动后,上海纱厂总工会“纱总”的工作重点移到了日商纱厂^②。1936年,沪东引翔港、杨树浦一带的日商纱厂里,反日的罢工时有发生。但是,由2月4日梅世钧事件而引发的声援日商纱厂的罢工运动,因政治口号过多且与工人利益相去甚远而导致失败^③。2月16日,“全总”白区执行局决定,由陈之一、郭光洲、张维桢、韩念龙、周林(全部是中共党员^④)组成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纱委”)^⑤,决定在3月份发动5个日商纱厂工人进行静坐示威,并将3000名救国会会员加入“全总”^⑥。3月的静坐示威斗争,以100余人被解雇、40余人被捕的结果而失败^⑦。此外,许多人反对救国会会员加入“全总”,“全总”系统的救国会会员也因此减少了七八十人^⑧。运动的惨重失败,在“纱委”内部引起了激烈的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265页。

② 张维桢:《1936年上海的纱厂工人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

③ 周林:《1936年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党史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0页。

④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86年版,第13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⑥ 张维桢:《1936年上海的纱厂工人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

⑦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

⑧ 张维桢:《回忆上海反日大罢工的一些情况》,张维桢、韩念龙、周林、朱学范:《上海反日大罢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意见分歧^①。

6月,刘少奇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一文,由雍文涛经周林传达到了“纱委”^②，“纱委”以此为基础,总结已有经验与教训,克服了内部的宗派主义倾向。8月26日,“工救”成立,此后上海工人的抗日救亡运动便在“工救”的旗帜下进行^③。9月,为了出席在陕北召开的会议,“全总”白区执行局的主要负责人除郭光洲之外都离开了上海,“全总”对“纱委”的领导停止了^④。“纱委”在新的体制下,积极准备在日商纱厂进行新的罢工斗争,设立了以张维桢为负责人的罢工指挥部,由周林负责发动沪东地区的罢工,郭光洲与韩念龙负责与“上救”间的联络^⑤。11月8日,大罢工开始进行,很快便波及到上海所有的日商纱厂。

关于这次罢工,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留意:第一,救国会与此次罢工的关系。尽管在1936年8月“工救”组织就已成立,但这一事实并未公开。在11月12日召开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大会上,与会的罢工工人代表发言,呼吁各界支援,并否认了罢工发生之前有救国会的参与,救国会随即组织了罢工斗争声援会^⑥。然而,从中共党员占据着救国会组织的中枢部分,郭光洲、韩念龙曾推动“上救”的工作,章乃器曾经为罢工支出每日7000元的费用^⑦，“七君子”被捕后，“全救”在章

① 周林:《1936年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党史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② 周林:《1936年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党史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③ 张维桢:《1936年上海的纱厂工人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页。

④ 张维桢、韩念龙、周林:《1936年上海反日大罢工的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58页。

⑤ 张维桢:《1936年上海的纱厂工人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427页。

⑥ 《沈钧儒等案第一次审理记录(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290、306页。

⑦ 《蒋介石复冯玉祥密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348页。

乃器家首先销毁的就是有关支持罢工费用的文件等迹象来看^①,这种否定只是一种对外声明而已,实质上两者间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第二,“黄色工会”的动向。1936年6月,中国劳动协会理事朱学范借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之际,在莫斯科曾与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王明、康生进行了秘密会谈,就抗日问题和加强工人间的团结达成了一致意见^②。据此可知,此次罢工中“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间并无有组织的配合,但却实现了事实上的统一行动^③。这种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工人统一战线的实现,对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11月19日,受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的影响,青岛的日商纱厂举行了有2万余人参加的同盟罢工^④。青岛罢工的发生,显示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局面,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如前所述,作为中国政治格局中的新的力量,“全救”的出现及其政治形势的变化,如11月15日《救国时报》社论所称——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将可能演变成为全民性的抗日救亡运动^⑤。至此,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实质上已难以推行。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是阻止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手段,除此之外并无良策。

与“七君子”事件相关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正在进行中日谈判。“七君子”事件后,中国方面对日本南京总领事须磨称:“贵国政府应该知道,中央政府为防止中日关系恶化采取了一些重大决定,例如,逮捕

① 吴大琨:《党与救国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② 陆象贤主编:《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③ 朱学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上海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参见张维楨、韩念龙、周林、朱学范:《上海反日大罢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

④ 盖军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煽动上海纺织业罢工的救国会领导人。”^①所述极具意味。

11月24日,日商联合会代表与罢工调停人杜月笙会见,双方就增加5%的工资,不得随意开除或殴打工人,周日加班必须另外支付工钱,吃饭时间机器停运30分钟等7项条件达成协议。由此,11月27日工人结束罢工^②。大罢工的结束,一方面显示了蒋介石逮捕“七君子”的强硬措施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以工人统一战线为基础的日商纱厂的罢工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广泛支持,并波及了其他地区,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迫使日商一方不得不作出让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政治向抗战的态势发展。约半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

五、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形成

1. “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9月,“临委”书记邓洁与委员丁华相继被捕。由于邓洁很快便被释放,胡乔木、王翰为避难而不得不隐蔽起来^③,此后,“临委”的工作陷入停顿状态。12月,冯雪峰组建了临时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王尧山,成员沙文汉、林枫)着手重建党组织,逐个审查了每位党员,把具备在上海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条件的移交给“三人小组”管辖,其他党员则分配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转为公开活动,有的党员也转移到了延安或别的地区^④。

1937年初,临时委员会成立,书记是李凡夫,委员有胡乔木、徐雪

① 《須磨總領事致有田外務大臣》(第94號,1~2),《昭和十一年ニ於ケル日支交渉關係(松本記錄)》140冊,A~1~1~0.9~1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存。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57頁。

③ 王翰:《“一二·九”運動後上海地下黨工作路線的轉變》,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頁。

④ 王堯山:《1937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和地下黨組織的整理工作》,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頁。

寒和王翰^①。但这一组织因李凡夫与胡乔木离开上海转赴延安而于五、六月解散^②。

这一时期,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不得不分出很大的精力来保护组织和进行整顿,这对救国会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作为救国会公开代表的“七君子”的被捕,对救国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七君子”事件后,行动指挥部停止了活动^③,《救亡情报》也被停刊^④，“职教”中的中共核心小组被迫解散,救国会的民众基础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例如,“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曾计划在南市体育场举行集会,由于军警的包围与封锁而无法召开;在方浜路菜场举行的集会也只有五六百人到场^⑤。中共在救国会的基层组织中,也通过保护干部、检查每个人的关系为可能到来的新阶段作准备^⑥。另一方面,在救国会上层,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中心展开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由于救国会组织是由公开与隐蔽两部分组成的结合体,这两部分的割裂,不能不说是救国会运动被迫陷于停顿状态的原因。

从华北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一时期,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合作有所进展,这些势力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从1936年11月的日商纱厂罢工对于实现“停止内

① 林凡夫:《关于1935年至1937年上海地下党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②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③ 林立:《回忆上海“妇救”和行动指挥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⑤ 陆志仁:《关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一些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⑥ 雍文涛:《回忆党对“职教”的指导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

战、一致抗日”，以及把维持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的具体化作为此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课题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何使对日抗战具体化的问题，也成了国共重开谈判的主要议题^①。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937年3月23～31日）、苏区代表大会（5月2～14日）、白区工作会议（5月17日至6月10日），实现了从苏维埃革命路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同时确定了新形势下苏区与白区的工作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晓负责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的妻子是上海人，有不少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在出席白区工作会议后，刘晓便取道西安赶赴上海^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其“安内攘外”的政策，不过另一方面，蒋介石从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地方政治势力中，成功地分化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势力根基，与此同时，压制了救国会势力的发展，并在国共谈判中相对强化了自己的立场。但是，由于维持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形势的具体化成了新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课题，因而处治“七君子”的依据丧失，如果继续扣押他们，只能表明执政当局自我矛盾，也会阻碍国民政府适应新阶段的积极政策的实施。

2. 七七事变与全民抗战态势的形成

在中国政治的主题向具体化的抗战态势发展的过程中，卢沟桥事变及8月13日的上海事变，使战火波及开来，日本全面扩大了对华军事侵略。9月22～23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为鼓动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政府释放了已成悬案的“七君子”（7月31日），为将民众运动置于政府的控制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各机关负责或参加的抗敌后援会，并在各地组建了类似的组织。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③，规定“所有合法团体皆应加入本会一致行动，不

^① 李良志：《西安事变后的7回の国共交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通信》，大阪，第46、47、49号（1989～1990）。

^②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4～36页。

^③ 冯绍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述评》，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得再有任何其它救国性质的团体和单位行动”^①。另一方面,此前上海的民众抗日组织是以救国会为主导的,但至此时,救国会的组织形态已不能有效地动员、组织所有的力量,有必要迅速把上层知识界人士与下层广泛的民众,集中到抗日救亡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去。为此,从7月下旬起,各界的救亡协会相继成立^②,具体情况如下:

(1)7月28日,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成立。该组织中有钱俊瑞、胡愈之、梅益、王任叔、于伶、黄一然、戴万平、冯定、唐守愚、殷扬(杨帆)、汪光煊、朱启奎、郁风等中共党员,分别在组织部、宣传部中工作。

(2)8月7日,“工救”改组为工人救亡协会(“工协”)。

(3)8月17日,话剧界救亡协会成立。

(4)8月24日,教育界救亡协会成立。

(5)8月中下旬,纱厂工人救亡协会成立。

(6)9月12日,职业界救亡协会(“职协”)成立。王文清、袁清伟、王明扬、许德良等中共党员在其中组织了党团。

(7)10月6日,战时文艺协会成立。

(8)10月19日,南市人力车夫协会成立。

(9)10月28日,学生界救亡协会(“学协”)成立。参加该会领导工作的有刘峰、陈伟达、张英、顾德欢等中共党员^③。

此时妇女界的救亡运动,有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② 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440页。

开展活动,该会中也有沈兹九、杜君慧、王汝琪、罗琼等中共党员活动^①。同时期的上海妇女界,还活跃着女青年救亡协会、舞女救亡协会等数十个救亡团体^②。

针对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官方的各界抗敌后援会以控制所有民众救亡组织的企图,上海的中共党组织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一方面使各救亡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官方的抗敌后援会,另一方面又在活动中保持独立性的方针^③。在“八一三”之后的上海抗战中,各救亡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在上海作为救国会运动所开展的民众救亡活动,到了全面抗战爆发的新时期,以救亡协会的形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江苏省委的重建

1937年7月,中共中央派遣刘晓前往上海^④。关于上海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中央的指示是对现有组织及党员个人,必须进行慎重的个别审查。抵达上海后,刘晓从冯雪峰那里接收了王尧山等“三人小组”所辖的党员,经过重新审查后编入了党的组织。此后,冯雪峰成为中共上海办事处的专职人员,离开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刘晓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系统与冯雪峰负责的办事处系统完全分开,成为各自独立的组织体系^⑤。8月中旬,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党系统,组建了工人委员会(“工委”)和群众运动委员会(“群委”)。“工委”由林枫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负责领导纺织工厂、丝织工厂、码头以及其他工厂的党

① 赵先:《抗战时期的上海妇女救亡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资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379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③ 陆志仁:《关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一些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④ 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页。

⑤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41页。

团与支部的工作；“群委”由王尧山任书记，沙文汉、陈修良、王洞若、彭柏山组成，负责领导救亡协会系统的党团工作。在职业界，顾准、雍文涛、陆志仁为成员组成了临时工作委员会。同月，中共中央将去年9月设立的中共上海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作为中共在上海的窗口。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李克农与潘汉年，刘少文任秘书长。办事处另外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曹荻秋，委员有夏衍、钱俊瑞、姜君宸），公开发行《内地通讯》、《民族公论》和《文献》等杂志，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①。

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从上海撤退，上海失陷。上海租界区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此后，上海抗战时期开展的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其场所移至武汉。上海陷落后，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转入地下活动^②。同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组织部长）、沙文汉（宣传部长）等人为委员^③。到1938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还设立了如下若干个委员会，以强化组织体系的完备：

(1) 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军委”）成立。书记：张爱萍，委员：吴克华、彭林、曾广泰，秘书：陈家康。

(2) 11月，撤销群众委员会（“群委”）。

(3) 11月，省委机关报《真理》创刊，主编：沙文汉。

(4) 12月，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成立。书记：刘峰，委员：苏曼文、关键夫、张英、张健。

(5) 12月，难民委员会（“难委”）成立。书记：黄浩。

(6) 冬，文化界委员会（“文委”）成立。负责人：孙冶方（沙文汉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436页。

② 刘少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资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0页。

负责与省委的联系)。1938年1月改组(书记:孙冶方,委员:王任叔、于伶、梅益)

(7)年底,妇女委员会(“妇委”)成立。书记:陈修良,委员:赵先、罗晓红、李淑英。

(8)年底,外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沙文汉。

(9)1938年1月,职员委员会(“职委”)成立。书记:彭柏山,委员:顾准、陆志仁、胡实声、曾颖明。

(10)1月,改组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书记:刘长胜(兼任)。

(11)1月,重建秘密电台。

(12)1月,浦东委员会(“浦委”)成立。书记:陈静,委员:周强、朱君务^①。

江苏省委成立之后,上海地下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密切合作,继续抗日斗争^②,到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为止,其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一直没有中断^③。

结 语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丧失,表明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中共陷入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为契机,中共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轴心,开始探索事关生存的政策转换。当时,中共的组织共有4个“磁场”: (1)陕北的中共中央; (2)以莫斯科和巴黎为活动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450~460页。

② 上海高校专题组:《上海地下党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梗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新四军研究会上海高校专题组编:《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9~543页。

③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2页。

重心的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3)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停止活动后，位于平津地区的华北局对白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4)上海的地下党。它们在相互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开始了新“路线”的探索。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地下党对政策与组织进行了重新审视，谋求与当地的左派知识界人士的积极合作。而且，以左派知识界人士和中共党员分别承担公开部分与非公开部分任务的统一战线组织，即以救国会的形式收获了累累硕果。

上海的救国会运动，在寻求与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诸政治势力的合作过程中，创造出了中国政治新的潮流。这股潮流，在1936年11月的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中达到了顶点，使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政策难以推行。此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际过程中，创造出了以“维持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为主题的中国政治新局面。因此，上海的救国会运动的精神，在西安事变“三位一体”关系下的“东救”、“西救”和“八一三”时期的上海以及抗战初期武汉的民众抗日运动中得到继承与发扬。

第六章 西 安

——“地方实力派”与中国政治

前 言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转向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也是张学良、杨虎城“地方实力派”^①与奉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共携手合作所引发的,这一历史背景为学者所共识。

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重建,是从“一二·九”运动起源地的平津地区兴起,以1936年救国会运动的发展为背景逐渐开展并波及全国各地的(白区联络网)。平津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获得新生,得益于日军对华北实行“分离”工作而出现的“政治性空白”以及共产国际新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共直接领导的各种组织为基础,加上“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使之成为可能(参见第四章)。另外,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有可以给革命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带来安全的租界。共产国际新精神在上海的传播,使左派知识分子和许多脱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重新汇集在救国会的活动中。1936年夏,这个由左派知识分子与中共党员分别构成公开与非公开部分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争取团结和联合一切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种政治势力过程中,成功地引导了中国政治的新潮流(参见

^① “地方实力派”是中国学术界1980年后采用的新研究用语。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与国民政府合流的军阀仍被保留“反革命”的评价,并作为实际存在的政治势力加以考察。杨奎松认为,中共根据西安事变前后的统战工作,获得了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真正的同盟者”,向共产国际展现了中共的独特性。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24~429页。

第五章)。但是,西安事变前后的西安,既没有平津地区那样的“政治性空白”,也无活动相对自由的租界可言。

本章旨在对 1935~1938 年间中共在西安的组织与活动的实态进行梳理,并探讨其特征。对此,笔者强调如下三点。第一,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即由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何时形成的、其实态是怎样的,应该怎样理解“三位一体”与“西北大联合”构想的关系^①。第二,在“一二·九”运动以及救国会运动高涨的过程中,中共组织在国统区的联络网逐渐形成,经过西安事变至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全国开设了约 30 个八路军办事处,形成了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西安地下党是此活动中的重要媒介。由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在西安地下党重建过程中平津、上海地下党的作用以及西安地下党与中共中央间组织关系恢复的问题。第三,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国统区中共的组织重建的角度来看,应该把平津地区和上海开展群众性抗日运动,以及这些地方与西安活动的异同点纳入研究的范围。本文通过以下考察,旨在就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政治中“地方实力派”的作用,特别是其与群众性抗日运动高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新的观点^②。

① “西北大联合”构想,是以红军、东北军组建西北国防政府为基本内容,在 1936 年 5 月由中共提出并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这个构想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思路,假如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会造成与南京政府对立局面的公开化,与此同时,中国政局的变动不可避免。8 月,就在张学良进行考虑决断之时,“西北大联合”构想却因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放弃。“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 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1 页)。这些话表明,西安事变期间,当事者自身也意识到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② 矢泽康祐曾指出过《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八一宣言》的相似性。他认为从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经“一二·九”运动直到救国会运动的抗日群众运动,影响了中共的政策调整与路线转变。(矢泽康祐:《1930 年代中国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と反帝國主義》,東京:《歴史學研究》1963 年,第 279 期,第 1~9、51 页)。现在已知,这个纲领来源于 1933 年 10 月 27 日王明、康生写给中共政治局的信(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 页),同时,抗日群众性运动与中共地下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澄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对矢泽康祐的上述观点重新加以探讨。

一、《八一宣言》的传播与“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

1.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西安政治与东北军的进驻

曾在冯玉祥部任过师长的杨虎城,于1929年弃冯投蒋。在次年的中原大战中,他的实力有所扩展并组建了十七路军,战争结束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随着冯玉祥势力的削弱,蒋介石与杨虎城在陕西省的矛盾公开化。1933年底,蒋介石剥夺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其亲信邵力子继任^①。在国民革命时期加入中共,从1927年始到西安事变间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米暂沅^②,曾对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如下概括^③:

杨虎城认为,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共是唯一能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他重用那些失去组织关系或者是他亲自从狱中营救的中共党员。1930年10月,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④。南汉宸上任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包括众多的中共党员。杨虎城还组建了以张汉民为营长(大队长)的省政府警备营,并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设置宪兵营,任命中共党员纪子中为副营长。纪病逝后由金闽生和童陆生(均为中共党员)分任正副营长。该营的几个连长(中队长)、排长(小队长)也是中共党员,后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5页。

② 王炳南:《代序言》,米暂沅、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③ 米暂沅、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2页。

④ 南汉宸(1895~1979),1926年加入中共。1932年夏,辞退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参见药英、冯凯:《南汉宸》,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278~279页)。

来变成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据点^①。此外,在杨虎城手下担任要职的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西北文化日报》主编宋绮云等人,都是中共党员^②。

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杜衡被捕后变节,致使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遭到了毁灭性破坏^③。又由于1935年的大镇压,与中共保持着组织关系的党员仅仅剩下三四百人^④。

1935年10月2日,国民政府宣布在西安成立由蒋介石、张学良分任正副司令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代理总司令职务),并任命第51军军长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与此同时,河北、湖北两省的东北军开始进驻西北地区。蒋介石还命令杨虎城将其十七路军一并置于上述司令部的统辖之下^⑤。

据今井骏推算,当时进驻西北的东北军大致有15~16万人,连同家属包括在内的话,约有30万人之众进入了西北地区^⑥,此举给西安的政治、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拥有约5000名当地士兵^⑦的十七路军和掌管着西安政治大权的杨虎城,军事上不得不被置于张学良的统辖之下,再加上当地落后的经济,难以承受因东北军及家属进入而带来

① 徐彬如(1901~1990),1925年加入中共党组织。1932年,在已成为上海中央军事委员会联络点的王根僧家中,他见到谢华(原名谢兹山)并恢复了组织关系。之后,谢就任十七路军宪兵营的文化教官并发展金闽生入党。同期,王根僧、徐彬如也来到西安,但徐随即返回上海(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页)。

② 宋绮云(1904~1949),1927年加入中共,1929年受命进入杨虎城部队。1931~1937年间,作为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主编,他全面负责该报社的所有业务。1941年被“军统”特务逮捕,1949年与杨虎城一起被处死(参见江山、胡民新、黄朝章:《宋绮云》,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281页)。

③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④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⑤ 武育文、王维远、杨育之:《张学良将军传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⑥ [日]今井骏:《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抗日民族統一戦綫史研究序説》,东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248页。

⑦ [日]石島紀之:《中国抗日戦争史》,东京:青木書店1984年,第43~44页。

的沉重负担,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种种纠纷和摩擦由此而起^①。当时,东北军内并没有中共组织的存在,只有少数党员的单独活动^②。

2.《八一宣言》的传播与西安的新形势

1935年9至11月,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东北军损失了3个师^③,南京对此反应冷淡,这促使张学良重新审视自身及东北军的前途。11月,张学良召见杜重远、李杜、马占山等人,探讨与中共接触的可能性,同时意欲借此摸索新的政治发展方向^④。接着,张学良把自己任校长的北平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邀至西安。由于东北大学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排头兵,张学良打算从中寻找中共党员,并指示王以哲在前线“剿共”时注意寻找中共党员^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学良有如此举动,但《八一宣言》在主张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的同时,还是把张学良同蒋介石相提并论,视为“卖国贼”^⑥。

① 米哲沅、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4页。参见[日]今井骏:《中國革命と對日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史研究序說》,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247~248页。

②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 9月,张学良命令在鄂豫皖边界的东北军和驻扎河南的第51军北上进攻陕甘宁根据地。10月1日,东北军110师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在劳山,26日,东北军17师的4个营和619团部在榆林桥镇被红军歼灭;11月21日,东北军109师和106师一部分在首罗镇与红军战斗中被全歼。参见武育文、王维远、杨育之:《张学良将军传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4页。

④ 他们认为,跟随推行法西斯的蒋介石展开围剿活动,只能是将东北军置于死地,建议红军与杨虎城及新疆的“地方实力派”、东北出身的盛世才联手组成西北地区抗日大联合。参见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⑤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⑥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

1月初,东北军第619团团团长高福源^①返回东北军,向王以哲(东北军第67军军长)、张学良介绍了几个月来的苏区见闻,并转达了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以及与东北军合作的愿望。张、王委托高福源再赴瓦窑堡,要求中共派遣正式代表。16日,高福源在瓦窑堡向李克农转达了张、王二人的意见。中共中央做出派遣李克农为代表的决定^②。25日,中共中央制定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③,对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各师团长和全体将士”发出了建立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国防政府的抗日联军,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的呼吁。2月26~28日,李克农在洛川与王以哲谈判,达成了红军与第67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以及有关为通商提供便利的协议。3月4日,李克农在同一地方会见张学良,双方再次确认了在西安设置中共常驻代表的事宜^④。

1月末,宋黎、韩永参、马绍周等三人,作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兼北平学联代表被派往西安。张学良会见后安排他们留在西安从事抗日工作。通过这个渠道,东北大学和北平学联向西安输送了抗日宣传的重要人员^⑤。此外,1935年底至翌年春,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刘

① 高福源(1901~1937),1935年9月,东北军107师619团的营长。10月在榆林桥战役成为红军的俘虏被押送瓦窑堡。后参加白军军官训练班,并加入中共。1936年1月,返回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相见。之后,从事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络工作,12月升为少将任105独力师第1旅旅长。1937年2月,“二二”事件后被误杀。参见中共东北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4页。

② 李勇、张仲田:《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统一战线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页。

③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④ 李勇、张仲田:《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统一战线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3页。

⑤ 东北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这三个人当中只有宋黎是中共党员。参见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澜波、苗淳然、孙达生等中共党员，车向忱、高崇民、栗又文^①等知识人士陆续抵达西安，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东北军内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②。1936年3月，李杜找到曾在中共中央军委从事情报工作但已失去组织联系的刘鼎，并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3~4月，他在西安见到了张学良^③。

下面，笔者将从天津的中共北方局、陕北中共中央以及上海地下组织（军事委员会系统）三方面入手，探讨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

1935年11月，时在天津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通过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将《八一宣言》的内容传达给杨虎城，并提议红军与十七路军缔结互不侵犯的协定^④。杨虎城希望南汉宸提出的具体方案。12月，申伯纯回到天津向南汉宸转达此意^⑤。南汉宸派王世英赴西安，向杨虎城提出包括有六项提议的合作抗日的北方局方案。

① 车向忱(1898~1971)应王以哲之邀来到西安，创建了为流亡子弟的东北竞存小学。1946年加入中共，1979年公开了党籍。高崇民(1891~1971)，1935年夏在上海曾与胡愈之、邹韬奋、孙达生有过交往。受中共地下党委托，为联共抗日并加强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联络，11月进入西安。1946年加入中共。栗又文(1901~1984)，1932年任北平市立商务高中校长。1935年11月，应南汉宸之邀到西安，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1936年4月，加入中共。参见中共东北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9、207~213、131~136页。

②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③ 中共东北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2、75~76页。去西安前，刘鼎在上海准备了十天左右，夏衍得知刘的西安之行，就委托其带报告给党中央。刘鼎因此便有看到党内文献的可能。他参与了包括《八一宣言》在内的统一战线有关文献的研讨，并从一般报纸、杂志上探讨研究国内诸形势的发展变化。参见张奎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2页。

④ 米哲沅、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当时申伯纯还不是中共党员(1937年入党)。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编：《统一战线工作手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326页。

⑤ 申伯纯：《南汉宸派我与杨虎城联系》，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此外,毛泽东于12月5日起草了给杨虎城、杜斌丞^①的信,希望与十七路军提携合作,并委托曾工作于该军的汪锋转交^②。汪锋、王世英在西安与杨虎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并以北方局建议为基点与杨虎城进行了充分探讨,双方最终达成如下意向:(1)相互不干涉;(2)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系;(3)设立联络站;(4)准备抗日。汪锋、王世英还经常与杜斌丞交流意见,在中共抗日政策等问题上得到杜斌丞的支持。2月中旬,汪锋和王世英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与杨虎城谈判的结果并获得批准^③。然而,杨虎城回避了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4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派王世英赴西安,但杨虎城并没有接见他^④。

1935年,谢华、徐彬如分别在上海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内的党组织和“军事委员会留沪办事处”(上海临时中央局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同年秋季,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党支部负责人金闾生来信,要求两人返回西安。为了同十七路军内中共党员恢复关系、争取杨虎城、开展西北抗日活动和担负起长征中与红军联络的任务,徐向午(武卫会党团书记)让两人返回西安,在南京从事律师工作的李木庵也一同前往^⑤。1936年2月^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西北特支”)成立(书记:谢

① 杜斌丞(1888~1947)是一位在西北地区爱国民众运动中享有崇高威信和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在杨虎城手下任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谋。西安事变后,就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直到1938年秋),1947年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并处死。宋新勇、刘节诚、李敬谦:《杜斌丞》,中共党史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4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32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4~495页。

③ 米智沅、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4页。药英、段建国:《王世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3页。

⑤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1页。

⑥ 徐彬如讲到“谢华抵西安以后,立即宣布成立特别支部”。参见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另外,谢华在7月30日给军事委员会报告中提到由“上海中央”派赴西安是在“2月初”。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4页。

华,成员:徐彬如、李木庵、金猪生、宋绮云、童陆生、王根僧),谢华、徐彬如、李木庵分别在西安绥靖公署被安排了职位。在西北特支里,谢负责组织方面工作,徐和李则主管宣传,组织的活动资金以《西北文化日报》宣传费的名目,由杨虎城支付^①。

3. 延安会晤与“三位一体”的初步形成

3月20~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讨共产国际“七大”相关文献。会议以“联苏联共”为基调,把国民党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张学良被定位为“民族革命派”的“右翼”^②。这一定性意味着,在中共的统战工作中,张学良、东北军的角色是与蒋介石(南京)不同的,应加以区别对待。根据红军东征后西北军事形势变化的情况,张学良希望与中共领导人直接对话。会后,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前往延安。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11日,周恩来在给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分别发送的电报中,对会谈内容概述如下^③:

一、张学良完全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他在未公布抗日之前将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

二、张学良全力支持红军主力转战河北,并对第四方面军以及2、6军团北上的决定表示理解。

三、张学良认为只有凭借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合作,才能实现抗日的可能。

四、张学良觉得,东北军对蒋介石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自

^①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8~59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西安事变前我党就联合抗日问题与张、杨联络谈判的一组文电》,《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5~66、76~77页。

己目前徘徊于十字路口,但眼下暂不“反蒋”。

五、双方同意派代表前往苏联,同时加强与新疆盛世才的联络。

六、调整红军、东北军的具体驻防和战略行动。

七、张学良同意为中共、红军调拨物资提供方便。

八、相互设置联络员,并决定给张学良手下派遣中共代表。

这次会谈避免了过多地评价蒋介石,确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目前中国政治最为迫切的任务^①。由此,红军与东北军间实现了事实上的停战,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王以哲之间也建立了固定的联络疏通渠道。4月,为推动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王炳南从德国回国。王炳南的父亲和杨虎城是老朋友,再加上王炳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重要人物,杨虎城非常重视王炳南^②。这样,中共与杨虎城即十七路军间又多了一个接触渠道。由此可以认为,由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构成的“三位一体”态势初步形成。4~5月,三军间的敌对状态事实上已经停止^③。

二、“西北大联合”构想与“三位一体”的成立

1. “西北大联合”构想与两广事变

4月13~14日,中共中央决定:(1)中共和东北军、十七路军间的事务由周恩来负责;(2)派刘鼎前往张学良处;(3)保持王以哲与李克农间

^① 杨奎松认为,通过对中共在延安会谈的政策考察可知,周恩来接受了张学良在会议中提出的“拥蒋”、“联蒋”的主张,或者对此持肯定性理解,这表明张学良和刘鼎回忆录中提及的许多见解难以成立。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0~69页。

^② 赵世臣:《西北地区统一战线建立述略》,张铁男、宋春、朱建华主编:《中国统一战线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③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的密切关系；(4)派邓发作为中央代表经由新疆前往苏联^①。4月末，中共获得张学良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决心已定的情报。在红军主力放弃东征返回陕北后，毛泽东随即提出联合东北军打通外蒙、苏联路线，并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行动计划。5月8日，中共中央据此制定了“西北战役计划”^②。

红军主力返回陕北，引起了西北军事形势的变化，促使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直接接触。5月12日，张周实现了第二次延安会谈，确认了“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苏联）”为主要内容的“西北大联合”构想。会谈决定：(1)9~10月，由两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国防政府；(2)张学良安排邓发赴新疆、苏联^③。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大革命”处于酝酿阶段和对现状的把握上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应为此建立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构成的西北国防政府，在红军内部有必要强化统一战线的教育^④。

6月初突发的“两广事变”，极大影响了中共和张学良的关系以及西安的政治形势（参见第一章）。与此同时，各“地方实力派”的活动日趋活跃，很多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建立联系^⑤，这给中共提供了新的政治选择机遇。6~7月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电信联系的恢复，意味着后者可以直接影响中共的政治决策。中共在中国政坛上的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80页。

②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83~9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96~9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页。

⑤ 这一时期，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系的马占山、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等人，都要求与中共建立联系，中共中央分别派遣代表与之接触。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9页。

位,既是因为这一革命政党拥有红军的军事实力,同时更与苏联保持“特殊的”关系密切相关,对于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在内的“地方实力派”来说,电信联络恢复的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

随着“两广事变”的爆发,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西北国防政府的成立)计划提前,“最迟也要在8月底以前实施”,其前提条件是正确定位对东北军工作的关系——此时,中共与东北军的关系依然建立在与张学良、王以哲的个人关系基础上。6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张浩、叶剑英、李克农、李涛、边章五;秘书长:朱理治)^①。同日,中共中央就有关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作了说明和规定,根据东北军的现状,把它转变为抗日与革命的军队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的,但“我们的基本方针”并不是要瓦解和分化它,或要其转变成红军,而是要促使东北军走上抗日之路^②。工作的中心围绕东北军的西北起义而展开,并积极赢得时间上的主动。

6月下旬,为应对“两广事变”引发的中国政局的动荡和变化,张学良、杨虎城筹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正式开设,意在为“反蒋抗日”的义举对军官们进行必要的再教育。刘澜波、孙铭九、应德田、万毅、解如川、贾国辅(贾陶)、郭维城、吴家兴等包括中共党员和少壮派在内的各界人士,都接受了该训练团的教育活动^③。这一时期,张学良向中共表达了入党的心愿,同时邀请中共派遣工作人员以强化东北军的组织功能。7月2日,中共中央认真地考虑了张学良的入党申请,预定派遣叶剑英和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1~112、114页。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另外,根据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中共东北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和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64页)等书,该委员会成立于1936年初。

^②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2页。

^③ 武育文、王维远、杨育之:《张学良将军传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朱理治到张学良处,并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①。

“两广事变”因广东陈济棠势力的退出而结束。8月9日,共产国际通过潘汉年带回指示,要求红军在西北地区谋求应有的发展,应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结为一体,进而连通苏联、外蒙,使中共“西北大联合”的构想与“国际路线”接轨并更加具体化。这一指示与张学良的构想,即以东北军暗中配合、共同行动为基础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以和打通联苏通道相一致。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1)“打通联苏通道”是红军行动方针的中心;(2)派遣潘汉年、叶剑英和朱理治前往张学良处。在此前后,张学良在潘汉年说服下已决定举事^②。

2.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与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默许和暗中支持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不断推进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有组织的发展。1936年3月,通过韩兆鹗(韩卓如)的帮助,谢华和徐彬如在杜斌丞组织的救国会基础上又成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和教职员救国联合会,还有以《西北文化日报》印刷工为中心而结成的印刷工救国会^③。之后,特别支部把童陆生从上海带回来的“救国会”相关文献作为基础,与杜斌丞进行协商,经杨虎城的同意,6月1日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救”)。“西救”设有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交际部和妇女部(后又增设人民武装部),谢华(9月后为杨明轩^④)任总负责人,并采取以干部会为中心的下述集团领导体制^⑤:

①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9~111页。

②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42~155页。

③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④ 杨明轩:(1891~1967),1926年加入中共。李敬谦:《杨明轩》,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⑤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总务部：韩兆鹗、童陆生
组织部：谢华、勋仲黎（成员：丁志明等）
宣传部：徐彬如、张兆麟（成员：王玉勋等）
青年部：勋仲黎（兼任）
交际部：宋绮云（后为杨明轩）
妇女部：韩钟秀、田润艺（成员：王准、张毅、曹冠群、高舍梓等）
人民武装部：宋黎、李象九
秘书长：李木庵

“西救”以其发行的地下出版物《救亡周刊》为机关杂志，并采取宣传“全救会成立宣言”^①等方法开展抗日宣传。杨虎城把有关“西救”的所有事务交给杜斌丞，在组织内部则由韩兆鹗代表杜斌丞的意见，“西救”的活动经费由杨虎城提供^②。7月30日，谢华通过当时正在收集十七路军情报的梁中德，向党中央汇报了西北特支的工作。这样，西北特支又与中共中央恢复了组织关系^③。

那么，进入西安东北军地盘的中共党员，是如何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发展的呢？

首先，刘澜波一边与苗淳然、宋黎、孙达生等人接触，一边开始摸索在东北军内建立统管党务的组织机构。4~5月，刘澜波回到天津，向北方局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北方局指示，成立以刘澜波（书记）、苗淳然（组织部长）、宋黎（宣传部长）构成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东工委）。6月初，刘澜波返回西安，传达了北方局的决定，并成立了东工委，实现

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154页。

②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134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3~124页。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了对东北军内中共地下党的统一领导^①。

由于国民党的镇压,这一时期中共西安地下党的活动极其困难,其标志性事件是3月的活路事件和8月的艳晚事件。3月,高崇民、栗又文和孙达生撰写了数篇主张抗日的文章,印成名为《活路》的小册子分发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察觉此事的国民党特务逮捕嫌疑犯,高崇民逃到了天津。8月,宋黎、马绍周等相继遭到特务拘捕,张学良在营救宋黎的同时,为保护刘澜波和孙达生而将他们“逮捕”,张学良还把栗又文派赴新疆,以避开特务的跟踪追击。8月30日,中共中央委派朱理治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西安指导东工委的工作,实现了对东工委的直接领导。刘澜波、苗淳然和宋黎分担的职务没有变化,只是项乃光改任组织部副部长,高锦明任宣传部副部长^②。

3. 共产国际8月指示与“三位一体”的成立

根据8月15日共产国际的指示^③,中共在总结“反蒋抗日”方针政策同时,不得不停止“西北大联合”的构想并重新制定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意味着张学良加入中共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直到1936年8月,杨虎城始终给予西北特支成员等在十七路军内部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员以关照,并对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也给予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有力支持。但是,他又一直回避与中共中央的直接接触和建立关系。9月,杨虎城在对中共会不会动摇其军事根基(十七路军)抱有疑心的同时,又对蒋介石软硬兼施打压十七路军的做法感到愤慨。在他得知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进展后,当机立断决定与中共建立固定的关系^④。6日,中共派张文彬会见杨虎城。第二天,张文彬与杨

①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②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87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23~132页。

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等人商谈并达成如下协议：(1)调整十七路军部署；(2)由杨虎城管理民团和保甲组织；(3)肤施(延安)和甘泉附近设置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络站；(4)设置电台。在金闽生的安排下，张文彬住在李兴中参谋长家。此时，领导中共西北军工作的中共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文彬；书记：欧阳钦)^①。另外，十七路军内的红军秘密联络站，作为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联络的中枢，负责人员和物资的转运^②。至此，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机制已经形成。

10月下旬，在西兰公路北面会师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尝试夺取宁夏、开通“国际线路”(打通与苏联、外蒙联系)未能成功，导致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孤悬于黄河西岸。11月8日，北路军、南路军和西路军不得不重新整编(参见第一章)。由此，红军处于守势，南京政府方面加紧了军事进攻。

西北的军事形势前途叵测，但随着上述“三位一体”机制的建立，西安的抗日形势迎来了新高潮。9月，抗日同志会在东北军内秘密诞生(主席：张学良)，该会是作为领导东北军的核心组织而成立，应德田(书记)、孙铭九(行动部长)、苗剑秋(宣传部长)等少壮派处于组织的中心地位。同时，刘澜波、刘鼎、苗淳然、栗又文等中共党员，也在抗日同志会成立之初就成为其会员^③。张学良还组织了东北军学兵队，成员大部分是天津等地中共组织派遣的学生。学兵队以“连”为单位组织起来，并秘密地设置了中共党支部。考虑到在东北军里组织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东工委提议由刘澜波、宋黎、车向忱组建东北民众救亡会(东救)。10月4日，“东救”召开成立大会，车向忱、洪钊、孙铭九、金锡如、

① 《张文彬给毛泽东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3页。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

② 凌辉：《张文彬》，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195页。

③ 武育文、王维远、杨育之：《张学良将军传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401页。

苗剑秋、韩启英、宋黎、刘澜波等30多人担任执行委员。“西救”与“东救”密切配合，相互提携，相继成立了群众性救亡组织——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10月)、西安“民先”(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9~10月)、西安新闻界救国联合会(12月)等，开展了辛亥革命25周年纪念大会(10月10日)、鲁迅追悼大会(11月1日)、支援运动(10月)、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游行(12月9日)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从而促使西安抗日运动不断高涨^①。

三、西安事变与中国政治的转变

1. 西安政治的重构

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展开军事行动，拘留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人。兵谏之前，张学良电话通知了中共中央^②。同一天，张、杨二人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2)停止内战；(3)立即释放“七君子”；(4)释放全国政治犯；(5)肯定群众性爱国运动；(6)保障集会、结社的自由；(7)遵守孙中山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③。为重新整合西安政治，采取以下措施：

一、成立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14日，宣告解散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并发起了由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学良、副主任委员：杨虎城，参谋长：董英斌)主持西北的军政事务。

二、规划委员会组织。12日，以高崇民、杜斌丞、卢广绩、应德田、申伯纯、黎天才、洪钊、王炳南、王菊人为成员的组织成立，目的

①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6页。

②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89~296页。

③ 《张学良、杨虎城双十二通电》，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页。

在于西安的政治主张更具体化,遇事可向张、杨咨询,之后有南汉宸、苗剑秋参加。

三、参谋长组织。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构成(主任:何柱国),具体探讨军事方针。

四、强化军队政治工作。在两军内设置政治处(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应德田,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申伯纯)。而且东北军还成立了抗日先锋队(队长:孙铭九),十七路军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任会长,南汉宸、孙蔚如、赵泰山、王炳南等参加)。

五、改组陕西省政府。由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长王一山改任民政厅长兼省长代理,秘书长:杜斌丞,财政厅长:续式甫,教育厅长:李寿亭,建设厅长:雷葆华(这个人事安排是由杨虎城确定的,没有东北军相关人员参加)。

六、强化宣传工作。12日,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炳南,组织部长:苏资琛、敖明远、王子安,武装部长:宋黎)。同时,接管国民党机关报《西京日报》,将其改名为《解放日报》,作为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机关刊物而发行。另外还接管省电台,用于宣传工作。

七、实施政治防卫工作。12日,把军队、警察、宪兵、特务作为管制对象,任命王以哲、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省会公安局长,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①。

以八项主张为共同纲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红军)“三位一体”的主张意向,通过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为核心的各级机构,进入了实施阶段。通过对下列事项的了解,大致可以看出中共在这一期间“三位一体”合作中的地位。(1)兵谏计划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具体策划安排,中共并未参与。(2)从12日周恩来进入西安到17日,

^① 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200页。

张、杨和中共通过电信联系对方针战略进行调整。(3)17日后,中共对外一直采取调解者的姿态。

民众指导委员会和20日公开活动的“西救”两组织,是西安民众运动的火车头。受其影响,十多天里又出现了各种救亡团体约200个。西安周边的20多个县里,也成立了救国会组织,“民先队”队员扩充至400~500人之众^①。

17日,周恩来与罗瑞卿、许建国等九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②。此后,西安的大政方针全有张、杨、周三人决定。23~25日,经过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介石的面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调确定^③。第二天,张学良陪蒋介石飞抵洛阳。

23日,博古和叶剑英抵达西安。中共代表团随即进行了工作分工,周恩来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承担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参谋团^④。25日,在博古的指导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成立(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李一氓,统战部长:谢华,西安市委书记:张德生)^⑤。

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三位一体”

从蒋介石返回南京,直到中共中央发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报^⑥以及该会议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的过程^⑦,伴随着“二

① 张魁堂:《挽救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11、2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58~37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⑤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

⑥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⑦ 《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436页。

二”事件(东北军“少壮派”杀害王以哲事件)引发的“三位一体”关系的解体,同时也是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形成联合抗日的过程,这一政局变化的方向,表明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趋于定型。有关这一时期西安的政治与中共的关系,应该注意下列几点:第一,中共一方面与缺少了能够统领“三位一体”联盟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保持联络,一方面仍视处于政治和军事劣势、在事变过程中遭到南京挑拨离间的十七路军为友军,极力维系“三位一体”联盟,并以此为背景迫使南京承认中共的存在。第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的局势估计比较乐观,并严厉批评了中共制造西北地区与南京对峙的政策,指出中共的主要任务是迫使南京放弃“剿共”政策、形成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共识,进而提议:为了实现保卫苏联和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应该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认真探讨研究苏维埃群众的组织化和放弃没收全部土地政策^①。显然,前者是对在南京的军事压力下,中共如何维持在战和问题上摇摆不定的“三位一体”的方向性意见;后者则明确提出了中共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态的基本内容。第三,蒋介石认为,西北问题的政治解决(陕西省和甘肃省黄河东岸地区的“中央化”),是当前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他有选择地将软禁中的张学良的意愿透露出去,由此成功地间接控制了西安的局面。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调整了方针^②,由此开始了与蒋介石的实质性谈判。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维系“三位一体”进行斡旋,中共陕西省委也开始着手恢复地下组织、发展党员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另外,“西救”也开展了武装民众、游行示威、检举特务、募集资金、慰问运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19日、20日),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78~79页。

^② 1月24日,中共召开了共产国际指示研讨会,决定把争取和平放在一切活动和政策的中心位置。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07~409页。

动和积极的宣传活动^①。这些活动,为“三位一体”的维持和强化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由于南京不断施加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三位一体”内部围绕和平与战争意见分歧,紧张气氛不断升级,终于引发了“二二”事件。2月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城。9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走马上任。3月上旬后,东北军开始向东部地区移驻。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随着事态的发展,红军也撤离陕甘苏区,至此“三位一体”宣告解体。

3.“三位一体”解体后的西安政治

“三位一体”的解体,使得西安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此时,中共在西安拥有下列三个组织^②:

(1)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西安事变”后,在三原设立了红军联络站。1937年2月^③,该站移至西安成了红军联络处。随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该站又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李涛,之后伍云甫),这是一个合法且公开的组织。

(2)中共陕西省委员会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书记:贾拓夫),由徐斌如、李初梨等公开进行活动的人员和秘密工作人员两部分构成。1937年4~5月,转移至西安近郊的云阳镇。

(3)社会调查部(农村工作委员会)

此机构是秘密组织,负责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德峰)。

随着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①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② 徐斌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114页。这些组织直属中共中央,由博古(后林伯渠)领导。

③ 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5页。

八路军、新四军在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除了完成输送抗日物资与人员的任务之外，还是统战工作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据点^①。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致力于从制度上保障自己的长期生存，同时希望能够成为构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势力之一。这些举措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共的组织网络在全国的基本形成。假如把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比作头部，把各地的办事处比作是身体各部位的话，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即是其咽喉部位。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地位对于西安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38年5~8月，全国性抗日运动进入高潮，有2288名青年人经由驻西安办事处进入延安^②。这一现象即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具有特殊意义的最好佐证。同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党员约为8000名，加上中共军队以外部队的党员，有近万人^③。

由于1938年7月宣侠父暗杀事件^④及翌年12月的土桥事件^⑤，国共关系一度紧张，中共在西安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⑥。

① 陈广湘：《抗战时期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上海：《党史信息报》第62期，1988年7月16日。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454、459~460页。

② 董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③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④ 宣侠父，1899年生，1924年加入中共，1937年9月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谋，工作在西安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金龙、鲍小牛、刘彤璧、奥存才：《宣侠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3、49、52~56页。

⑤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淳化县土桥镇挑起事端，并占领了原由国共双重管辖的宁县、镇原两座县城（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华北地区，中共力量优于国民党，国共关系的紧张由此发生。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92页。

⑥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122页。

结 语

中共组织在西安获得重生的契机,是在张学良、杨虎城得知共产国际“七大”新方针后,愿与中共接触并有意携手合作而产生的。换言之,是得益于平津地区的“政治空白”、上海租界的作用和西安“地方实力派”的合作。

1936年4月,“三位一体”初步形成,使得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成立“反蒋抗日”政权更加具体化(“西北大联合”构想)。5~6月,“两广事件”和救国会运动的发展,使得中国政治本身向“抗日”倾斜,同时也为中共构建全国性的组织网络提供了基本条件。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8月指示^①,“西北大联合”的构想受挫。9月,“三位一体”的成立,加速了西安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代表救国会系统组织的“西救”与“东救”。中共地下组织在这两个组织中又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与平津地区和上海完全一样。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三位一体”成立了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这样一个协调组织。此后,西安群众性抗日运动表现出如下形态,即以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为中心,由“西救”等救国系统统一战线组织具体开展活动,中共地方组织(12月25日陕西省委员会成立)从精神方面给予支持。由地域权力性质的统领组织来设立群众运动指导机关,在平津地区和上海等地的群众性抗日运动中是不存在的,这带有西安抗日战争的特色。在这一时期,西安的中共党员由1935年夏的三四百人跃升至1938年12月的8000人。

西安事变时,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有立即释放“七君子”的要求,这是支持“三位一体”联盟的西安民众组织展开的群众性抗日运动对西北军事委员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表现,也是源于上海的救国会运动在各城市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的表现,“七君子”的被捕,也是同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87页。

样性质的表现。此外,中共既承担西北军事委员会的一部分任务,同时又一直是南京和张、杨之间的“调解人”,所以选择了这一立场,目的在于促使南京在解决中共问题上放弃军事手段,并在政治、军事和政治主张上给予中共一定的生存空间。而且,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也作出了与中共上述政策措施基本相同的规定^①。从1937年2月后西安的政治活动中,可以透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动态,中共越过“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这一状况与抗战初期的武汉大致相同。1938年9~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中共党、政、军三大系统的一元化组织机构。八路军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办事处网络,使中共在完成自身一元化组织建设的同时,也成为酝酿和筹划新的政治运动的前提。

^① 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无条件地盲从共产国际的指导。1936年12月21日,中共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有选择地传达给西安,以及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代表大会上对新政策所作的系统化阐释(参见第三章)等就是例子。尽管如此,应当肯定这一阶段双方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和协调的。

第七章 武汉

——抗日高潮与长江局

前 言

从1936年到1945年期间的中国政治,处于战时体制的框架之下,包括中共在内所有的政治势力,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统率下聚集在一起。这个政治框架,以拥有军事力量的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中共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契机,在“临时首都”武汉得以具体化(本章中把这个时期称作“武汉时期”)。

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武汉,无论是过去的中华民国史,还是中共党史,都未能给予其恰当的评价。在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中,既没有南京沦陷后武汉发挥“临时首都”功能的论点,也没有言及武汉时期统一领导南方中共党组织活动的长江局^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载是:“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机关都迁至武汉办公”,并且,“长江局成立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②。但是,中共党史记载的重点是长江局书记王明的错误,因而很难发现从整体上反映长江局活动的统计资料^③。王功安、毛磊在其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一

①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53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9~528页。

书中,对武汉时期国共两党良好的关系作了详尽系统的论述^①,但以当时国共关系为前提如何来描述武汉时期的历史形象,似乎这一问题尚未解决。本章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武汉时期中国政治的转机与变化以及中共组织活动的考察,阐明其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共党史中的作用与意义。

一、全面抗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 战时体制确立与国共关系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要求日本保全中国的主权、领土和冀察地区的行政组织、军队的完整,强调这是使卢沟桥事件不扩大为全面抗战的最低条件,如果不能满足,中国将为国家的生存不惜全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抗战到底^②。7月底至8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逮捕令,开始释放“七君子”和陈独秀等政治犯,并解除对他们的限制^③。8月中旬,战火已烧至上海,全面战争的扩大已不可避免。8月12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暂时停止中央政治会议的活动,设置新的国防最高会议,以掌控抗日救亡的大局。在同一天的国防最高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蒋介石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设立国防参议会等决定^④。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

① 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主编,第604~641页。

② 天津:《大公报》1937年7月20日。

③ 孙党伯:《郭沫若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美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④ 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85页。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美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卫抗战说明书》，向国内外宣告，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奋力抗战^①。为掌握和统领全国战局，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划定了4个战区^②，9月8日，作为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设立了第1部（作战）、第2部（政略）、第3部（国防工业）、第4部（国防经济）、第5部（国际宣传）和第6部（民众训练）^③。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举行第1次会议。这个由各党派参加的常设咨询机构的创立，赋予了中国政治新的内容和条件^④。最初被邀请的有15人，其中包括中共的毛泽东（由周恩来出席）、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救国会派的沈钧儒、邹韬奋，乡建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⑤。

这样，将中国政治成功地转变为战时体制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步入了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阶段。8月19日，国共双方协商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率3个师。22日，国民政府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⑥。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⑦，第二天，

①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说明书》，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27～329页。

② 袁旭、李兴仁、雷德吕、吴美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③ 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

④ 至1938年6月17日止，国防参议会共举行了64次会议。参见邹韬奋：《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胚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⑤ 邹韬奋：《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胚胎》，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41～43页。梁漱溟：《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续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409～411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页。

⑦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8页。

蒋介石发表谈话^①。这样,与中共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的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形成。

2.《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12月政治局会议

7月,周恩来起草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②,13~14日,于庐山亲手交给了蒋介石^③。八一三事件促使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决心,但在《宣言》的发表问题上没有妥协。8月14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等,“不忙于要求发表”、“欲速不达,缓则有济”,同时指示,要将宣言中的“三大纲领”,改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阐明中共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④。

8月22~25日,在中共举行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⑤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⑥。《决定》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主要是“实施抗日阶段”,以获得前阶段尚未完成的民主,而这一任务必须在夺取抗战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同时,《决议》深刻地指出,国民党发动的抗战既限制人民的参加,又没给予他们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是片面的。主张只有按照《十大纲领》发展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运动,才是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会议还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新班子^⑦。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

①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401~402页。

②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371页。

④ 《中央关于修改“国共合作宣言”的问题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244页。

⑤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30页。

⑥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6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八路军由总指挥部和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构成^①。从8月下旬到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部队就开拔山西的前线,与国民政府军共同对日作战,并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②。9月6日,中共将陕甘宁特区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③,并承认南京政府及其中央政府的地位,把中共自己掌握的权力,定位为地方政府。另外,对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也采取了灵活的方法^④,在各地设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通讯处^⑤。9月25日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⑥,指出在现阶段中央政府仍然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府,在国民政府按照中共《十大纲领》发布施政纲领并付诸实施前,中共党员不参加政府。

共产国际却因此对中共领导层的力量表示担忧,让滞留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等返回国内。12月9~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⑦的报告并获会议通过。决定采取国共两党“共同责任、共同执导、相互援

① 《中央革命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332页。

② 《关于向国民党解释“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的指示》,《关于我军应坚持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的指示》,《关于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7、338、339~340、353~354页。

③ 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美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④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通报。10月,国共双方就新四军的编制、待遇、供给进行交涉。经中共中央批准,11月12日,叶挺在武汉着手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⑤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21页。陈广湘:《抗战时期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党史信息报》第62期(1988年7月16日)。

⑥ 《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5~347页。

⑦ 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6~545页。

助、相互发展”的方针开展工作,并尽快实现与国民党的真正理解与合作^①。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1)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部的党的工作;(3)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指导新四军^②。

3. 初期的武汉地下党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武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遭受了重创。12月12日,武昌省立高级中学、华中大学等校学生何功伟(何斌)、王曦、陈述元等人倡议,召开了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为支援北平学生举行全市游行示威;(2)尽快成立学生组织。17日,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成立,开始了游行准备和组织工作。20日,武汉三镇的学生开始游行示威,23日,汉口召开了由1000名学生参加的市民大会。1936年4月8日,湖北省政府命令解散武汉学联并停止其活动。在这种状况下,武汉大学成立了青年救国团,省立高级中学、女子师范等组织了“读书会”,何功伟、姚树森、万国瑞、余梅青等组织的20多个学校约200多学生参加的武汉学生救国团(武汉秘密学联)成立^③。

1936年初,北方局为恢复武汉的中共活动,派李家栋(董毓华)前往武汉。3月,李家栋与圣罗修以女中教师霍恒德取得联系后同赴上海。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会”)成立大会上,霍恒德被选为常

^① 杨奎松、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杨奎松:《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871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46页。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35~36页。

委,6月在天津加入中共并改名何伟^①。何伟也在同月离开武汉前往上海。通过老党员钱亦石的介绍,他进入全国学联工作并于8月入党。同是“读书会”成员,又是女子师范的学生王曦和省师范的郭仁寿,与上海地下党成功取得联系后实现了入党愿望。王曦回武汉后,将“读书会”成员吸收到党组织,并成立了中共武汉支部。6月18日因受到镇压,除郭仁寿、王锡珍外,其他成员全遭逮捕^②。之后,北方局派何伟回到武汉。他与失去组织的党员王锡珍、习东光取得联系后,成立了何伟任书记的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工委”)。1936年底,他在筹办了释放“七君子”的活动后离开武汉,不久在南京被捕。由于临工委和北方局间的关系由何伟单线保持,双方的关系就此断绝^③。在武汉期间,何伟作为“全救会”常委,以生活书店为据点全力展开活动。夏秋之际,武汉学生救国会、武汉妇女救国会、武汉职工救国会等组织先后成立。年底,有约300人会员的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但在西安事变后,武汉的救国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④。

1936年12月,武汉出生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学生、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民先队”)队员林贤复(郭铭)回到武汉,与秘密学联的部分成员联合组建了武汉“民先队”。1937年8月,在征得博古同意后,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杨学城率十多名平津流亡学生来到武汉,吸收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徐永昭:《十载春秋战江城:何伟战斗在武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武汉风云人物》,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47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张作群:《铁马金戈战敌伪,含笑刑场典范留:记何功伟烈士》,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武汉风云人物》,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④ 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36页。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8页。徐永昭:《十载春秋战江城:何伟战斗在武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武汉风云人物》,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了何伟指导下的 20 余人,成立了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①。9 月,“民先队”总队部负责人于光远受中共委派来到武汉。他会见了武汉“民先队”的负责人谢文耀、林贤复。9 月底,“民先队”总队部驻武汉办事处成立^②。

1937 年 9 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武汉,主持武汉、湖北的党务工作。10 月下旬,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成立了李湘龄(李涛)为处长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活动有:(1)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2)与湖北省政府谈判;(3)对鄂豫边区的高敬亭、湘鄂边区的傅秋涛部队提供给养、服装等^③。9 月下旬,郭述申(李振寰)从甘肃经延安来武汉,着手湖北、武汉地区的党建工作。此外,经与国民党交涉而出狱的何伟、陶铸(陶剑寒)、钱瑛,也于 9 月底和 10 月中旬来到武汉。10 月下旬,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成立,郭述申任省工委书记,陶铸和钱英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武汉地区的党员虽然不过 30 多人,但在省工委领导下制定了整顿基层组织和扩大党员的目标。杨学诚也参加了省工委的工作。为强化劳动运动,王翰、王亦清受省工委派遣,主持湖北、武汉地区的劳动运动^④。省工委还和董必武取得联系,在高敬亭部队驻地黄安县七里坪设立了党员训练班,董必武派

① 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 1985 年版,第 36 页。张作群:《激流中永生的战士杨学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等编:《武汉风云人物》,武汉: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9 页。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3 页。

② 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 1985 年版,第 36~37 页。

③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武汉,编者 1985 年版,第 1 页。

④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3~154 页。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4~295 页。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 1985 年版,第 39 页。

方毅(方静吉)任训练班主任。刘西尧、赵辛初等共600多人接受了训练^①。董必武还和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老朋友石瑛交涉,最后同意在应城的汤池成立人才培养机关——汤池训练班,培养、训练能为农村合作事业和抗战贡献的栋梁人才。训练班于12月20日正式开学,陶铸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全权处理训练班的实际工作。至次年5月,中共在此处共培养了300多名干部^②。

二、“临时首都”武汉的诞生

1. 国民政府西迁与武汉的新形势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③。党、政各机关开始从南京撤退,其中多数迁至武汉,武汉因此成为“临时首都”^④。

那么,此时的国际形势如何呢?1937年8月30日,国民政府向将于9月13日召开的第18届国际联盟总会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的申诉。10月6日,总会认定日本的行动违反“九国公约”。但在11月3~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没有通过中国要求对日制裁的决议^⑤。8月21日,与中国缔结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1亿美元的短期贷款。苏联还答应于1938年3月和7月,分两次提供合计为1亿美元的第二次贷款。武汉时期,中国从苏联购买了565架飞机、82

① 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41页。

②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4页。

③ 汉口《大公报》1937年11月21日。

④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⑤ [日]白井勝美:《口中戦争の政治的展開:1937年~1941年》,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4卷(日中戦争・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121~125页。

辆坦克、817 门大炮、700 台汽车、6325 挺机关枪、645 万发子弹、140 万发炮弹和 6.58 万发炸弹。至 1939 年初期，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 3665 名军事顾问。这一时期，在不引起日本对苏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苏联最大限度地援助了中国，良好的中苏关系，对武汉时期的中国政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①。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②，也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中日首脑级的谈判渠道的丧失，从而导致了战争的长期化。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抗战到底是它唯一的选择^③。

1938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第 62 次中常会，决定改组行政院，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7 日，军委会改组，决定：（1）废止旧有各部，第三、四部移交经济部，其他四部改为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2）何应钦任军政部长，副参谋总长白宗禧为军训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随后，军委会设置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和其政治部的设置，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机关重新复活。周恩来就任军政部副部长，象征着国共合作后中国政治的新变化^④。

2. 武汉的共产党

在“临时首都”武汉的中共组织中，公开活动的是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群众》周刊社及《新华日报》社。与中共代表团表里一体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秘密设置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实际上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工作据点，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还开展了与当地社会密切相关的活动。

① [日]井井友義：《ソ連の動向：1933年～1939年》，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第4卷（日中戦争・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257～360頁。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頁。

② 《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年版，第386頁。

③ [日]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卷，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7年版，第178頁。

④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147頁。

1937年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来武汉。23日,召开了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合并两部门,对外使用中共代表团名义,对内称长江中央局;(2)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和周恩来分任正副书记;(3)长江局下设秘书处(处长:李克农)、参谋处(参谋长:叶剑英)、民运部(部长:董必武)和组织部(部长:博古)^①。长江局在各个方面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活动,其中(1)在华南恢复党组织,改组南方游击队与新四军;(2)《群众》、《新华日报》创刊;(3)保持与国民党的关系;(4)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5)做好对地方实力派、党外人士和国际友人的统一战线工作^②。

1937年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初,叶剑英及南京办事处的部分人员来到武汉,两组织合二为一(处长:钱之光)。改组后办事处的职责为:(1)向国民政府领取八路军的军饷、装备;(2)兼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3)代办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及物资;(4)为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输送人员;(5)掩护警卫长江局;(6)参加抗日救亡运动^③。

12月11日,作为中共理论刊物的《群众》周刊在汉口创刊,到1938年9月18日的第2卷11期止,在武汉共发行了36期。另外,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至11月24日间一直在汉口发行,汉口沦陷后改在重庆继续发行。这些报刊的公开发行,使中共获得了在国统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媒体渠道。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中设立管理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训练及党务工作的第一厅、主管民众运动和国民军事训练的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页。

②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王仲清:《关于长江局的作用、功过问题》,上海:《党史信息报》第69期(1988年11月1日)。

③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4~12页。

二厅以及从事有关宣传事项管理的第三厅,郭沫若任第三厅长。第三厅的策划、人事及预算权由郭沫若掌握,并由周恩来、郭沫若、董必武、博古、杨翰笙等人具体实施。4月1日,第三厅在武昌云华林正式成立,下辖负责一般宣传的第五处(处长:胡愈之),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田寿昌,即田汉)和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范朱康)。三个处各设三个科,定员300人,加上4个抗敌宣传队和10个抗敌戏剧队,总人数为3000人^①。在第三厅,设有郭沫若、杜国庠、董维键、冯万超、田汉、杨翰笙组成的党小组和由冯乃超(书记)、刘季平(组织委员)、张光平(宣传委员)组成的党支部,冯、刘、张三人兼任三个处的党小组长^②。显然,第三厅可以看作是中共统战工作的据点,武汉展开的群众性救亡运动,也处于中共的领导之下。

1937年12月25日,湖北省工委根据长江局指示召开了第1次扩大会议,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湖北省临时委员会(“省临委”)。^③当时,武汉地区有中共党员100多人,其中本地人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为外地流亡学生,大部分属于群众团体。1938年3月,“省临委”举行了第1次会议,确定武汉为工作重心,尤其要侧重于劳动运动的工作^④。根据3月15日通过的《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⑤,24日,长江局发出《关于恢复组织关系的通知》,“省临委”强化了党员发展工作^⑥。3月底到4月中旬,武昌、汉阳、汉口三区委相继成立。

①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49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条例》,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编者1985年版,第68~71页。

② 邵和平:《抗战初期党对武汉文坛运动的领导》,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89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④ 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⑤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8页。

⑥ 抗战初期长江局专题组:《抗战初期长江局大事记》,编者1983年版,第25~26页。

“省临委”还在青年救国团总团、青年救亡协会、抗战教育研究会、社会科学座谈会、孩子剧团、妇女战时工作总团内建立了党团组织^①。5月22日，“省临委”召开了第2次扩大会议，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湖北省委员会^②。5月，湖北省委掌握的党员人数在汉口地区有338人，全省1040人，除上述三区委六党团外，湖北省委还领导着黄冈（鄂东）、鄂南、鄂中三个中心县委，鄂西、鄂北二个工委和沔阳、崇阳二个特别支部^③。

3. 抗日高潮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第三厅成立不久，于1938年4月7日设定了“抗战扩大宣传周”，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7日，举行了有周恩来、郭沫若参加的宣传周开幕式，这一天被定为“文学”宣传日，举行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盛会。8日至12日，分别确定了“口头”、“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宣传日，来到武汉的文化人士分别参与策划了各种宣传活动^④，推动着武汉的抗日活动走向高潮，除了第三厅的活动外，还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各党各派的活动，报纸、杂志的发行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援。

据《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估计，沦陷以前的武汉地区有各类群众性救亡团体七八十个之多^⑤，下表就是对这些团体的成立及与中共间关系的梳理。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② 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52页。

③ 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全省组织情形报告》，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编者1985年版，第113～116页。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④ 郭沫若著、小野忍、丸山升译：《抗日战回想录：郭沫若自传（6）》，东京：平凡社1973年版，第58～71页。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298页。

⑤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209页。李权时、皮明麻主编：《武汉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武汉时期群众救亡团体统计表

1. 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驻武汉办事处(3709)△2 ★○●,青年救国团(3712)△2 ★☆○●,汉口蚁社(3801)△2 ●,中国青年救亡协会(3802)△2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3804)★○●,武汉职业青年抗敌工作团△2,中华青年急进救亡协会2,中华青年抗敌救国团2

2. 学生团体 湖北省学生抗敌工作联合会(3712)△,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3803,第2次全国大会召开)

3. 劳动团体 汉阳兵工厂抗敌工作团(3801)△2,武汉职业界抗敌工作团(3802,新华日报)△,武汉工界战时服务团,粤汉铁路工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3803)△2 ○●,汉口邮务工会武昌分会△,武昌市工人抗敌总会△,武昌裕华纱厂员工战时服务团△,武昌工界抗敌协会2

4. 文化团体 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3708),汉口剧界同人战时服务团(3708)△,汉口剧业剧人劳动公演团(3709),全国抗日大联盟(3712),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3712)2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3712)2 ○◎●,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3801)○●,孩子剧团(3801来汉)△2 ☆●,全国歌咏协会(3801)○◎●,武汉合唱团(3801)2,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3801)2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3801)2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3803)△2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3803)△,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3806)2,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2,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3806),中国世界语协会(3806),中华全国摄影协会(3810),武汉业余歌咏团△2,“三八”女子歌咏团2,社会科学座谈会☆

5. 妇人团体 战时儿童保育会(3803)△2 ○◎●,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3804)△◎,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3807)△2 ○●,武汉各妇女团体联合办事处(3808)2,新生活妇女工作团(3809),湖南妇女战时工作团△☆

6. 教育、启蒙团体 抗战教育研究会(3711)△2 ☆○◎●,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3801)△2 ○●,全国战时教育协会(3802)△○◎●,武汉小学教师服务团△

7. 大众团体 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武昌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汉阳县民众抗敌后援会△

8. 宗教团体 僧众救护队(3801)△2,武汉基督教难民服务团(3803,新华日报)2,战地僧众服务队(3805),中国回民救国协会(3805),回民战地服务团(3806)2,回族青年服务团(3808)△,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3809)△○,中国

回教青年抗敌协会²，武汉抗日僧侣救护队

9. 其他 无锡青年工作团△●，东北救亡总会△●，武汉华北宣传队²，朝鲜义勇队(3810)△

备注

(3709):表示1937年9月成立。

△:《武汉地区主要抗日团体一览表(负责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纪念馆陈列馆》展示(1988年12月)。

2: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133~136页。

★:中共党员为团体的负责人

☆:中共设立的党团

○:在设立过程中,中共党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设立时,中共党员任理事

●:在日常活动中,中共党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90、152~179、205~209、213~223、229、241~244、359~361、366页。李权时、皮明麻主编:《武汉通览》,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274~279、283、439~440页。章绍嗣、胡水清、程克夷、刘炳泽、阳海清:《武汉抗战文艺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198、201~202、238、247、251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编:《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武汉大事记》,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17、21、23页。抗战初期长江局专题组编:《抗战初期长江局大事记》,编者1983年版,第21页。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167、174页。李泽、郑自来、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市历史学会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48~50页。邵和平:《抗战初期党对武汉文艺运动的领导》,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市历史学会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81页。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1937年12月28日,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在中共湖北省临委

直接领导下成立,其总团部建立了以杨学城为书记的中共党团组织。“青救”团员发展至5万人(其中武汉1万人)之多,在武汉的青年团体中极具影响^①。此外,成立于1938年2月13日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青协”),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青年救亡组织,“青救”、武汉民先队和蚁社等都是其团体会员。“青协”理事长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伦的儿子叶楠,宣传部长和组织部副部长由中共党员钱俊瑞、刘守生分任^②。成立于1936年5月29日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全国学联”),直接受命于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1938年3月25日,“全国学联”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全国学联内此时也有蒋南翔、郑代巩、陈柱天等组成的中共党团组织^③。

1936年11月发生在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事件,实际上是中共和国民党工会共同策划的行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协会的负责人朱学范站在运动前面,起到了团结全国工会组织的作用。1938年3月5日,以武汉工界战士服务团、粤汉铁路工会等18个团体为筹备委员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成立,中共长江局派蔡树彬、刘群仙、廖似光、袁青伟等人,作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参加了筹备会的活动。但这个构想由于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中国工人抗敌总会最终未能设立^④。

1936年的上海救国会运动,以同情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为先导,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广泛团结各阶层的力量,在这些具体组织及实际活动中,上海地下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参见第五章)。如上述武汉时期群众救亡团体统计表所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武汉文

①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209页。李权时、皮明麻主编:《武汉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② 李泽、郑自华、肖志华:《抗战初期党在武汉领导的革命斗争》,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市历史学会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编者1985年版,第49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④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361页。

化界行动委员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在筹划准备、成立之时理事的选定、成立后各阶段的日常活动,都有中共党员从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表明,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经过“八一三”时期上海救亡协会的过渡,由武汉的抗敌协会得以继承。1938年5月20日,妇女运动领导者50多人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共讨开展妇女抗战建国的工作。7月1日,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武汉地区19个妇女团体的代表出席。该委员会发展迅速,成为国共以及无党派女性的统一战线组织^①。

1937年11月21日成立的抗战教育研究会,在中共党员刘季平的努力和湖北国民党元老孔庚及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呼吁下成立。该会倡议成立教育界的全国统一战线组织,得到了武汉各团体的呼应,于第二年2月21日组成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前者的日常工作,由代替刘季平、陶行知出任《生活教育》编辑的白桃主管,后者则由中共党员朱启贤(总干事)和白桃(协会总务)担任^②。还有1938年1月成立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乡促会”),是由董必武与孔庚交涉后才成立的乡村统一战线组织,任“乡促会”秘书的何功伟,起草了该会的章程、计划,后经理事会决定付诸实施^③。

武汉时期,除了国共两党外,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党还有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隶属救国会和职业教育社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展开舆论活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放松了舆论控制,武汉出现了许多报纸、杂志。1937年9月和次年1月,汉口版的《大公报》和《申报》

①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19页。李权时、皮明麻主编：《武汉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83页。

②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179页。李权时、皮明麻主编：《武汉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276页。

③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王毓英、杨存厚：《何功伟》，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编：《湖北英烈传》第1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页。

开始发行。同时还有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的《武汉日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政训处主办的《扫荡报》，中共在国统区发行的唯一报纸是《新华日报》。此外，还有第三党的《前进日报》、由陈枢铭等赞助的《时代日报》和救国会系统的《大众报》。1937年12月，武汉地区发行的杂志有30多种，第二年3月份达67种，7月份前后增至百种以上。其中，主要发表各党派、诸团体政治评论的综合杂志达40多种，文艺类杂志20多种^①。

1938年3月，佛朗哥将军突破阿兰高的防线，人民战线政府首都马德里危机四伏。马德里抗战和武汉抗战两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城市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支持的焦点。1938年1月，苏联空军志愿者100多人来到武汉参加对日空战^②。同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来华，按照印度首相甘地的提议，举行了“中国日”。还有阿古耐斯·斯美德莱参与红十字活动，为中国军队筹集医药物资而奔走呼唤，并作为《曼彻斯特·坎底安》报的特约记者，向国外介绍了中国现状^③。另外，成为第三厅计划委员的反战作家鹿地亘发表了多篇文章，声援中国的抗战运动；妻子是中国人的绿川英子（长谷川），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对日科担任日语播音员，向日军士兵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非人道

①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199页。1938年5月出版的各种刊物中，受中共影响而编辑、发行的有30多种，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② 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碑文》记载，2月8日、15日、7月9日、16日、8月3日、12日、17日和21日，战死的苏联空军志愿兵有15人。《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碑文》，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编者1985年版，第209～210页。

③ スメドレー・アグネス著，高杉一郎译：《中國の歌ごえ：改訂版》，東京：みすず書房1972年版，第171～202页。

主义行径^①。

随着抗日运动的高涨,国共两党开始筹划制定共同纲领。1937年12月25日,长江局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阐述在初步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和军队的基础上,各种抗日力量更加紧密的团结,是解决当前时局困难的关键,表明了中共不仅有诚意在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也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共同建国^②。27日,王明执笔起草的《挽救时局的关键》,提议设立一个协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的选择和国共两党日常诸多问题的组织^③。12月20日,在王明、周恩来等与蒋介石、陈立夫的会谈中,两党委员会的设置进一步具体化。26日,在两党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周恩来、刘健群承担了起草《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的任务。30日,《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交两党委员会,但未被具体讨论便束之高阁了^④。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王明在会议上主张,在军事方面:(1)集中全部力量保卫武汉;(2)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3)建立几十个有新式武装的师作为全军的骨干。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

①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65页。[日]鹿地亘:《火の如く風の如く:解放への道》,東京:講談社1958年版,第19~59页。郭沫若著,小野忍、丸山生譯:《抗日戰回想錄:郭沫若自傳》(6),東京:平凡社1973年版,第55页。[日]高杉一郎:《中國の緑の星:長谷川テル、反戰の生涯》,東京:朝日新聞社1980年版,第138~147页。

② 《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册(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3页。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③ 陈绍禹(王明):《挽救时局的关键》,[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87页。

④ 杨奎松:《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872~875页。

盟,以健全民意机关、群众团体^①。3月24日,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②,除上述三点的政治主张外还表明,其发表方式,或由各党派各团体共同签名发表,或由国民党或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然后由各党派各团体宣言拥护和遵守,均无不可。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全大会”上通过了推举蒋介石、汪精卫为国民党正副总裁,废止国防参议会、设立国民参政会,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等措施。《纲领》规定,在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抗战建国大业的基础上,确定三民主义暨孙中山遗教为抗战行动及建国的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③。这样,《抗战建国纲领》的部分内容得到中共的赞同。

三、保卫“大武汉”与长期抗战的准备

1.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条例案》^④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通过,由国民政府对外公布。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首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200人名单。政党方面,有中共的毛泽东、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常乃惠,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罗隆基、胡石青、梁实秋、张东荪、陆鼎揆和第三党的章伯钧。在民众团体方面,有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

^① 陈绍禹(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96、105~108、108、111页。

^②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488页。

^③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

^④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46~50页。

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职教会的黄炎培、江恒源、冷御秋以及乡建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等人^①。会前的7月5日，《新华日报》刊载了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阐明：(1)《抗战建国纲领》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纲领基本一致；(2)在职权规定上，国民参政会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国民参政会却是全国政治生活向民主制度迈进及团结统一各方面力量的展示，国民参政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使者，人民的代表，目前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②。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6日至15日在武汉召开，各党派、团体162名参政员出席大会^③。议长汪精卫主持大会，行政院长张群作了政治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内政部长何键、外交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陈立夫、财政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张嘉璈、经济部长翁文灏、政治部长陈诚等也作了工作报告。共计提案130件，决议案达120件^④。12日，支持《抗战建国纲领》的郑震宇等28人、陈绍禹等67人和王家模等21人的三个提案，经中共(陈绍禹)、青年党(曾琦)以

① 邹韬奋：《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胚胎》、《“来宾”中的各党派任务》，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69～72页。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299页。宋春主编：《中国的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②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③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5页。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以外的6人参加会议。

④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75页。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续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17页。

及蒙古、新疆代表的赞成发言,改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①,与会人员起立鼓掌一致通过。15日,会议最终确认:(1)中国抗战的目的,纯为自卫;(2)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得到世界公论之热烈的同情与援助,此乃我全体国民所感谢不忘者;(3)日本在北平和南京擅设傀儡组织,又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时,则以中国行将赤化之说,肆意宣传。凡其颠倒是非,造谣煽惑之用心而已。会议通过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宣言》主张以抗战建国的总目标为基础,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领袖,拥护《抗战建国纲领》^②。由此,《抗战建国纲领》成为抗战时期体现中华民国政治方略的基本文献。

始于武汉的国民参政会,1938年10~11月在重庆召开了一届二次会议。参政员既不是通过选举的国民代表,也不是由各党各派协商决定的,而且国民参政会也不承认除国民党以外的政党的存在。但是,参政会是经过规范的法律程序组织起来的,并含有少数代表各党各派的参政员在内,因而成为宪政运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改革的主要政治舞台^③。

2. 形势紧迫于抗日救亡运动

从6月11日日军攻击安庆开始到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花费了4个半月的时间,中日双方在长江沿岸五个地方展开了激战,战线扩大到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国民政府在庐山、幕阜山、大别山和武汉附近构筑工事,在武胜关(北)、城陵矶(南)、田家镇(东)处修建了防堤工事。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武汉防卫作战计划,并明确了各部队任务^④。

6月15日,《新华日报》刊登了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博古署名的

①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13日。

② 《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16日。

③ [日]西村成雄:《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二〇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東京:研文出版1991年9月版,第117~189页。

④ 皮明麻:《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0页

《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一文^①，发表了长江局对武汉防卫的见解。王明等人认为，应该借鉴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经验，与其相比，“我们今天实具有保卫武汉的一切可能条件”，并详细地论述了有关军事、政治的战略方针。他们提议，在政治上应以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结社的自由为前提，促使民众团体的组织化；在抗战建国总方针的指导下，各党派应该共同设立教育、训练、组织青年的团体；应该发挥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对抗战建国工作的积极作用。

此时，国民党也加强了对其统治区内民众的动员、组织及出版物的管理。武汉会战伊始，军事委员会设立了第九战区，承担长江沿岸的作战任务，6月21日，陈诚任湖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8月3日，陈诚设立了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三青团中央团部、后勤总部、第九战区政治部、三青团武汉团部、励志社、湖北武汉省市政府和党部、平汉铁路和武长路党部、汉口和武昌市商会以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构成，不包括各党派和民众团体代表^②。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的创设，是以“统一的组织下训练青年，使其信仰三民主义”为目的。6月发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团员不得参加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团内也不得成立任何小组织。7月9日，中央团部成立；8月22日，三青团武汉支团部筹备处成立，通过三青团的工作，国民党实现了青年阶层的组织化^③。武汉卫戍司令部发布了《民众团体登记办法》、《民众团体高级组织法》

① 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

②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6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4、514、516～517页。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293页。杨奎松：《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编者1992年印，第878～879页。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抗战法制文献选编》，武汉：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和《武汉民众团体战时行动规约》，强化对民众团体活动的限制。8月20日，下令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及其他14个团体^①。对此，《新华日报》表示反对和抗议，指出民众团体的整顿和登记的目的，在于强化民众团体并使其具有活力，而解散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并有群众基础的“民先”等三团体，对于民族的利益和武汉的防卫来说是巨大的损失^②。7月底，武汉各报纷纷报道国统区出版图书、杂志必须提前送审的《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和《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接着，武汉16家出版机构提出：（1）这项法令对业务的影响非同一般，有导致战时出版事业萎缩、枯竭的危险性；（2）《抗战建国纲领》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请求重新考虑定夺。9月12日，《群众》刊载潘梓年的《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一文，要求政府按照《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接受武汉出版界的请愿^③。

军事形势趋于紧张时，抗日救亡运动则不断高涨。“七七”事变周年前，第三厅组织了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筹备会预定从7日开始的5天内，在市内五个地方设置固定捐款点和两个移动捐款点，有100万人响应募捐，捐款金额达100万元^④。为管理“七七”捐款，组成了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总委员会，以陈诚为委员长，郭沫若和马超修为副委员长，这一民间团体实际上归第三厅负责。之后，该组织又开展了30万慰问袋、慰问信募集运动，以青年救国会为首的各民众团体积极响应。9月中旬后，该委员会又组织了前线慰问团，除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外，第三厅所属的抗战演出队和电影放映队等也参加了慰问团，携带慰问信和宣传材料、锦旗、药品等奔赴前线。专门将

①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武汉大事记》，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33～34页。

②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8月21日。

③ 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31日、8月1日；汉口：《群众》2卷10期，第564～565页。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365页。

④ 郭沫若著，小野忍、丸山升译：《抗日战回想录：郭沫若自传（6）》，东京：平凡社1973年版，第85～93、96～98页。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354页。

各种宣传物品送往前线而成立的战地文化服务处,形式上也是各机关合作组织的,但实际上仍由第三厅主管运作^①。

3. 走向长期抗战的时局

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力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今后的战略方针是进入山地战和湖沼战”^②,因而武汉地区的国民政府各机关,开始撤往重庆。8月1日,汪精卫公布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律撤销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限期转移。4日,驻汉口的所有行政机关迁移重庆^③。

与此同时,工厂、学校的转移和武汉市民的疏散工作也在进行中。当时武汉有516个民营工厂和20个国营工厂,还有从外地迁来的170个工厂。武汉附近的钢铁所和兵工厂的转移,由直属军政部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省所属的各工厂由湖北省建设厅负责;其他工厂由翁文灏经济部长为处长的工矿调整处负责。这个时期,迁往大西南各省的442^④个工厂中,来自武汉的达250个(约占57%),这些工厂成为大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学校的转移如下:4月底,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武昌中华大学迁至宜昌三斗坪,华中大学迁往桂林。5~6月,省政府发出《湖北省各级学校疏散办法》、《湖北省公私立学校联合设立办法》,在鄂西和鄂北设立了联合中学和小学联合分校^⑤。6月,武

① 郭沫若著,小野忍、丸山升译:《抗日战回想录:郭沫若自传(6)》,东京:平凡社1973年版,第98~110、130~156页。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358页。

② 汉口:《大公报》1938年6月10日。

③ 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美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④ 郭耀琪:《抗战初期武汉工厂内迁》,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249~258页。

⑤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246~247页。

汉警备司令部和全省防空司令部发表了《为疏散人口告同胞书》，要求疏散“老幼妇孺”和停留在武汉的农民。7月，武阳人口委员会成立，推进了疏散的调查、登记，并确保交通的畅通^①。

5~6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1)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2)在这个阶段，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3)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问必须认真的提出与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条件中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上动员^②。5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1)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2)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日的游击战争；(3)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③。8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长江局：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④。中共湖北省委积极开展农村工作，6月至8月，派遣方毅、刘西尧、张体学、陶铸、杨学城等20多人前往农村，成立了鄂东、鄂南、鄂中三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⑤。武汉沦陷前，省委还组织了郭述申、钱英和刘季平的“三人小组”，把数百人以第三厅的名义派往各县。他们以各县战地文化服务站站长或工作员这一合法身份，开展外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编者1985年版，第245~246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43~44期(1938年7月1日)，第14~15、32~33、37、40页。

③ 《中央关于徐州失后华中工作给长江局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519页。

④ 《关于保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⑤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县农村工作^①。在社会激烈的动荡中,许多党员向往延安和敌后的八路军及新四军,或者伴随工厂和学校的迁移,奔向了四川和湖南。武汉沦陷前,该地区大部分党员都转移到外地。10月为止,湖北省党员约有3000人,其中鄂东1300人,鄂南700人,鄂中300人,鄂北400人,鄂西为390人^②。

10月24日,蒋介石命令放弃武汉,25~27日,汉口、武昌、汉阳相继失守。25日,周恩来率领长江局、《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离开武汉,省委领导钱英、王翰也从武汉转向鄂西。

结 语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而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认为,抗日战争的局面,正从敌进我退为特点的第一阶段向双方对峙为特点的第二阶段转变,并指出:(1)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2)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③。同时,会议决定废止长江局,设置南方局、中原局,并改组东南分局为东南局^④。

另一方面,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1页。

③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753~755、755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举行。29日通过的《全体会议宣言》指出：广州失守，武汉撤退，抗战局势由前期转入后期，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内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至于抗战最后之目的……为确立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现平等自由之国家^①。同时，会议还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该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②。广州、武汉的沦陷，是中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的标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都把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之后建设新国家，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但所建国家性质却不相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提出“东亚新秩序”构想，国民政府声明并不否认参与这一构想的可能性^③。12月22日，日本又发表了对华三点根本方针，即建设由中日两国和“满洲国”构建的“东亚新秩序”，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实现中日经济提携。然而，日本政府的这一方针，是以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推行反共政策和在中国领土内驻扎日军为前提条件的^④，这是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

1939年后，国民党秘密发出《共党问题处理办法》^⑤、《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⑥等文件，以封锁限制中共的活动，并试图将受中共影响的群众组织，整合到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一企图，势必与明确表

①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2～543页。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63～564页。

③ 《國民政府と雖專拒否せざる旨の政府聲明》，[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年版，第401页。

④ 《近衛聲明》[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年版，第407页。

⑤ 《共党问题处理办法》，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656、657～665页。

⑥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71～674页。

明活动重点放在前线和敌后的中共发生摩擦,因而也就引发了如皖南事变那样的国共间大规模军事冲突。虽说如此,尝试限制和封锁中共活动,仍然是以反对日本侵略并将坚持抗战为首要前提,对于国民党而言,并不存在两者选一的问题^①。因此,虽然国共间怀有深刻的怨恨和诸多摩擦,但是团结中国社会广泛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并抗战到底这一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经过武汉时期的抗日高潮,又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契机而被牢牢地确立下来。

^① 王檉林著,田中仁译:《抗日戰爭史研究におけるいくつかの問題》,大阪:《大阪外國語大學學報》74 卷 73 號(1987 年),第 91 - 95 页。

第三部 领导人群像

——协调与纠葛

第八章 王 明

——共产国际与中共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已开始从过分强调毛泽东作用的教条式理解中摆脱出来,围绕具体事实的考证性研究展开。与此同时,对“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刘少奇、彭德怀以及陈独秀、瞿秋白等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中共领袖进行重新评价,并根据具体的历史过程来阐述他们的作用。

然而,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前期毛泽东在党内的最大对手王明,从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到1951年胡乔木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②,均是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1969年到1974年间,王明在为当时苏联的理论辩护的同时,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的曲折,中共党内对王明的评价,与上述刘少奇等人相比是极为谨慎^③。

已往的理解是,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4年间,王明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这一时期的政

①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第952~1003页。

②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问题》(第3卷第4期)所刊载的《追悼王明同志》一文中,称赞王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争取民族、社会解放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积极参加者”。中国对于王明则是全面否定的政治评价。

治、军事、组织路线上犯了极其重大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后,这些错误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克服。邓小平时期,中共否定了中共党史的路线斗争史观^①,但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中,对王明的政治评价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20世纪80年后,王明的评价问题终于成为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党史学界对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达成了共识^③。但是,这一积极评价应该如何表述,不同的论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一般认为:(1)不谈王明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及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等文件的关系(或者仅仅对事实进行简单介绍),而是强调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极大损失;(2)在阐述“八一宣言”以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时,往往把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张与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列,强调两者的对立面和后者的独立性^④。

①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274页。

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352页。

③ 翟越:《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讨论观点综述》,《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3期,第109~112页。这篇文章是对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学会和东北师范大学于1988年6~7月间在长春共同召开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第五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的综述。

④ 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孙武霞:《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朱铃、张先智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张琦^①、黄启钧^②、杨奎松^③、李良志^④ 等的成果,以出自王明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上述三个文献为前提,对“八一宣言”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值得注意。

王明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将共产国际的意见套用于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分析该问题的必要前提。但同时,他并没有让中国革命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这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王明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中共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

1.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留苏派”指导部成立

1904年4月,王明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今金寨县)。1924年,王明进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翌年10月,王明在武汉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加入中共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该校副校长米夫相识。1927年1月,王明随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回国,并作为米夫的翻译参加了中共“五大”。会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宣部秘书兼《向导》杂志编辑。“七一五”事变前夕,王明与米夫一道离开中国返

① 张琦:《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与共产国际》,北京:《党史通讯增刊》1986年第1期,第86~97页。

② 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3~10页。

③ 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北京:《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77~310页。

④ 李良志:《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1集,1989年版,第31~45页。李良志撰、田中仁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樹立における王明の役割について》,《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第2號,1990年,第233~256页。

回莫斯科^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王明与洛甫、王稼祥、沈泽民等人一起留校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并参加学校支部局的工作。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米夫同时就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在他支持下,获得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信任的王明,控制了学校支部局的实际领导权,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教条主义的小宗派(苏联留学生派,即“留苏派”)^②。

1929年3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从事宣传工作约半年时间,10月转入中共中央中宣部,任《红旗》杂志的编辑。1930年1~2月,王明曾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拘留。释放后,王明做过全国总工会发行的刊物《劳动》的编辑,6月又重回中宣部。7~8月,因对李立三的领导提出异议而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被下放至江苏省委宣传部做干事^③。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始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函,对李立三所犯的系统性错误提出批评^④。王明通过苏联归国的留苏学生,比中共中央更早地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即将此前就开始写作的题为《两条路线》^⑤的文章,按照共产国际书信的内容加以修改和补充,于11月底公开散发。1931年1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成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⑥。此后,他在中共中央各个部门安插“留苏派”人物。2月10日,王明的《两条路线》文章在附上《几点必要的声明》后正

①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2~14、16~18页。

② 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05页。

③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6页。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112页。

⑤ 绍禹:《两条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日]本莊比佐子译:《王明选集》第3卷,东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7~112页。

⑥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2页。

式发表^①。这篇文章，“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超过‘正确’的‘纲领作用’”^②。夏季以后，王明为躲避国民政府的镇压而潜伏在上海郊外，10月访问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③。

2. “两条路线”与推进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王明是在1931年10月离开中国的，但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一段时间内，“王明左倾路线”仍然继续支配着中共中央。这是由于(1)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2)当时的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绝对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王明控制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常常是以共产国际名义给中共发布指示^④。

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国际的运作实态进行考察。共产国际“六大”所通过的《世界纲领》^⑤，其主旨是要在世界政党中树立共产国际的形象，如加藤哲郎所述：

(1)1924~1928年间，共产国际认为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乃至“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期，在共产国际内部，苏联共产党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各国支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控制不断强化，积极向各国共产党移植苏共的组织模式——强制推行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军事化管理”、“铁的纪

①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笔者判断，本庄比佐子所编《王明选集》第3卷所收《两条路线》的版本，与本文采用的是同一系统的版本。

② 中共六届扩大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64页。

③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页。

④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简编》，《近代中国人物》第3辑，第479页。此外，王明还在1932年8~9月举行的第12届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当选为干部工会委员(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负责共产国际执行部领导中共的工作。

⑤ 《共产主义国际纲领》，[日]村田陽一译：《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4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年版，第325~368页。

律”。在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苏共内部的政策演变成理论斗争进而“发展”成为“派别”问题和组织清洗、重组^①。

(2)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与英俄委员会的结束(1927年7~9月)为契机,共产国际认为1929~1933年间世界进入“社会法西斯”(“大恐慌”)时期,共产国际向“左倾主义”的“阶级斗争”政策转变^②。

(3)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7~9月)通过的《世界纲领》与次年“社会法西斯论”的盛行,使得“获得多数、统一战线、工人政府”及初期的共产国际的政策基点,开始向“阶级斗争、与社会法西斯斗争、苏维埃型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此外,由于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危机”的时代认识与“第三期也即革命高涨期”的形势分析,导致“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产生,在对世界形势也即时代认识方面,也是基于苏联的存在及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一般性分析方法、世界“不均衡发展法则”与打破“最薄弱环节”的理论为前提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形势判断与政策选择的僵化。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也即列宁主义,具有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排除具体性和特殊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倡导一元化、模式化的经济主义与还原主义,斯大林式的“真理”独占及实用主义等特征。此外,《世界纲领》的僵化本质,也就是苏联模式化的产物^③。

(4)直至共产国际“六大”召开,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袖也就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1929年布哈林失势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委托给马林斯基、皮亚托尼斯基等中央委员,真正的决策者是斯大林。此时,苏联国家利益与共产国际运动相关联的结构开

①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124~127页。

②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57页。

③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57、133、210~211、234、269、279~297页。

始形成^①。

《两条路线》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把握,亦如加藤哲郎所述。王明对1930年6~8月间“李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等问题以及中共“六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对照式的批评,将李立三路线概括为“反共产国际、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此外,王明指责为调整李立三暴动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以致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②王明引用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指示信的结语,作为其文章的结尾:

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们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③

1932年3月,王明这篇文章附上《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后,以《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奋斗》为题在莫斯科发行了第二版。这个《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的主要内容是:(1)阐述与反对李立三路线斗争相关的问题;(2)对罗章龙派——罗章龙因质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而被开除党籍——的斗争;(3)对当

①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260页。

②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260页。

③ 绍馥:《两条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111页。

时党内存在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问题。其中,所涉及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指党内肃清“‘右的’与‘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王明要对其反对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的斗争胜利加以“确认”,并强调对这两条路线“残余”进行继续斗争的重要性。所以如此,在于敌对势力的思想对“我们队伍中薄弱的、落后的和动摇的分子们”的影响,使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并出现了“一贯的机会主义系统”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进行“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中共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发展进而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①。

自中共成立至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先后派往中国的代表主要有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诺伊曼等人,以此来指导中共,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指导失误的批评已经公开化。最初,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是为了使中共能够及时掌握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改变的指导方针^②。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留苏派”中央成立,《两条路线》的发表以及王明访苏并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据此,共产国际的指示以中共代表团为中介,由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加以贯彻的体制得以确立,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与加藤哲郎所言的共产国际历史上“第三期(1929~1933)”相适应的中共的重组。

如前所述,对1935年以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的诸文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宣言》、《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均来自王明等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然而,把争取“布尔什维克化”与“两条路线”斗争,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任务的中共,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外,并无人提出改变“以打击中间势力为主”的政策。

3. 政策转变的探索

如加藤哲郎指出的那样,从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7~9月)到

^① 《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1932年3月)》,[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162、165页。

^② 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七大”(1935年7~8月),其政策转变主要有:(1)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进行“民主”与“反动”的区分,并对战争不可避免论加以修改;(2)确立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观点,重新评价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3)放弃“社会法西斯”、“主要打击左翼社会主义”的观点,改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4)将统一战线论扩展至人民战争论;(5)提出统一战线政府、人民战线政府的问题;(6)提出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7)共产国际组织与领导形式的改变。在苏联“和平外交”政策转变的引导下,法国共产党经历了从“统一战线”到“人民战线”再到“统一战线政府、人民战线政府”的运动与政策的发展,推动了共产国际“政策体系”转型的不断深化^①。1934年5月,“七大”的准备工作就已真正开始,其标志是斯大林推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会委员,10月,“对现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不能再予以维持,对人民战线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评价的转变也在这一领域扩展,此外,共产国际的组织形态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发生着决定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已经达到不可能回归到第13次执委会决议水平的“不可逆点”^②。

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工作的王明,虽然在准备委员会中属于保守派^③,但也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1934年11月,中央苏区红军从瑞金退出也即长征开始后,王明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工作人员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全党指导策略上的“新观点”、“新方法”:(1)“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我们不仅能够夺取士兵群众,而且在武装保卫祖国底旗帜之下能够夺取很大一部份中下级军官成份”;(2)在国民党军中,“甚至一部份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底革命情绪逼迫之下”,“不得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

①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373~374、330頁。

②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375頁。

③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365頁。

(3)“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4)充分利用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派系矛盾,可以有力地推进红军的斗争;(5)红军不应拒绝对反蒋地方势力的援助,应当与他们签订作战协定,“应当倍加地积极起来”,“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6)关于反蒋派针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中共必须竭尽全力“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底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①。上述方针即是要团结反蒋势力,实现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对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的政策转变所作的准备。

1934年9~11月,王明等人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信中,对中共中央此时在东北地区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同时将满洲省委置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直接指挥下,并派遣吴平赴满洲省委工作^②。1935年6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致吉东特委的指示中指出:(1)对于东北地区而言,目前“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的时期”,要尽可能多地动员民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主力,必须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为准备应付将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和事变打好基础;(2)党的各项工作,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武装抗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要实行全民的统一战线^③。此后,东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所属支部各国开展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指出当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结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线^④。在共产国

① 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1973年版,第381~384頁。

② 李良志:《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1集,北京1989年版,第243頁。

③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頁。

④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388、396頁。

际“七大”期间,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的中心思想,王明也在报告中对这种基本认识作了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实践

1. 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确立了“主要敌人是法西斯”的论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王明作了题为《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论述了“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①,提出中共应从“国民党中国”与“苏维埃中国”最后决战这种两分法的理论中摆脱出来,推出新的政策体系,即以保卫“中华民族社会”为轴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认为统战工作的全面展开及为之而进行诸政策的转变是可能的,这一提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参见第三章)。中共据此报告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地为其自身的存在提供了政治乃至制度的保障,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政策成为以抗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整合论的根本核心所在^②。

王明认为,起源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中国革命的高涨”,要求中共必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轴心进行政策的根本性转变。然而,这种“中国革命的高涨”的认识,与1934年秋至1935年夏中共在长江中下游苏区的丧失、中央红军的大幅减少、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建立新根据地的困难以及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撤离川陕根据地等中国革命的实态相去甚远^③。

这种所谓的“中国革命的高涨”的认识,是怎样产生的呢?其依据

① 王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诸国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战术:共产国际第7回大会上的演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1973年版,第527~560頁。

② [日]西村成雄:《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二〇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東京:研文出版1991年版,第41~44、66~69頁。

③ 王明:《高昂的中国革命》,東京:《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998年20期,第43~65頁。

的信息又是什么呢？王明作报告之际，会议大厅所展示的一幅地图真实地表明了这一认识。笔者认为，研究这一问题应考虑两个前提：(1) 1934年5~7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所作出的中央红军从苏区撤退的决定，已为共产国际所接受^①；(2) 以往赖以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的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电台，由于同年9月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与莫斯科间的联系中断^②。1930年以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建议中共在西北地区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苏区，并对此时红军的动向极为关注^③。由于与中共的通信断绝，不能获得外部的信息，对长征时期的红军动向也不甚了解（只有零星的情报），王明只根据一些背景情况不太可能绘成此图。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红军的主要情报，极有可能是1935年夏天仍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提供的。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派陈云、潘汉年抵达莫斯科。直到此时，共产国际才了解到遵义会议以及红军从开始长征到达四川后的状况^④。可以说，这件事成为王明等人对“中国革命的高涨”形势的认识予以改变的契机。

围绕着王明的报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以前一般认为，象征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政策转变的标志性文献，就是《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但如何理解王明的报告与这个宣言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问题。“八一宣言”是由王明起草的，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最后完成的。王明的报告与“八一宣言”在政治上的作用，似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③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48~354页。

④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337页。1935年5月30日，在泸定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重建白区地下党组织以及为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而派陈云赴上海等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当时，陈云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改选向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陈述。（有关此点，请参见第九章。）

乎可以明确区分为近期和长远两种(应该特别留意的是,大会报告与公开发表的宣言,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其两者间的关系,如李良志所言: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侵占华北的一系列事件,民族矛盾进一步深重。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等,急电在基斯洛沃德克疗养的代表团团长,速返莫斯科商讨对策。他回来后,立即组织全体代表团成员讨论国内形势,在代表团会议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并负责起草新的统战纲领。

经代表团多次讨论,于7月14日通过了以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中共代表团将宣言的最初文本议成俄文,呈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得到满意认可。8月7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共产国际七大作报告,首先向世界各国党宣读了这一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后再经修改,于1935年10月1日正式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由于文件的签署日期为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①。

由此,两个文献的关系已是十分清楚。但在报告中,王明所宣读的“宣言”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八一宣言”宣称: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抗日救国”是当前中国政治所面临的“神圣天职”,倡导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第十项要求中还提出了“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王明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形势判断与“八一宣言”相同,但却未提及“八一宣言”中所有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及“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笔者认为,有关“国防政府”行政方针一项,在王明报告中被删除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领民众抗日运动潮流的“一二·九”运动,是以共产国际“七大”新方针的传播为前提的,从12月6日北平

^① 李良志:《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1集,北京1989年版,第37~38页。

学联发表的共有9条的纲领来看,它不像“八一宣言”的内容,却与1934年4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所公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①一脉相承,这是由于此时“八一宣言”尚未在平津地区传播的缘故。

第二,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是由张浩传达到陕北的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也据此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党的方针确立下来。需要补充的是,张浩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尚未结束时离开莫斯科的,随身连一张小纸片都未带^②。因此,张浩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只能从“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这份资料中得以确认^③。中共中央直到1936年3月才得到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有关文件^④。

第三,从1935年末到西安事变爆发这一时期内,国共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秘密谈判,蒋介石利用有利的时局谋求从根本上解决中共问题的策略,积极寻求与中共的接触,1936年11月,终于实现了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的双方高层会谈,但随后谈判便破裂了。12月,因西安事变爆发,实现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形势急转直下,促使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⑤。笔者在此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国共秘密谈判的最早接触,实际上是在莫斯科发生的。1935年末,国民政府驻苏

①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686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14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72页。此电报的主要内容有: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是原则性的,1.以统一战线为基本的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和最高的形式,3.将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以上这些均已电达。政治决议及抗日救国宣言,即根据此基本原则出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④ 王明的报告中并未提及“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有可能是综合代表团内部的意见所致。另外,张浩直至从莫斯科出发归国时一直都是代表团成员,应该也参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因此可以推知,瓦窑堡会议决议所包含的“十大纲领”,自然会对7~8月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内容有所反映。

⑤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武官邓文仪向蒋介石提交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报告的概要。随后,邓文仪与王明的接触显然是奉蒋介石之命而行的^①。

综上所述,笔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王明几乎同时^②发表的“大会报告”与起草的“八一宣言”两个文献,对当时中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2.《救国时报》与“新形势与新政策”

1935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报》。在与中共中央联络断绝的情况下,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国际的新方针,以期引导中共政策的转变并带动中国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具有政策转变象征意义的“八一宣言”,发表于10月1日《救国报》上。11月,《救国报》被法国政府停刊。12月9日,又继续创办了《救国时报》^③。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8月25~28日,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陈云和潘汉年向会议报告了有关红军长征的状况,以此为基础,会议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此时,中国革命深刻而全面的危机和“红军与苏区的弱化”,是会议反思以前中共政策的基础^④。王明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刊登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俄文版)上,还分别发表在《救国报》、《国际新闻通讯》和《共产国际》上。王明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在这一时期,应该停止苏维埃革命斗争(反帝革命斗争与土地革命斗争),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把苏维埃作为抗日斗争的团结的中心,以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尽管王明把“反蒋抗日”作为基本前提,但

①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② 在8月7日所作的大会报告与10月1日发表的“八一宣言”期间,王明不可能同时既讲“中国革命的高涨”,又称革命形势正在好转。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到“八一宣言”发表期间,中共代表团内部的争论也没有显示出这一点来。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02页。

③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54页。

④ 柯柯西克:《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3》,东京:国民劳动运动研究所1971年版,第298~299页。

他同时又认为,在蒋介石、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条件下,存在与他们联合抗日的可能性,这是值得注意的。1936年1月,在收录王明以前论述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一书中,他更进一步地对“反蒋抗日”的前提部分加以修改,提出了把蒋介石纳入统一战线的构想^①。

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书的《前言:论两种统一战线》中,王明对这种新构想有如下论述^②:

(1)从1935年11月至翌年1月止,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傀儡政府的成立,自“一二·九”运动以来,华北地区民众的抗日运动不断发展,“中国的事变已经有了新的长足的发展”。

(2)“现在在中国正在形成着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共产党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另一种是日寇汉奸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

(3)“在这种全民要求抗日讨贼的严重空气逼迫之下,连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也不能不开始在有些问题方面,表示出与日寇和汉奸异趣”,不管站在什么立场上,形势都“需要它在最近将来的实际行动作答复。”

王明上述认识的转变,基于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好转,并考虑到蒋介石在已经开始的国共秘密谈判中占据主导。因此,中共的认识会依据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行动发生变化。4月30日,《救国时报》刊载了以“九一八事变几年来,蒋汪等卖国贼,借‘准备抗日’之名,行卖国投降之实”起头的题为《怎么准备抗日》的文章,依据当时南京政府对东征军及红四方面军进行军事攻击、镇压民众抗日运动以及推进亲日外交等情况指出:“的确,实际上,南京政府在政策上早已不仅不是中国人民的政府,而且不是中国的政府。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早已丧失了

① [日]《王明(陳紹禹)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戦綫論の形成について》,廣島:《史學研究》第158期(1983年),第34~37頁。

② 王明:《新形势與新政策》,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4卷,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版,第319、323、325~326頁。

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资格。”^①而在《救国时报》6月5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王明称“当内争未息的时候,从中国内部政争的观点看,蒋介石毫无疑问地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主要敌人;因此,一切反蒋派别,主观上或客观上不能不是红军反蒋的朋友。”^②

3.“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

1936年7月23日,与共产国际恢复电信联络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提交的工作报告,共产国际召开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执行委员会干部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指出:(1)“基本接受”王明对中共决议的批评,这种批评同时也适用于王明等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等人;(2)中共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团结绝大多数民众共同抗日;(3)现在应该强调指出: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中华全国国民议会”并通过这样的议会解决土地问题等新口号;(4)中共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蒋反日”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共产党人必须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以新的口号全面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同时,季米特洛夫提议以王明的建议为基础,委托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共同参与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③。共产国际8月的指示与此基本相同,王明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得到会议的认可,并被视为中共政策转变的基础。

王明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四点:第一,苏维埃可以带给中国真正的解放,中共九年来为苏维埃权力而斗争的历史已经作出证明。中共“六大”召开时与现在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估计到中国人民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今天不赞成苏维埃这事实”,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实行苏维埃革命路线的任务应该暂时搁置;第二,日本的侵略对中国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产生威胁,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

^① 陈绍禹(王明):《怎样准备抗日》,巴黎:《救国时报》第27期(1936年4月30日)。

^② 王明:《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关于中俄同盟及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反蒋派别之间底关系问题》,巴黎:《救国时报》第33期(1936年6月5日)。

^③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发言》,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4~86页。

华人民主共和国”(它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普选召开全国性的议会,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而斗争;第三,主张国共的再次合作,进行革命斗争的阶级基础既包括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又包括无产者、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包括“抗日地主”在内)所有愿意抗日的阶级;第四,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强化苏维埃政权与扩大红军的同时,无产阶级一定要牢牢掌握领导权^①。

他说,在国民党内“有一部分很有力量和很有威信的领袖当中”,对中共及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表示动摇,还没有决心,还表示害怕”,“历史告诉我们,决定和创造历史命运的,是千百万民众的意志和努力,而不是少数个人的意志和愿望”^②。在王明看来,把握住“抗日救国”是“民众的意志”,可以推动国民政府向抗日政策转变,通过暂时放弃苏维埃革命路线,可以为中共政策向国共再次合作的转变提供理论依据。这再一次表明了国家权力与支撑其存在的“多数民众”相对照的论点。由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从以“社会”为基础转变为以“国家”为基础。即为了“抗日”而提出“民主”问题,使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框架,由以“抗日救国”为核心的阶段发展到以“抗日民主”为主轴的阶段。

然而,第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是“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所在;第二,要实现“人民民主共和国”,必然要求通过普选选举召集国会,并放弃现在的政权体制,以当时的状况,实现此点是极为困难的;第三,放弃苏维埃革命路线,是由于此时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特殊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在理论上讲,苏维埃革命仍然是中国获得真正解放的唯一道路。上

^① 陈绍禹(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4卷,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版,第16~29页。

^② 陈绍禹(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4卷,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版,第20页。

述是实现王明观点所必须要涉及却未提及的要点^①。

王明的观点作为从理论上重新审视近代民族主义价值观的中轴,尽管表达了放弃“反蒋抗日”转向国共再次合作的意愿,但它与法国共产党在确立了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状况下,在参加人民战线政府的展望中对近代民主主义的再评价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从中国政治的现状看,中共能否针对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此外,共产国际“七大”对于近代民主主义价值观没有直接进行再评价,而是以业已提到议事日程的斯大林宪法为媒介的^②。王明的观点是以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这些议论为前提的,因此,在运用近代民主主义的诸价值观,对国民政府从“训政”向“宪政”的推进进行再评价的脉络中,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具有政策化的意向性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最能反映阐述救国会运动与中共“民主共和国”设想之间关系的,是毛泽东的《致章乃器等的一封信》^③(至今尚未能看到此信的中文原件),此信件不仅未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而且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谱》也未提及,因此应对此信的性质与地位做更进一步的考察。由于1936年10月30日《救国时报》第64期在加了编者按后全文发表此信(译自英文),应该也代表着1936

① 陈绍禹(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4卷,東京:汲古書院1974年版,第21、26页。

②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425~429页。

③ 信中称:1. 宣布了一切抗日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在苏区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欢迎一切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党派、团体派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共同负责,一切商人和大小资本家的财产工厂,均不没收……对于一切积极参加抗日的军官和地主,均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2. 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件。此外,在非苏维埃区域中,我们虽然拥护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但同样我们不故意的加紧反对资本。3. “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是以反帝、民主的统一为目标的,“不是短命的暂时的苟合”。为了民主的统一的前提,甚至可以废弃苏维埃制度。《毛泽东同志致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5页。

年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观点^①。

三、“昆仑山的神仙”及其挫折

1. 12月政治局会议与“右倾投降主义”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王明提出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观点。他认为,根据抗战的需要,必须迅速集中全国反日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必须推进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组织的合作以及全国军队总动员的完成,“几年来,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方案与要求”,被概括为十项条件。在抗战的新时期,中共的任务就是不断强化红军与苏区,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与组织,动员农民参加为民族和民主利益的斗争,推动青年工作,确保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党员数量,扩大中共在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影响等^②。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王明这篇文章是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共产国际内部讨论的基础上执笔写成的^③,同时,王明在归国后对这种政治主张作了进一步的发展——(1)国民党被置于“我们的同盟者”的地位;(2)“南京国民政府应当而且可以成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种条件在民族独立斗争的推进与民主制度的实施中会逐渐得以明确;(3)必须建立包括有全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国统一的国家军队。

^① 7月23日,季米特洛夫称:“我们的同志还应该同救国会即同该会组织者打交道”,这一工作的中心是潘汉年。《毛泽东致章乃器等的一封信》显然包括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在内。参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发言》(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4~86页)和李新、陈铁键主编:《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480页)。

^② 陈绍禹(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

^③ 从王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根据季米特洛夫在8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会召开的有关中国问题特别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第3辑,1990年版,第20页。

第二,王明指出,中共当前最直接的困难是政策的全面转变、落实新政策的干部的不足以及中国革命的敌对者的破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必须强化思想斗争与干部教育。这一逻辑的支撑,是如下所示在形势的变化下“中国苏维埃化”口号的放弃,以及作为共产主义者存在理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念。

我们共产党员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下,积极主张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全中国的国会而斗争;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钟也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分钟也不会停止其为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的信徒^①。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反复讨论了中国的局势与中共的任务。10月10日的决议,概括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武装抗日的开始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事业的顺利进展,迎来了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针对这一形势,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应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工作、领导的形式与方法,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并选拔新干部,力争获得合法地位,加强对工人和工会的工作,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并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坚决执行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止一切破坏活动,获得国际的支援等指示^②。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活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以前的政策“包含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解除思想武装的危险,会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

^① 陈绍禹(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第3辑,1990年版,第26~27页。

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①。当时,留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五人:王明、康生、陈云、邓发、王稼祥,除王稼祥有病需要疗养外,决定派其余四人回国,尝试对中共中央进行集体领导^②。11月29日,王明乘专机飞赴延安。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称: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把王明他们比喻为是从昆仑山下下来的“神仙”,从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归来的同志们被迎进了中共中央^③。

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④。

针对这种认识,杨奎松则认为:(1)“王明为什么突出谈论的却是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问题呢?这显然与王明等人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的谈话不无关系”——“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

①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第3辑,1990年版,第17~20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42页。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页。

用……季米特洛夫也谈到,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但据此“简单地认定王明这时的主张是想取消共产党、八路军的独立性,投降国民党,恐怕是不准确的”。(2)“不能否认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这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如何能够在不影响抗日大局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确保自身的利益和便利革命前途,严格地说,就是毛泽东也还缺少经验”。(3)“只有毛泽东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军队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① 笔者认为,对于传统说法从政治上将王明的主张概括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评价,杨奎松的观点在强调当时中共中央实态的前提下,对王明报告的价值进行了考察,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2. 统一战线领导与抗战构想

1938年1月1日,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宣言》^②,连同他自己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③一起发表在《群众》杂志上,公开了中共中央的新方针,并以此在武汉大学发表了题为《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演^④。《宣言》声明,卢沟桥事变以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抗战,“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蒋介石所阐述的抗战方针,与中共有关时局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在民族危机紧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2页。

^② 《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3页。

^③ 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武汉:《群众》第1卷第4期。[日]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5卷,东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83~90页。

^④ 陈绍禹:《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讲演》,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565页。

迫之时,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更加团结,这是挽救时局的关键所在,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根本方针,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共不仅在抗战阶段中诚心诚意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共同救国,在抗战胜利后也决心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共同建国。因此,以国共合作为核心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国政府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国民革命军的充实与加强,不仅是抗战胜利的保障,而且也是两党建设新中国的基础所在^①。

此后,王明这一主张在中共长江局的活动中进一步得到贯彻。笔者对此留意到,王明认为,(1)“抗日”之外,根本不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共基本上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民生民权不是不谈,而是在抗日的总题目下谈,不能妨碍统一战线。”^②提出以是否抗日作为区别敌我的最主要标准的论断^③，“有组织才有力量,有组织,力量才伟大”,他还指出日本侵略的起因在于中华民族的危机与中国政治的分散性,并将中国与同样是殖民地的印度进行了比较^④。他认为,抗战已经发动,应该强调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是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国家军队,充实、加强和扩大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实力,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2)围绕着抗战战略,一直有正规军与游击战之争。在武汉大学的讲演中,王明对此做了如下阐述:

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

① 《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3页。

② 陈绍禹:《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讲演》,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565页。

③ 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武汉:《群众》第1卷第4期。[日]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5卷,东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84页。

④ 陈绍禹:《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讲演》,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565页。

其实单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①。

王明的这些主张,在保卫武汉时期的中共长江局的政策中得到延续。王明认为,武汉已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国的马德里”^②。因此,保卫武汉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继续具有重大意义,进而要求在国共两党及其他军队中选拔优秀人才,装备新式武器,组建数十个国防师团作为全军的中坚,认为这是“对于抗战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他还主张普遍推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此必须对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③。王明对保卫武汉意义的强调,对于根本没有条件进行正规战的中共军队而言,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可言,与重视游击战在抗战中作用、认为保卫武汉只是一个“争取时间问题”的毛泽东的观点,显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参见第七章)。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关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王明认为,信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为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有必要根据统一战线共同纲领,建立一个常设的两党委员会,进一步强化合作的范围与深度。两党的关系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此外,双方应设法减弱摩擦,以增进共

^① 陈绍禹:《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讲演》,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页。

^②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武汉:《群众》第1卷第19期。[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5卷,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96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

^③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武汉:《群众》第1卷第19期。[日]本莊比佐子編:《王明選集》第5卷,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105~107页。

同抗敌的效能,而不应该故意挑动和扩大不必要的摩擦^①。在此,王明的观点建立在两党关系不以各自组织的独立性而是以平等的两党关系为前提,然而问题是,国民党并不承认两党关系平等这一大前提(参见第三章)。在这一场合下,王明的主张有可能单方面地限制了中共的政策与行动。

(4)有关“革命策略的转变”及合作建国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的政策“自动地由原来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转变为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性质是:

中国共产党所提的这一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不能不有别于过去历史时期中由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所形成的欧美某些国家的旧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它还绝不是苏维埃式的或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它将是而且一定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胜利过程中产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切参加对日抗战到底的各种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②。

另一方面,在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却指出:中国的将来,是从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共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只是一种过渡势力而已;将来要争取的,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服从我们的领导,并最终赶走右派。这些讲话当然不足与外人言^③。换言之,王明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当前的战略方针就是要实现“抗日”,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推动“民主”,在适当的时期再回归至苏维埃革命,并进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思路令人费解。但从“一分钟也不会停止其为苏维

① 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武汉:《群众》第1卷第4期。[日]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5卷,东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84、86~87、89页。

② 陈绍禹:《挽救时局的关键》,武汉:《群众》第1卷第4期。[日]本莊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5卷,东京:汲古書院1975年版,第85~86页。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的信徒”的一贯思想来看^①，王明的这种设想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阶段”，王明认为，中共应该把握的有关主张与行动，先是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然后再回归到苏维埃革命，这种主张，根本不可能为中共的组织与影响的扩大指出明确方向。

3. 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然而，当时中共最主要的考虑还是组织问题。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目的就在于强化政治局集体领导体制的功能，由此，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在思想沟通发生了深刻的分裂。通过任弼时对中共实态的介绍，共产国际基本认可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的政治路线，并发出了中共中央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周围的指示^②，这对王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1937年11月回国以来，由于王明的观点被视为就是莫斯科的指示，他的回国也被看作是以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为目的的——一些人常常用“钦差大臣”比喻此时的王明——这是王明在中共中央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根本所在。

另一方面，1938年5~7月，毛泽东以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系统地构建起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战略思想，这一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带来中共力量的壮大。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对抗战的历史特质、抗日统一战线的性质作以阐释，确认了国共合作“长期合作、合作建国”的基本方针，在强调军事与政治策略的中国特性的同时，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观点（参见第十章）。王明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并称“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党中央和毛同志的

^① 陈绍禹：《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

^②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2页。

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达成共识的政治方针进行了概括。第一，在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与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批评过去党的方针的言辞，因而也没有发现对王明的明确批评。实际上，11月5~6日毛泽东在未公开发表的《总结报告》中，对王明进行了批评^②。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③。基于王明在会议上对各个报告均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认为：“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④第二，在抗战进行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中，应该承认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并根据国共“长期合作”进而“合作建国”的政治形态调整政治方针。10月1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行期间，周恩来携带着毛泽东、王明的信返回武汉并会见了蒋介石，向其转达了经季米特洛夫批准的毛泽东的提案，希望恢复国民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或者建立民族革命联盟。这次谈判虽然于12月无果而终，但派周恩来赴

①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在中共六中全会的发言提纲》，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辑下册，1978年版，第175、218页。

② 这个报告由1. 六中全会的成果，2. 广州、武汉沦陷后的形势，3. 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4. 战争与战略问题，5. 其他问题等五部分构成，第三、四部分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9~520页。

武汉,表明了当时中共依然把国民党的改造与“合作建国”看作是重要的政治课题^①。第三,将来回归到苏维埃革命的问题十分微妙。如前所述,王明对于此点的展望与当时毛泽东的想法相同是毫无疑问的。但笔者以为,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特点而产生了具体化的军事与政治思想,并进一步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的“总结报告”第四部分中明确讲到:“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② 1927年以来,中共的军事战略被划分为两个过程和四个时期^③,引人注目。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时期“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也就是洛川会议之后中共进一步提出的“抗日民族革命”,应当给予新的认识,它特别强调了在中国革命中战争的作用。换言之,从新的革命战略的发展趋势日益成熟的状况下,回归苏维埃革命根本没有必要。

结 语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维埃革命遭受挫折,中共从“生存危机”中抓住了重生的决定性契机,如“八一宣言”所示,在意识到包括沦陷区在内的中华民族意识高涨的前提下,中共对其政策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如王明所言,在中国政治趋向抗日态势的转型期,中共应将统一战线政策从以“社会”为基础,转变为以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87页。

② 《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43页。

③ 抗战初期,毛泽东认为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参见《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49~551页。

“国家”基础,这对中共政策的调整是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同时,笔者认为必须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王明(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言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其方向性和理论的展开也包含着自身的局限性,明显受到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影响。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转变政策、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时候,也伴随着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及其个人崇拜的甚嚣尘上^①。因此,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报告时,始终坚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声称是“未曾有过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促使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王明的“民主共和国”构想也是有局限性的,这也是受共产国际“七大”上对近代民主主义价值观本质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影响。笔者认为,与此相关的是,对苏维埃革命的信仰被共产国际置于核心的地位,这也是共产国际“七大”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改为“以革命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承认通过苏维埃的形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所在^②。尽管如此,王明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言论的局限性,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未能及时为中共提出相应的方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延安担任了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务。在1941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的错误,被定性为“路线错误”。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的改组中,王明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解除^③。同年9~10月的政治局会议认定,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在实质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①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415~435页。

② [日]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年版,第327~328页。

③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40、145~146、147页。

领导权^①。1945年4月,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王明作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被写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以“苏维埃革命”的概念代替“土地革命”,导致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但对给予这一路线深刻影响的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采取了谨慎回避的态度,与此同时,以抗战尚未结束为由,对抗战时期王明的问题没有论及^②。除此之外,“决议”没有提及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对中共具有绝处逢生的决定性意义以及王明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第三次左倾路线”与“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对立由此正式形成。

“决议”还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也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相类似的思想”^③,实际上就是指武汉时期所谓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胡乔木在所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也认为:“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④显然,在中共党史的认知结构中,宏观把握与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危机和再生相关的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王明在其中作用的视角被屏蔽了。

①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70页。

③ 《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④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第九章 张国焘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争论的焦点。杨奎松对此做了如下概括:

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并且在注释中具体解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对于上述说法,1983年参加前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录整理工作的丛进和竹郁发表文章,对《毛选》有关内容提出质疑。文章认为《毛选》所说并非事实,西路军本身的任务原本就是中共中央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

但丛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陈铁健的《论西路军》一文,显然都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最后还是靠徐

向前等人的支持,这些学者才没有惹上麻烦^①。

上述引用的《毛泽东选集》文章,是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而撰写的,是当时在陕北红军大学讲演“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语录和注释^②。被认为有问题的丛进、竹郁和陈铁健的文章,是在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的编辑过程中,以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和探讨研究为起点,把“国际路线”对中共中央政策所发挥的影响,编入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过程,并提出了把西路军的历史经历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割裂开来的论点^③。然而这样的提法,是对“中央已经明确做出结论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有关原则的异议”,被视为是很容易“引发势必会妨碍党内团结的争论”^④,因而有关“西路军问题”的争论被迫停止。尽管如此,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中,上述“注释”部分被改写成以下内容,这表明丛进等学者的异议实质上得到

① 楊奎松撰,丸田孝志譯:《中國共產黨史研究の歴史と課題》,大阪:《現代中國研究》第8期(2001年),第101~102页。

② 《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4、192、234~235页。

③ 丛进:《从“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注释辨疑》,北京:《党史研究资料》74期(1983年);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初探》,北京:《党史研究资料》74期(1983年);陈铁健:《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北京:《历史研究》1987年2期。

④ 楊奎松撰,丸田孝志譯:《中國共產黨史研究の歴史と課題》,大阪:《現代中國研究》第8期(2001年),第102页。

了认可^①：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达到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20,000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②。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相关论述中也对西路军的问题作了更为客观的评述^③。1935年10月，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为什么会这样呢？经过1936~1937年的重新整顿，张国焘在1938年叛党，但中共并未因此分裂，原因何在？笔者以为，上述有关西路军的争论，虽然为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素材，但是如果要了解1935~1938年间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对“张国焘的逃跑路线”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对该书的执笔、修改过程作了如下说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写工作，从1960年3月开始到1963年7月完成，送呈军委审查。鉴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占有资料的限制，送审稿对有些问题看的还不太清楚，有些历史过程的叙述还不太准确，1983年8月，由军委批准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对送审稿进行补充和修改。修改工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根据徐向前元帅指示的“正确的保留，错误的修改，不足的补上，多余的删去”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史送审稿进行全面的订正和修改。1988年5月，改编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定稿进行了审核。因此，可以理解该书有关“西路军问题”及相关诸问题的描述。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书中写道：（1）从全局战略的要求来讲，让西路军滞留河西走廊地区，失去了宝贵的时间；（2）当时，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是困难的；（3）西路军在军事行动上欠稳妥（第400~401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41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422页。

一、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长征

1. 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

在北京大学期间,张国焘(1897~1979)曾于五四运动中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1年7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并当选中央局委员兼组织主任。中国劳工组建书记部成立后,张国焘担任主任并领导工人运动。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在“二七”大罢工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国共合作初期,张国焘担任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总干事。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同年7月的改组中,仍任五常委之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张国焘受到批评,但张接受了批评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张国焘与瞿秋白一起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春,张国焘回国,赴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①。

红四方面军是于1931年11月由鄂豫皖苏区的第4军和第25军组合而成(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兵力约30,000人),曾成功击退国民党军第三次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但在1932年7月的第四次围剿中未能获胜。10月,率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人离开根据地。11月,红四方面军经鄂北、豫西抵达陕南(其间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②。12月,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向该省兵力薄弱的北部进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③。

①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42页。参见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②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③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页。

1933年2月,川陕省委和管辖五县一市的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其后,红四方面军击退了川军的“三路围攻”。7月,对第4、9、30、31军进行了改编。此后,在宣达战役中实现了与川东游击队的汇合,并建立了第33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发展成为五个军编制、兵力达8万人的部队。同时,川陕苏区也发展成为城口以西,嘉陵江以东,营山、渠县以北,陕西南部的镇巴、宁羌以南,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拥有人口480万,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1月,川军20万展开“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了“收缩阵地”的办法与敌周旋,并于1934年9月成功击退了川军的进攻^①。然而,经过长达10个月的“六路围攻”作战,川陕苏区大伤元气^②,亟待重整。

2. 中央苏区的解体与嘉陵江战役

《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对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做了如下概括:

(1)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边的作战,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取得强渡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军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0000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

(2)但是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他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这个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他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因而对中国革命前途丧失信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心；他还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①。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后段部分，是根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②这一政治性结论而演绎出来。然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的相关部分，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在此，笔者参考该部分内容，对川陕苏区的放弃，即围绕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问题，进行一些梳理。

为能使苏区红军从反击“六路围攻”的消耗和疲劳中得到恢复，同时粉碎蒋介石即将发动新的“川陕会剿”，1934年10~12月，川陕苏区先后召开了川陕省委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党政工作会议。以此为契机，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完善并付诸实施。11月，在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清江渡会议）上，确认了徐向前提出的以进入甘南开辟局面为主要内容的“川陕甘计划”。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按计划发动了以夺取广元、昭化为目的的广昭战役，但为与中央红军的行动相协调，战役于月底中断，红四方面军主力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准备渡过嘉陵江。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是按照中共中央和军事委员会22日的电报调整的。电文的内容是：（1）中央红军打算挺进川西，并在泸州上游实施渡河；（2）在蒋介石嫡系部队进川实施围剿前，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有必要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共同击退川军；（3）为此，红四方面军应在东线佯攻，由西线主力实施进攻。因此，红四方面军在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390页。

^②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发动佯攻东线的陕南战役的同时,为渡过嘉陵江进行了实质性的准备工作。其后,因中央红军在泸州未能立足,改在四川、云南、贵州省境内建立新的根据地。2月16日,接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文的红四方面军,决定执行“川陕甘计划”并实施配合中央红军的嘉陵江渡江战役作战。3月28日,战役开始,4月21日获胜。但与此同时,嘉陵江东岸地区的据点丢失,川陕苏区也告解体^①。

关于川陕苏区的撤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指出:(1)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破坏和执行“左”倾政策,川陕革命根据地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反围攻斗争^②。(2)在1935年1月4日的电文中,张国焘“暗示”了外线作战和发展新区的意图;(3)收到军委1月22日来电后,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红四方面军即准备全部渡江西进,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共同指挥^③。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的撤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国焘做出决断的正确与否,应是徐向前、陈昌浩等权力核心人物共同承担的责任。该书批评红四方面军在准备撤出过程中,“根据张国焘的指示,不适当地实行‘坚壁清野’,给人民财产造成了损失;不适当地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为四个独立师全部带走,给以后根据地坚持斗争带来困难。”^④

3. 西北联邦政府建立与懋功会师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而横渡嘉陵江的红四方面军,事实上也开始了长征。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江油附近举行了高级干部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315页。

^② 今井骏的研究认为,川陕苏区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苏维埃革命基本路线“土地革命”的不妥当性。〔日〕今井骏:《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抗日民族統一戦綫史研究序説》,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第36~84页。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

^④ 留在川陕苏区的只有刘子才、赵明恩等约300人的兵力,他们孤军奋战直到1940年1月失败。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会议,研究了作战行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讲了:(1)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2)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3)他还提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云云。陈昌浩也发了言。大家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①。

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县宣布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成立,并于30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政府成立宣言》宣称:“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部政纲!”,在此基础上,将自己定为“西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是领导者和组织者”。并确定今后的方针是“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西、甘肃,西通青海、新疆,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同时,《宣言》还规定,政府“实行民族自决,赞助回、番、蒙、藏、苗、夷民族的独立。各民族有权组织自己的政府,根据各民族自己的意志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卖国贼蒋介石和帝国主义”^②。

以川西北为据点的西北革命构想,基于如此“广大的区域内有丰富的矿山,大量的牲畜,很多的粮食,上万万富于革命热情的少数民族。在地形上来说是在中国高原地,向东南北方面发展,都是居高临下,为古来用兵必争之地,如果我们赤化西北的任务完成了,争取苏维埃中国的胜利就易如反掌”^③。这种西北革命的构想,还“要反对过去一种落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8~29页。

^③ 《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后意识,认为自己是大汉民族,回、番为蛮夷之人,不愿接近他们,忽视了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的错误观点。将西北变为我们革命的后方,是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先决条件”^①。“在川西北、川康、川青、川甘边境,有很广大的番人,平均几乎占这些地方的十分之七(羌人夷人算在里面)。”对于他们的民族工作是迫在眉睫的课题,“反对民族压迫,支持民族独立,联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喇嘛及其一部分的小土司,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汉官统治阶级”。同时,提倡成立“番人革命党”、“番人联合会”组织,政教分离,建立“番族人民政府”^②。

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懋功,实现了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红军长征也迎来了新的阶段。

二、第二中央的建立及其失败

1. 红二方面军北上与张国焘

由于红一、二方面军的会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放弃了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构想,决定继续北上,以川陕甘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③。这与张国焘等人建立西北联邦政府,以川西北为根据地,进一步实现西北革命的构想相矛盾。6月26日,为妥善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确认了中央的方针,决定“我们

^① 《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② 《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1页。有关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有关文件曾有介绍:(1)回民多居住在甘肃、青海、新疆,其中新疆的回民占90%;(2)“藏民”大多居住在西藏;(3)“番民”居住四川、西康两省,在四川的平武、松潘、茂州、理番一带,为数极多,有数十万人。另外,还有对“饮食生活与汉人相同并能讲汉语的番民”,称之为“熟番”,反之,没有汉化的称为“生番”的记录(《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今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北上……首先夺取甘肃南部,然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且,为进一步具体实施,提议夺取松藩。决定还指出:“为实现这个战略方针,坚决反对不战而逃、贪图安逸、按兵不动的倾向。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当前创建新苏区的斗争中,是极其危险的。”^①其后,中央对两个方面军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进行调整:(1)6月29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2)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代替周恩来,张国焘成为中革军委总负责人);(3)7月21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和陈昌浩分任总指挥、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第1、3、5、9军团,改编为第1、3、5、32军(第四方面军第4、9、30、31军维持原状)^②。

之后,红军未能夺取松藩。8月3日,红军越过草原地带,调整战略,制定了准备夺取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的“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第5、9、31、32军)开向阿坝,中共中央跟随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的右路军(第1、3、4、30军)朝向班佑,两路分别开始北上。29日,右路军夺取省内要塞包座后,等待左路军的北上。9月3日,张国焘建议中央改变北上方针南下,8日,进一步指示徐向前和陈昌浩,停止右路军的北上,准备南下。中共中央则于10日决意由第1、3军单独北上,红军面临着分裂^③。

纵观两个方面军从会师直至分裂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留意:第一,北上或南下主张的差异,关键在于对“番族”居住区的定位有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517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5、60~62页。

着根本性的不同认识^①,这种意见分歧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统一。中央的北上方针是以全体红军的意见加以确定并付诸实施的^②。

第二,红军分裂后,据称张国焘曾说过“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第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的话^③,以及“两方面军会合时,目睹第一方面军人员的减少和消耗,产生了对第五次‘围剿’期间中共的路线是否正确”的疑问^④,正如这些延安时期的自我批评所示,1935年6~9月期间,张国焘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持怀疑态度。

第三,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1)中共五中全会的决议征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2)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路线的改变是正确的;(3)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的军事错误,由此带来了以后的胜利,并完成了中央的战略方针^⑤。这表明,出于策略原因,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没有对以前的政治路线展开讨论。正如红军在懋功会师前夕,为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共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到上海(莫斯科)所考虑的那样,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共中央改变中央领导、改变战略方针政策的

①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基调的周恩来报告,认为“川康边地区高山深谷,生产落后,是藏族聚居区,红军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必须迅速转移。”中央的这一认识,始终贯穿于中央红军两大方面军会师与分裂的整个时期。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② 在上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里,有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的评价,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对妨碍北上方针顺利实施“倾向”的批评,并非是对包括藏族居住区的战略构想妥当与否所作的理论性评估。另外,8月5日的政治局决议,确认当前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支持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认为在中国尚未独立之前,建立西北联合政府为期尚早。参见《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方针(沙窝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8页。

④ 张国焘:《从现在看过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5~1098页。

⑤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方针(沙窝会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1页。

做法,也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红四方面军拥有多于中央红军四倍的力量且装备精良,加上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在两大方面军从会师到分裂的过程中,张国焘的作用至关重要,并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2. 第二中央的成立与张浩的调停

1935年9月的红军分裂,使得中央政治局把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周恩来,由此,第1、3军断然北上^①。陈昌浩认为,罢免徐向前和自己的指挥权,实际上是将他们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为避免红军间发生冲突,徐向前决意第4、30军南下^②。关于第二中央决定10月5日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徐向前回忆道: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到达了高潮。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

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

……不论发生大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③。

张国焘虽挂起了第二“中央”的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

① 《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454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8~460页。

没有中断同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系^①。为打破僵局,向陕北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新精神的张浩,展开了调解工作,中央和第二“中央”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决定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第二“中央”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拢、转化的结果。

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毛泽东发电报,要求“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②。1936年1月16日,张浩打电报给张国焘,双方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电文内容为:(1)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2)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3)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③。在此前后,中央秘书处打电报给张国焘,通报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对此,张国焘列举陕北中央所犯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内容,同时认为“党中央”应全面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并将其主旨电示张浩^④。根据张浩16日来电,张国焘误认为自己已与陕北、莫斯科间恢复了稳定的电信联络,确切地说是让他误解了。

1月22日,政治局断定:“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⑤,于是公开发表了1935年9月12日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页。

②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彭德怀、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86页。

③ 《共产国际派林育英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21页。

④ 《张国焘以“第二中央”名义致国际代表林育英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但此书记载这一电报发出的日期是1936年1月6日,应该是错误的,从其内容推测应为1月16日。

⑤ 《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有关张国焘错误的决议^①,表示(1)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2)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性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②。同一天,张闻天指示可以同意中央与西南局暂时保持横向关系的处理方案^③。针对张国焘提出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替代中央职权的方案^④,张浩回绝道:“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⑤

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意在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方针。第二中央的政策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对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原则性同意”^⑥,也是第二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实现。这一决议的原文虽没读过,但解释过其内容的张国焘,在《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⑦中指出:(1)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统

①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558页。

② 《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③ 《中央为党内统一解决党的组织问题致××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从电文的内容可以推断，这是封发给朱德的电报。

④ 《张国焘主张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致林育英、张闻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332页。

⑤ 《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致张国焘、朱德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⑥ 《张国焘对中央12月25日决议的补充与修改致林育英、张闻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32页。

⑦ 这个文献是1936年1月28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文章的开头称：“我们正处在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中间，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中央政治局已有一个决议。……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讨论。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释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内容。”参见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页。

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①;(2)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最广泛和最具体的形式,应当是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②。这一点在与瓦窑堡会议决议相比较时极为引人注目。至此,党中央和第二中央的政治路线上的差异,基本得到了消除。

3. 西进甘孜与民族问题

张国焘最初设想的“赤化全四川”也即控制四川盆地的打算,在1935年11月时已变得极为渺茫。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从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撤离。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从东达懋功,西至甘孜,南起瞻化、泰宁,北临大草原的范围内实施撤退。此后,红四方面军开始酝酿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③。

张国焘认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我们有着伟大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有如下发展的可能:可以在比较落后的区域,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而其冲突与矛盾特别厉害的地方首先得到胜利,使整个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与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

① 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6页。

② 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8~499页。张国焘对“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名称有过异议,指出他偏向“国防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意见[《张国焘对中央12月25日决议的补充与修改致林育英、张闻天电》(并转各中委同志)]。对此,张浩和洛甫的回答是“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系在上海北京东三省等地同时发表,此时不宜再有变更,因原则上并无不妥当处”参见:《林育英、张闻天对八方面军战略方针等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③ 在西藏的番民称藏巴,在康西的称康巴……总的名称叫土伯特族,因居住地不同而称呼各异,一般把居住在西康东北部的“番民”称为“波巴”。参见《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关于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供党小组讨论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

使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样去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还强调，“在少数民族区域中工作，倘若不经过艰苦的斗争，那么，革命胜利的获得，简直是梦想”。对于建立西北联邦政府和藏族政权及其相互关系，张国焘还做了如下阐述：

(1)我们在这里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

(2)“番人”的主要要求当然是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直至与汉族完全分离。

(3)我们已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如果少数民族单是建立土伯特族的人民革命政府那就不够了。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汉人与红军必须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西北联邦政府建立的原因也就在此。

(4)我们必须提高西北联邦政府的威信^①。

红军南下后，在炉霍、道孚、甘孜、小金、卓斯甲、党坝、卓斯甲、阿坝等地方，建立了藏族政权^②。1936年5月，有16县政权的700多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甘孜举行，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决定，选举中央政府的正副主席，创立“波巴自卫军”。《大会宣

^① 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15、420～423页。

^② 郑广瑾：《长征事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同时还尝试建立“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依得瓦”共和国、革命党、革命军。参见：《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道孚波巴依得瓦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几个条例》、《波巴依得瓦革命党党纲》、《波巴依得瓦共和国政治检查处的组织大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457～466页。

言》^①称:(1)我们的目的是“波巴独立”,眼下的课题是“兴番灭蒋”;(2)热烈欢迎赞成并支持“波巴独立”的中国抗日红军,感谢他们的诚意,与他们缔结永久的同盟;(3)汉族、回族的“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集团”,可组织自治区^②。在这个国家里,“波巴革命党”和“青年团”将发挥主导作用^③。

与“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关的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力。居住在中国的蒙古、回、藏、苗、黎、朝鲜人等,完全的自决权,即拥有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的权力,或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的权利。”^④其次,在西藏地区建立政权是极其困难的举措。有关金川的“格勒得沙”政权的实态,郭潜有如下描述:

在金川格勒得沙政府建立起来了,格勒得沙共和国也形成起来了,可是如果透彻地考察一下,这一个独立政府还不是一个完全名符其实的政权。因为很久的时间当中,番人政府是在我们工作

① 《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73~475页。

② 《波巴独立政府组织大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476页。周锡银认为,“博(波)巴自治政府,是中华苏维埃藏族(西藏)自治政府的略称,”也有“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之称。但在《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并未见到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记述。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475页。因此把波巴政府定为“自治”政府的文章亦不复存在。另外周锡银所著书还节录删除了有关“波巴独立”部分的《宣言》。参见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51、131~134页。

③ 《波巴依得瓦革命党党纲》、《波巴青年团章程》、《波巴革命党(青年团)在自卫军中的组织和作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65、478~481页。

④ 《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1934年1月第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的同志包办底下。这样就没有法子使番人从自己的经验上清楚地了解番人的独立。同样也无法去发挥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番人在政权中便完全成为一个被动的地位了^①。

由此可知,红军撤离这一地区,是导致“波巴人民共和国”丧失存在基础的最直接原因。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张国焘

1. 三军大会师与西路军的孤立

1936年2月14日,张浩和洛甫向朱德、张国焘传达了斯大林不反对红军主力挺进西北或直上北方,接近苏联国境的主张,就红四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1)为建立广大的北方根据地,随第2、6军北上;(2)加强现驻地的力量,推进夺取四川计划;(3)与第2、6军一起,开辟云南、贵州、四川地区的根据地^②。可以想像,在夺取四川计划难以实现时,向张国焘传达“斯大林的意向”,这对张国焘权衡、判断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计划,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3月15日,他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计划:

我们现在还是要相机……会合二、六军来顺利的实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战争方针。西北是一个机动的极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地区。西北离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使敌人更困难来向我们进攻;西北是敌人统治势力最弱的一环,群众最痛苦;西北有广大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的助力;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够

^① 郭潜:《关于金川工作的讨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

^② 《林育英、张闻天对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等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①。

5月25日,张浩传达了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构想^②。由此,作为“西北大联合”构想中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与第2.6军会师及其北上行动变得更加具体化了。

以陕北中央的让步和第2.6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契机,张国焘的第二中央被迫取消。5月20日,张浩提出“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③,30日,张国焘回应道:“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党中央)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④6月6日,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了“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称,中央职权短期内交由共产国际代表团行使的决议”^⑤。

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红二方面军,封存了红四方面军带来的与第二中央相关联的诸文献,拒绝张国焘提出的方面军之间重编和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并专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⑥。随后,开始北上的两个方面军,于8月上旬抵达甘肃省境内。

从三个方面军会合直到“宁夏作战”受挫和西路军遭受孤立,张国

① 《张国焘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399页。

② 《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二、四方面军诸同志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1页。

③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国内外政治形势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等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19~520页。

④ 《张国焘询问共产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共中央职权等致林育英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页。

⑤ 《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报告,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34页。

⑥ 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455页。

焘在这一过程中的言行值得关注。虽然张国焘有率红四方面军独自进入甘肃西部,或抢先西渡黄河进而夺取甘肃北部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服从了中央决定,未造成与党中央再次对立和分裂的局面。而且,他的不同想法也是以赞同党的“逼蒋抗日”和“打通苏联”这一基本路线为前提的,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方针和具体的部队调配思路,与党内的路线斗争有着“本质的不同”^①。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在红军三大方面军会师前夕,10月1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就张国焘的问题指出:

关于张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②。

毛泽东的这一发言,可以理解为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以及指挥第一方面军的彭德怀等)对张国焘的态度。11月15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规定红军“所有的具体配置和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必须绝对地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命令。为了针对具体情况展开机动作战,军委和总部不再直接指挥各兵团”^③。至此,张国焘失去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

2. 西路军的解体与批判张国焘

1935年11月底至12月初,张国焘与朱德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

^① 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初探》,《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③ 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8页。

安。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组,张国焘任该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参见第二章)。与张国焘同行的还有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学员,他们加入了红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①。由此,红军大学里对张国焘问题的发展趋势议论纷纷。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②。

想通过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西路军,在凉州、永昌和高台、临泽地区的行动缺乏一贯性,实为无奈之举,这是因为:(1)西路军的每一行动方针,都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围绕西安事变前后“三位一体”联盟的情况和动荡多变的政治情势决定的;(2)中革军委没有授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视具体情况采取对应行动的权力;(3)张国焘要求西路军忠实执行中央方针,并强调其“正确性”^③;(4)在对中央战略构想与具体内容并不清楚的情况下,要求西路军忠实执行中央方针^④。1937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文,对于理解此时中共中央和西路军的关系颇有益处。在无法打开河西走廊新局面的情况下,为避免更大消耗,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13日提出部队向青海地区转移的建议^⑤。对此,中革军委在17日的回电中反问:“你们

① 于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

② 这个讲演稿经整理、修改后,先后收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2~236页。)和《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0~244页。),然而丛进认为:如本章“前言”中所提到的有关西路军记载,在1936年12月时还不可能有。参见丛进:《从“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辨疑》,北京:《党史研究资料》74期(1983年)。

③ 1937年1月8日,张国焘打电报给西路军指挥部,表明“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张国焘关于坚强信心独立作战致西路军领导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926页。

④ 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初探》《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陈铁健:《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北京:《历史研究》1987年2期。

⑤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完成西进任务的新提议致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943页。

春缓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有关系的。”^①这个回复表明，中共中央认为到藏族居住区活动是“退却（或是逃跑）”，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认为在藏族居住区活动具有战略意义的观点相左，这种差异也决定了党中央与西路军的关系。3月中旬，西路军解体。

1937年2月6日，在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报告中，相关内容如下：

(1) 懋功会师以后，我与当时的党中央有过分歧，但这已在12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在这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从政治上的一致走到军事策略的一致，组织对立的撤销，现在我与党中央之间，没有任何的原则上的分歧了。

(2) 以前存在的不一致，起因于（我）对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后所犯的战术性的部分错误，曲解为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3) 1935年9月发生的红军分裂的责任，应由主管南下方（我）承担，而把忠实执行北方方针斥责为“逃跑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4) 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擅自另称中央，违背了政治原则，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5) 虽说如此，但视南下为失败有失妥当。尽管其行动在战略上有不利的一面，但这是在左路军北上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是在党员群众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胜利^②。

^① 《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945页。

^② 张国焘《从现在看过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5～1098页。

3月23~31日,为讨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面临的任务和张国焘问题,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31日,根据凯丰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内容如下:

(1)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豫鄂皖苏区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2)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3)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

(4)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

(5)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

(6)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1935年12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7)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窄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8)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

(9)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

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①。

4月6日,张国焘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的错误》的检讨,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完全破产”,同时向“全党同志,特别是在第四方面军曾与我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要求,“对我在党中央路线指引下所犯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②至此,中共党史中“张国焘的逃跑路线”的认知框架基本定调,同时也表明,张国焘对中共中央的彻底屈服。

至此,笔者对张国焘到达保安至全面屈服的整个过程提出几点看法:第一,通过三个方面军会合和宁夏作战,红军指挥权实现了统一,但围绕藏族居住区的战略定位,没能达成意见一致;第二,西安事变后,为促成国共再次合作,调整政策、统一意志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组织再教育,成为最重要的课题,但同时所面临的另一课题是,中央如何总结西路军解体的责任,怎样整合包括第4、31军在内的全党意志的统一?根据这些问题的结论,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界定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第三,关于藏族居住地区战略定位的问题。《决议》认定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在“错误的认识敌我力量,由此导致向西部地区无限度的退却”情况下作出的,而在西康地区试图建立藏族政权,更是“张国焘逃跑路线、军阀主义”的具体表现,是“想用大汉族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③。于是,嘉陵江战役后不久,张国焘提出重新建立以西康地区

①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168页。

② 张国焘《关于我的错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4~1135页。

③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对此,凯丰解释:(1)因为过去大汉族主义的悠久历史,不能不使番民对一切的汉人仇视;(2)如果在那时就由上而下地强制联邦政府,是不能取得番民的信任的;(3)当时提出联邦政府只能促进民族的反感,实际上只能是大汉族主义的掩盖。参见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0页。

为腹地的根据地构想。

3. 八路军一二九师改编与张国焘退党

1936年10月底,位于黄河东岸的第4.31军共1.1万人,在萧克、周纯全的指挥下开始东进,11月底进入陕甘宁根据地。因突发西安事变,两军至附近的三原、泾阳、淳化地区。

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指出:“第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中央的干部,并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第四方面军及红军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的任务。”^①两军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1937年4~6月间在援西军^②总部党委的安排下展开,就读于红军大学的方面军离职干部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西路军解体后,返回陕北的人员加入运动,以学习中央决定和相关文件的形式,通过对实践体验的重新认识和与在其他地区经验的对比,开始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确保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同时,也为在中央领导下完成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③。8月25日,军事委员会下令改编红军主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31军与陕北红军一起组成了第一二九师。9月30日,该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战场。

延安会议后,张国焘移居延安城外,与权力中枢保持了一定距离,也没有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张国焘的这种状况

① 《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② 1937年2月20日,给第4.31军和第28.32军里加了一个骑兵团,组成西援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三月中旬,在镇原、平凉地区得知西路军覆灭而停止西进。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③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该书指出,在这次斗争中不足之处:(1)对张国焘的错误具体分析不够充分,把他推行的王明路线混同为张国焘路线;(2)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张国焘路线造成的;(3)在斗争中,采取太“左”的方法,扩大了批评范围,也伤害了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

发生了变化。在1937年8月22~25日的洛川会议上,军事委员会改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国焘不再是委员会的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际,张国焘当选副主席;后因主席林伯渠调出,张国焘作为代理主席主持政府工作。在此期间,以围绕政府工作与党中央的摩擦、新的反张国焘路线斗争和王明、康生等回国为契机,张国焘决意叛党。1938年4月,在参加了黄帝陵的祭祀活动后,张国焘离开延安奔赴武汉,与中共断绝了关系^①。

4月18日,中共认为:“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②经过一系列的还击后^③,张国焘发表了《敬告国人书》^④,对自己从中共建党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和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彻底否定与清算。他表示,在生死危难之际,国家民族问题优于一切,三民主义在今日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国民党是实践抗战建国大计的领导核心,而蒋介石是全国惟一的最高领袖。并指出至今为止的中共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错误轴心”的内容概括如下:

(1)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然而中共经常根据激进的主观臆断和幻想来思维,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突出阶级斗争。

(2) 对国民革命的错误理解,导致了对国民党的错误评价。

(3) 十年来的苏维埃革命失败,中共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

① 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51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3页。

③ 《张国焘声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8页。《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答复于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新华日报》1938年4月29日。

④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仁商讨抗战建国诸问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9~1154页。

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

(4)抗战兴起后,中共虽然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

张国焘还向中共同仁提出了“善意的规劝”: (1)中共同仁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 (2)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八路军的国家化和取消边区政府); (3)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清算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引用者)。

9月,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至此,张国焘的政治生涯事实上已近终结^①。

结 语

张国焘于1937年2月向中共中央提交的自我批判书《从现在来看过去》的结尾处,有下一段话:

应当扫清“派别和小团体”等一切不正确的观点的残余,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党当前的历史伟大任务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因为党的毫无缺陷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和一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保障^②。

如前所述,这个“如一人”的比喻,是当时中央确定的纲领性文件《两条路线》最后部分的一个词,在张国焘的错误被定性为路线上的错

^① 此后,张国焘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1941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六大”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就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8年,在上海发行《前进》周刊,1948年逃亡台湾,其后移居香港,1968年移居多伦多,1979年病死。

^② 张国焘《从现在看过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8页。

误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一文中也使用过。这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斯大林的解释)”作为共同的政治信条,依据布尔什维克及其军队的纪律(铁的纪律),规范集权性党组织建立的理念,可以看作是对当时中共党员(包括在城市失去了组织联系的党员在内)所共有的集体精神(中国式的)的比喻。围绕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共的分裂与统一可以看出,由于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各地的苏维埃和红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与集权性党组织的理念隔膜,在与共产国际失去电信联系的情况下,这一理念在处理问题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通过对张国焘政治形象的考察可知:第一,从退出川陕苏区之后至西路军失败之前,把西康、青海的藏族社会纳入中共革命运动的设想,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共识;第二,张浩借共产国际权威所进行的调停工作,对于因张国焘建立“第二中央”而导致中共最高领导层分裂的弥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期间,中共中央并没有把张国焘的问题作为路线问题进行清算的政治意图;第四,在西安事变后的新形势及追究西路军失败责任的新情况下,中央通过了谴责“张国焘的逃跑路线”的决议;第五,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反张国焘斗争”,是为红四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而在意识形态上所做的准备。

第十章 毛泽东

——路线“转变”与军事问题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共党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在遵义会议全貌得以基本明晰的同时,得出此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权结论的历史脉络——20世纪3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权力状况如何——也逐渐清晰起来。

杨奎松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如下:

1. 长征前夜,反对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高度集权的毛泽东、洛甫、王稼祥集团形成。遵义会议的议题是军事路线的问题,因此,毛、洛、王中只有毛泽东才具有发言权。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是会议幕后策划者。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是个重大的转机。在这次会上,他的政治、军事才能被充分地认可,并且直接参加以后党中央的政策决断。

2. 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排序仅次于洛甫、周恩来之后。不过,洛甫不懂军事,周恩来也不能在前线履行“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者”之责,因而在中央辅佐洛甫的毛泽东,事实上就成了红军的总指挥。之后,又形成了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的“三人团”(3人军事指导小组),行使军事指挥全权的体制,由毛泽东掌握实权。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受到了张国焘的挑战,但最终因说服洛甫率中央红军北上,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威信急速提升。

3. 到达陕北后,因周恩来患病,使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权利

更加巩固。

11月,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提出的有关统一战线方针的指示,中央决定开展新的统一战线工作,洛甫把这项工作也委托毛负责。这样,毛泽东就成为军事和统战两方面工作的领导者,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最重要的领导者。

4. 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莫斯科让中共滞留苏联的干部(王明、康生、陈云等)回国,意在构建集团领导体制。其结果形成了洛甫负责党务,毛泽东主持军事,王明主管统一战线,各司其职的局面。

5. 1937年12月以后,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被决定赴武汉工作,他们与延安的中共书记处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解中共领导层不和情况的莫斯科,不得不明确表示对中共领袖问题的意见。1938年7月,蒂米特洛夫指示即将归国的王稼祥,令其组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班子。9月下旬,王稼祥将这一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在会议期间,推举毛泽东为正式的领袖气氛快速地达到了顶点,洛甫虽有意留其“负总责”的职务,但最终未能实现。1939年春以后,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第二年,洛甫将全部权限交给毛泽东^①。

在第二章中,笔者基于对中共中央领导层人事变迁的梳理,指出:(1)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是在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主席,1937年7月)的过程而确立的;(2)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权从军事扩大到政治、组织两个方面。杨奎松的上述论述,从权力中枢的人际关系中,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这一论点极有价值。

^①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91~431页。

此外,日本学者中西功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过较大变化,日本学者今井骏也对此作以更进一步的理解。他认为:(1)苏维埃时期的毛泽东,以“帝国主义间矛盾的激化,不可避免地促使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分裂、对立”的认识为前提,此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是“根据地”得以存在、发展的根据;(2)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以此为前提对国民党、游击战、根据地(以及在根据地实施的诸项政策)的功效重新定位;(3)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观点,可视为这种军事思想的过渡^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身居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即为中心军事领导,从张浩抵达陕北始至王明归国止,这一时期中共的统战工作实质上均由毛泽东负责。由此可知,毛泽东的观点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本章旨在探讨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开始^②参与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制定,后经莫斯科认可直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止确立党内领导地位与权力的过程。在此期间,毛泽东是如何审时度势直面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的?中共党内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本章还将分析毛泽东的举措,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赋予了中国革命怎样的展望?这一探讨是在参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① 今井骏:《中国革命と对日抗戦:抗日民族統一戦綫史研究序説》,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13~35页。

^②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成为五人中央局的一员。当时中共的组织尚小,同时,他在中央工作的时间也有限。因他在国民党的活动受到批判,1925年,在中共四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了中央委员的职位。1927年7~11月及1930年9月后,毛泽东一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地方工作。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升为政治局委员之后,仍然没有在中央从事领导工作的机会。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7页。

一、权利中枢的参与和军事指导

1. 苏维埃革命与毛泽东

1927年8月,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中国革命中军事问题的重要性。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过程中,红军(党的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得以确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游击战的行动方针(“十六字口诀”)以及“诱敌深入”这一保存根据地作战方针获得共识;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方针政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做法致成熟;积极探索在边远山区及农村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以求生存和发展的思路^①。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领导的城市起义相继失败,但南方农村的红军游击队却获得了快速发展。由此,莫斯科把目光聚焦在毛泽东身上,但他们又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游击战争的杰出指挥家,但农村的游击战只不过是中共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辅助手段而已。1930年,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认识转向了武装斗争,由此开始重视红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这也使毛泽东的声望大大高涨。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红军已建立了中央根据地,经共产国际的认可,作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至少在形式上,毛泽东成为中央苏维埃的最高领导者^②。

虽然如此,此时的中共革命要与实行由城市暴动夺取国家政权的俄罗斯革命方式相提并论还为时尚早。1931年秋,中共中央在从上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267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93~395页。毛泽东就任政府主席,是由总书记向忠发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的。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47页。

即将迁往中央苏区时，“留苏派”领导层还在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和“右倾机会主义”^①，双方的论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政、军实权逐渐被剥夺，不得不保持“沉默”^②。

博古不仅年轻、经验不足，留学苏联的时间也很短。由于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上海活动较为困难而被调往苏区和莫斯科，于是博古被临时委任为中共中央的总的负责人。因此，博古很难得到像张闻天和王稼祥那样年龄成熟、经验丰富、留苏时间较长且拥有较高学历的领导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权力。为弥补军事知识的缺陷，博古启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把军事战略、战争指导、训练和后勤活动等都交与李德主管。但李德既无实战经验，也不具备军事指挥才能，党内对李德的不满和批评自然就集中到了博古身上^③。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正式同意了李德提出的在不利战况下，为保存军事实力，将主力部队撤出苏区的建议。7月，李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因军事行动具有高度机密性，应组成博古、周恩来和他本人参加的“三人团”，行使全部指挥权力。博古采纳了这个提案，这一机构成为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最高权力中枢^④。

有关从“留苏派”博古与张闻天不和，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领导集体形成的情况，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期有如下的叙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

② 1933年底，在中共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准备过程中，博古等原打算撤换毛泽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因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介入，最终结果却是提升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96～397页。

③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09～410页。石志夫、周文其编：《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7页。

④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08～409页。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让我们分散于各军团（这件事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而被取消）。当时，我失去了所有权利，心中感到不平衡。有一天，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将自己的这种不满全部倾吐了出去。从此以后，我们关系亲密。他还安排我和他、王稼祥同志共居一处。这样，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的三人集团形成了^①。

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到达湘南后，毛开始给他们“解说”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些观点逐渐被接受。赢得周恩来、朱德支持的毛泽东，在渡过湘江后向中央提议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12月上旬，越过老山界后，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发生争论，即毛、洛、王开始批判中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提出应放弃与红2、6军会合湘西的计划，挺进贵州，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②。18日，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李德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③。会议还决定，在遵义地区再召开一个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关于军事指挥方面经验与教训的会议^④。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中提出的建立新根据地的构想，并规定有关“作战方针和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⑤。这一规定，是为了改变军事领导权被李德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整风笔记片段》，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439页。

③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44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编）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页。

⑤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作战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

专断的状况而采取的措施^①。

2. 遵义会议与权力中枢的变动

1月7日,进入遵义县城不久,王稼祥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与此相呼应,张闻天也提出了更换博古的建议。他们仔细研究了博古和李德保管的来自共产国际的电文,发现许多指示与毛泽东的见解相符。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再加上以莫斯科的指示为理论根据,中共中央高层确立了否定博古和李德的领导的基调^②。

1月15~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成员,由张闻天起草《决议》^③,调整中央书记处的分工,取消“三人团”(军事指挥仍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终决断权)^④。中央政治局“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按照李德的“短促突击”理论,重视阵地战和堡垒战,在军事上推行单纯防御路线^⑤。另外还有a.福建事变时,原来有可能把反革命内部的冲突作为军事性利用,消灭蒋介石主力,但最终丧失良机,b.广昌战役后,理应果断地实行战略转移,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但是未能实现,其结果是给红军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害^⑥。

(2)在博古领导下,李德推行的这种军事路线,这一路线同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4页。

③ 会议委托洛甫主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来起草决议。2月8日,政治局通告将选择这个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④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大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4页。

⑤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9页。

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①。

(3)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②。

(4)当前所面临的任务是,迅速地从阵地战转向运动战战术,确实开展瓦解白军的工作,坚持在中央苏区等地的游击战,紧密联系中央红军与第2、第6军团以及第4方面军的合作,创建由中央红军在云南、四川、贵州地区开辟的新根据地^③。

在此,我们须留意《决议》的下列几点:(1)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展开对“单纯防御路线”的批判;(2)从井冈山到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的军事指导思想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被充分肯定和认可;(3)在运动战、阵地战或堡垒战的框架内展开讨论,没有涉及游击战的定位;(4)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不稳定性是论点的前提,批判了强调帝国主义、国民党强大的博古报告,同时也肯定了原来的“总路线”;(5)否认了蒋介石直系军以外的军队成为同盟者的可能性,而应是瓦解工作的对象。

遵义会议后,在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毛泽东的军事指导受到了来自井冈山的同志和部下的批评。3月4日,洛甫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委,由其直接指挥军队。此后,洛甫考虑到日常性的议论不利于军事领导,所以同意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以掌握军事全权。不久,1军团军长林彪和3军团军长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判日趋公开化^④。5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统一了对遵义会议

①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5页。

②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③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474页。

④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8页。

以来中央的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并且确立了北上以实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①。

3. 与张国焘的争执

1935年1~4月,中共中央(第一方面军)构想在川西北、滇黔川边、黔北、滇东北、川西建立新根据地,但均未能实现。此后,他们进入四川省,认为在该省西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不大,摸索着北上挺进甘肃省南部。另一方面,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到达四川省西北部。6月,第一方面军20,000人和第四方面军80,000人在懋功会师。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确认北上夺取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作为当前的战略方针,这是第一方面军的意向(参见第二章)。

当时,第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相比,不仅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装备也非常精良。相对于中共中央领导者致力于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地位而言,张国焘及其部下却把维护自己的政治、军事权力视为统一行动的前提。这种情况给毛泽东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即同意补选张国焘的部下为政治局成员,并同意张国焘作为红军的总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来担当整个红军的总指挥,这样就引起了部分领导人的不满。再者,采取这样的措施,事实上隐含着毛泽东自身沦为张国焘的参谋角色的可能^②。

从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到9月分裂的过程来看,笔者想要确认以下两点:第一,在两个方面军即将会师之际,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前后一致的。换句话说,没有把张国焘提议的南下、西进方案作为可供考虑与选择的方案去加以讨论;第二,6月26日,在为讨论会师后的战略方针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上,“拥有军事上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作了报告和结论性总结,并在此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编)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9页。

基础上出台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①,8月20日,又对该决议进行了补充,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②。分裂之后不久的9月12日,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③。上述这些决定,所依据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与之相伴,(1)7月18日,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成为后任;(2)周恩来患病;(3)8月19日,由于政治局常务委员管辖范围的调整,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④,表明在中共的权力中枢,毛泽东的地位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军事问题

1. “国际路线”与统一战线政策

毛泽东说服洛甫,率中央红军北上抵达陕北苏区,由此,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上升。这一时期,因周恩来生病必须疗养,“三人团”也自然解体,毛泽东便掌握了军权^⑤。1935年11月,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的张浩从莫斯科到达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有关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并转告了斯大林同意红军主力向北或西北方向发展,接近苏联困境的看法^⑥。这样,如下三点便成为当前中共的主要任务:(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2)改变富农政策;(3)向苏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517页。

② 《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方针之补充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546页。

③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55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编)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7页。

⑤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9页。

⑥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72页。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54页。

蒙国境靠近(国际路线)。(1)和(2)由洛甫、(3)由毛泽东具体负责。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在此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①。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现阶段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1936年主力红军的主要作战目标,仍然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和自治区内,应尽一切可能组织、发展和联合一切抗日武装部队。

(2)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

(3)完成此任务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在陕西,2月5日前完成,第二步在山西,准备用六个月时间(2~7月),第三步在绥远。

《决议》认为,蒋介石是“卖国头子”,国民党政府军全都是“南京卖国贼军队”,以此框架为前提,提出了开展“白区士兵革命运动”和建立“抗日联军”,而且重新认识和肯定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战斗中,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并将其确定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红军应该采用的一个办法^②。

1936年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在山西省进行了东征战役。3月20~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省西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晋西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研究李德提出的红军战略方针^③。26日,会议没有采纳其主张,通过了

①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59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编)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592页。

③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439页。1月27日李德提出的意见书(1)红军的方针有可能把苏联卷入与日本的战争;(2)中共当前应该巩固和发展苏区,采取军事进攻为时尚早。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153页。

“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制定”的决议^①。27日,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的报告。即:

(1)国民党分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

(2)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于瓦解抗日阵线。

(3)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

(4)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

(5)应该把民族反革命派、民族改良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内部的诸派别区别对待(a. 不管什么派别,都要与其进行外交谈判,在基本原则不能让步妥协;b. 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c. 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

(6)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

中共不把国民党军一概视为敌人的范畴,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确定为“民族革命派”,这一应对方式,是李克农在东北军工作时,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所取得的成果的反映,这在上述的《军事问题决议》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编)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528页。

难以见到。毛泽东的报告把张学良确定为“民族革命派、右翼的‘左派’”^①。会议决定，周恩来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同张学良进行谈判^②。在4月9日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是中国政治中最为优先的任务。由此，实现了红军、东北军之间事实上的停战，并促使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经常性沟通成为可能。

4月末，中共中央得张学良决意与红军一起“反蒋抗日”的情报^③。毛泽东提出了与东北军合作，开辟外蒙、苏联之间的通道和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行动计划。5月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为西北国防政府而奋斗”的目标，以分阶段实施和抗日为口号，在红军、东北军的共同行动下，夺取宁夏、甘北，打通新疆、外蒙，实现与苏联的同盟^④。

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由毛泽东全面负责东北军与统战工作^⑤。8月9日，潘汉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即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口号是错误的，中共应在呼吁立即停战的同时，把国民党作为主要谈判对象，与其协商苏区、红军的统一问题。10月，政治局会议确认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

① 报告提及对张学良的战术，第一是“蒋张分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②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③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83～89页。

④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96页。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当前的任务是为“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而西征。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在1938～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84～85页，并拟推举张学良担任西北国防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09页。

不过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①。

2. “逼蒋抗日”方针与西安事变

对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的统战工作持反对与批评态度的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1)“反蒋抗日”的战术方针是错误的;(2)中共支持的“军阀”反蒋行动也是错误的;(3)中共应提倡建立民主共和国^②。对此,中共认为,在反思“反蒋抗日”方针、与国民党进行积极谈判的同时,团结张学良等地方势力,是促使蒋介石、国民党“逼迫抗日”的正确而有效的手段。虽然如此,因为有了这个指示,以“反蒋抗日”为标志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变得难以实现(参见第三章)。

10月9日~22日,在西川公路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改组,从而实现了红军部队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参见第二章)。12月,红军大学的教材里收录了毛泽东执笔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在对红军实行统一指挥的背景下,纠正李德和张国焘的军事指导错误,总结红军经验而写成的。文章指出:(1)中国的革命战争,与一般战争、革命战争相比,有其特殊的性质、状况;(2)“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战争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③,红军目前的敌人国民党,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政权;(3)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态是“围剿”与反“围剿”。在上述基础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关于红军迫在眉睫的战略防御任务^④。文章还对共产国际的8月指示,造成以“反蒋抗日”为标志的“西北大联合”计划流产进行了重新认识,坚信团结张学良等地方势力,联合协作,是当

① 杨奎松、杨云若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2期,第86~87页。

③ 收入竹内实监修的《毛泽东集》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2版)和《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4年2版,第337页)的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草稿,与《毛泽东选集续编》(1947年版)所收内容一致。在1936年12月时,毛泽东是否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现阶段是“抗日民族战争”,仅从这个叙述中难以判断。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2版,第83~168页。

时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逼迫抗日”的正确而有效的手段^①，并据此确认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及其特殊性，这是由红军10年来的奋斗经验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在这篇文章中有下述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朴素性的游击战基本原则，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所谓的“敌进我退，敌据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后来这些原则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时“诱敌深入”的原则被提出来，而且成功了。等到第三次围剿时，红军作战的全部原则便形成了^②。

(2)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与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与必须坚持的东西^③。

在此，毛泽东一方面承认游击战是红军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没有把它作为与运动战、阵地战并称的战争形态进行普遍化。

3.“矛盾”论与“苏维埃革命”的放弃

从1936年12月至第2年4月，毛泽东对当时在中国被视为是系统论述历史唯物论的主要著作^④——由希劳科夫和艾森柏尔古共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了评语注释，他认识到：(1)历史唯物论，必须从具体的现实出发；(2)实践是贯穿我们认识的全过程；(3)矛盾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发展，制约着其他的矛盾^⑤。毛泽东的哲

① “我们已经能够摆脱过去那种缓慢的发展和孤军奋战的状况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日]竹内實監修：《毛澤東集》第5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2版，第162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日]竹内實監修：《毛澤東集》第5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2版，第125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日]竹内實監修：《毛澤東集》第5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2版，第158页。

④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页。

⑤ 《论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一书的批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33、87~88页。

学性探索,不单单是归纳总结中共的实践,而且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具体系统地加以阐述^①。毛泽东把“矛盾”论的认识方法,运用到1937年5月苏区代表大会的两个报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③之中,就如何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内政治改革这一政治课题,以面向“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思路,提出了一个清晰的理论(参见第三章)。

三、全面抗战与领导权的确定

1.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毛泽东的“孤立”

在七七事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阶段,最大的难题是怎样才能把南京的优势转变为延安的优势。许多中共的领导人主张,把红军置于正面的防御战,与国民党并肩战斗。对此,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蒋介石实行的是军阀割据,陕甘根据地是我们的唯一立足之地,因此,保持党的阶级性和警戒性,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为保障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④。8月

① 后面的一部分即是1937年发行的油印本《辩证唯物论(讲授大纲)》,因为其曾以《实践论》、《矛盾论》名义发表而广为人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2版)所收集的“辩证唯物论”参照1946年“丘引社”出版的教材《辩证法唯物论》。参见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口:湖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664页。

② 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1937年5月3日在苏区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纲》,[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2版,第189~205页。

③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7日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2版,第207~218页。

④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77页。

22—25日，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①，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副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计3个师，45000人。

另一方面，蒂米特洛夫认为，中共中央应发挥领导作用，与蒋介石、国民党尽快实现抗日合作，但对中共领导层的力量持怀疑态度。他一边让留在苏联的中共干部回国，同时考虑把毛泽东推上中共的领导地位^②。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国共两党应遵循“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相互帮助、相互发展”的原则开展工作，尽快实现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理解与合作（参见第八章）。毛泽东开始察觉到共产国际对自己是信赖的，但同时又因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方针受到许多领导人的质疑而备感“孤立”。王明提出，建立由他自己主管的统一战线部。由此决定，党务部由洛甫、军事由毛泽东、统一战线由王明负责。这对毛泽东来说，其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有所下降^③。

2. 抗日战争构想的体系化

1938年春，从华北南下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与从长江流域北上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展开徐州会战，日军以此为契机扩大占领区域，“临时首都”武汉的攻防便成了燃眉之急。5~7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④和《论持久战》^⑤，系统地阐明了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抗战的构想。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诸多基本问题作了详细论述：（1）抗日战争是依存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2）根据中日双方的相反的特点，抗日战争必须经历3个阶段的持久战；（3）促使中日的力量

①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30页。

②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21~424页。

③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24~42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页。

④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延安：《解放》40期，第4~14页。

⑤ 毛泽东：《论持久战》，延安：《解放》43~44期（1938年7月1日）。

对比关系发生逆转,在第二阶段开展游击战对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等。

在日本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形势下,《论持久战》依据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中国最终将取得胜利,这给中国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此,有必要对这两篇文章的下述逻辑性进行分析。

第一,确立军事战略中游击战争的地位,是从遵义会议决议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上所述,在国共合作开始之初,八路军应该采取的主要战争方式,究竟是运动战,还是游击战,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混乱,其原因就在于此。1938年春以后,当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之时,明确其基本原则的必要性日显迫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的六项基本方针,就是将以前中共军队作战的经验,在新的环境下做一重新加工整理而成^①。至此,游击战正规战相配合,在根据地得以推广,并且可以应用到承担运动战的正规军中去。

第二,这一构想把国共两军作为中国军一概而论。这样,毛泽东就以双方正规军对峙的局面为前提,在其大后方和日本军占领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视为统一的整体。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虽然是游击战,但在有利的条件下,也不排斥运动战”这一八路军方针的正确性。同时,又提出了抗日抗战构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可分割的观点,即:

(1)要坚持统一战线,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战争,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抗日统一战线,是全人民的统一战线,绝不只是几个政党的本部和党员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队,全体人民参加统一战线,是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②

(3)决定抗日战争趋势的是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为不影响根据地

^① 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毛泽东分为:(1)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与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的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6个部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延安:《解放》40期,第5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43-44期(1938年7月1日),第40页。

的建立和游击战获得支持,要执行合理负担,保护商业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当地政权和游击队不得破坏这个原则”^①。

第三,在1937年1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以及统一战线原则下的独立自主这一原则问题”坚持了自己的观点^②。如《论持久战》所示,抗日战争的开展,必然促使中共势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提出“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性的决战,务必回避”,“应该认真履行武汉等地的防卫任务,能否防卫好这些地方,取决于有无以全国军民广泛的政治动员为基础的诸项条件”^③。这种对形势的认识与王明等中共长江局有所不同^④。

3. 六届六中全会与领导权的确定

9月29日至11月6日,根据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中共中央要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共产国际精神的指示,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10月12—14日)以及总结报告(11月5—6日),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和决议,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报告和决议是以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权的认可为背景,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的抗日抗战构想的理论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第二,对“抗日民族革命”胜利的希望,是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角度来论证的。而且,这是将既是工业基地,又可与外国取得联络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后方,与中共主战场的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统一权衡、把握后而提出的;第三,报告以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性特点和制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质的认识为前提,提出了长期合作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的方案。毛泽东对这个共和国的解释,是拥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和人民代表者会

①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解放》40期,第11页。

② 在1943年11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的发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延安:《解放》43~44期(1938年7月1日)第37,40页。

④ 王明等把武汉防卫比喻为,当时成为欧洲焦点的西班牙内战马德里的防卫,并提出建设拥有新式武器的数十个师团,是颇为紧要的任务(参见第八章)。

议的国会、地方议会的“既不是苏维埃、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①。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新构想的提议而不同于把通过普通选举产生的全国议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民主共和国”。他还提出作为长期合作应有的组织形式,是把国民党改组为民族联盟(包括中共在内的各个党派,在保持其组织独立性的同时,可加入国民党);或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推举蒋介石为最高领导者)^②。由此可知,这个民族联盟应该被认为是构成“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诸政治势力的统合体;第四,在军事和政治构想上承认中国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民族的形式加以实现^③——这一构想已成为可能。同时,这也表明遵义会议是中共主张成为现实的转折点^④,而且为面向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论的确立提供了前提条件^⑤。

结 语

综上所述可知:(1)遵义会议事实上认可了在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中经毛泽东整理而形成的诸观点,并将之确定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2)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延安:《解放》57期,第15、25~29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延安:《解放》57期,第27页。

③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延安:《解放》57期,第36页。

④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延安:《解放》57期,第35页。

⑤ 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大纲〉》(1937年9月),毛泽东对中共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归纳总结,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推论性考察,获得了综合理论性框架。进而,他在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就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态是军队。并对在中国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流血的转化”,做了事实上的否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主编)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年12月)中,把游击战视为与运动战、阵地战并列的战争形态,并未被常人理解,因而它具有过渡的性质;(3)1937年5月,毛泽东基于“矛盾”论的认识方法,形成了面向抗日抗战的态度,并立足于中国政治的新动向,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4)1938年5月~6月,毛泽东通过《论持久战》,提出了涵盖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的军事构想,通过对包括国共两军在内的中国军队的把握,确认了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及游击战在这场战争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5)六届六中全会以农村保卫城市这一视角,展望了“抗日民族革命”的前景,并确认军事构想和政治构想的中国特殊性质,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国共间的军事摩擦日益明显。伴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纷纭变化,尤其是把欧战视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苏联,敦促中共与国民党以“长期合作、合作建国”为目标,改变和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构想。相对于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而言,中共的军事优势不断增加。1940年初,中共确立了以无产阶级领导为前提,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走向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并把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加以体系化。其主要内容:(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采取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式,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2)通过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革命的诸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均有所不同;(3)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中共应该发挥领导作用,促使革命成功^①。

中共军队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1940年8~12月),促使日军强化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次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安徽省南部袭击了中共军队,酿成了“皖南事变”,由此国共关系趋于恶化,国民政府停止了对中共军队的财政援助,同时对根据地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这样,抗日根据地陷入了艰苦的困境。面对危机,中共在根据地社会实行政治上、经济上的资源再分配,在政治领导方面,实行“自下而上”的方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延安:《解放》第98~99期,第22~40页。

法,以达到党组织、政府机关、军队、群众团体的一体化,完善中共领导,以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党内思想意识(整风运动)。1943年3月,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规定对书记处会议讨论过的问题,“主席有最终决定权”^①。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②中指出,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他们垄断着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压迫农民、工人、小资产者和自由无产者,提出建立排除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内的联合政府。也就是说,国内阶级关系对立的轴心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人民”,而中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党,因此,其前提只能是建立“人民”的联合政府。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③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④。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固定下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431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日]竹内實監修:《毛澤東集》第9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2版,第183~275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36页。

④ 《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终章 20世纪30年代 中共的危机与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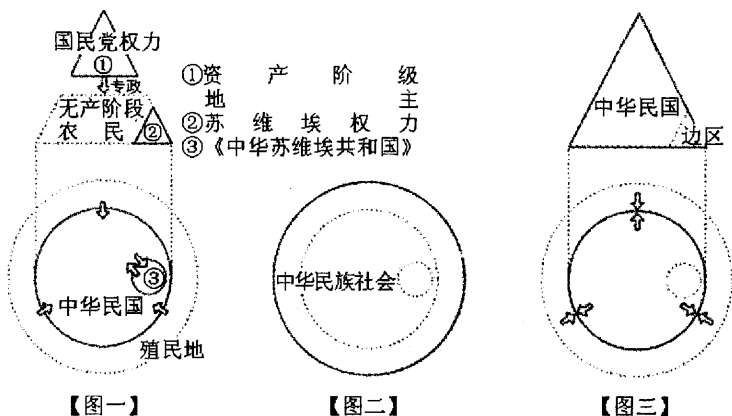
1. 中共的新生与“抗日民族革命”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为前提的。一方是代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而另一方是与之相对立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但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历程,即从“革命的高涨”(1931年)到“全民族的革命危机”(1932年)再到“直接的革命形势”(1933年),却反映了中共在把握建国时机和对形势的认识的僵化性,即脱离现实^①。究其原因,既有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左倾路线的影响,又有把作为地域权力而在中国一些多省交界地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视为“近代国家”的误解。而且,这种错误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政权进行“阶级的决战”的胜利,看作是抵抗日本侵略中国(抗日)的前提(图一)。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和统治空间的丧失,意味着苏维埃革命路线遭受挫折。

此时,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共,以“八一宣言”为指针,探讨包括殖民地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社会的新危机(图二),面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各项政策的调整改革,重新构建“党、军队、政府”关系。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中共获得了“新生”(图三)。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下的中共权力,就具有了两面性,既有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方政府的一面,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地域权力的一面。中华民族社会的概念,可能出自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及会上的王明报告,同时,中共为实现国共再次合作进行了政策调整,在苏区大会上,运用《矛盾论》原理的

^① 古里高利夫·阿·埃姆:《在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感召下所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71年版,第293页。

毛泽东报告即是明证。那么,王明与毛泽东报告(1936年)的共通性意味着什么呢?



[王明]我是中共党员,对于中国问题,我的言论和行动要对中共和中国人民负责。我虽然暂时滞留莫斯科,但我的言论与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个政党,在其胜利的过程中,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而决不能代表俄罗斯人民并提出政治主张,同时也不可代替共产国际职权,而只能是为中国民众的利益而发言^②。

二者的发言,均强调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人民”、“民族”、“爱国主义”等民族性价值观,并且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殊情况来决

^① 王明:《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关于中俄同盟及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反蒋派别之间的关系问题》,巴黎:《救国时报》33期。

^② 毛泽东:《特殊问题》(埃德加·斯诺记录,杨德译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定所有的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①。由此可知,“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扣所获得的“抗日民族革命”的认识,以及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确认的军事、政治构想的中国特殊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是这种观念的延续。

2.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与中共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城市里得以恢复。当时平津地区适逢“一二·九运动”高潮,以1936年救国运动的发展为背景,正在形成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平津地区党组织的新生,得益于日本军华北分离工作造成的“政治性空白”和共产国际新方针的传播,是以中共直接领导的地下组织为基础,通过开展“一二·九运动”得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那里有革命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可以栖身的租界,共产国际新方针在上海的传播,使左派知识分子和已经失去组织联系的许多中共党员,聚集在救国会运动里。这个组织是半公开性质的,是由左派知识人士和中共党员共同分担的统一战线组织,其目标在于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各政治势力携手合作,最终于1936年夏在中国政治上成功地创造了新的潮流。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后,在西安却显示了另外一番景象,虽然没有平津那样的“政治空白”,也没有租界,却有“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的庇护来推动中共组织的重建。

20世纪30年代中期,承担中国政治的各政治势力——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地方实力派”、中共以及推动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左派知识分子——虽然各自立场、观点不同,但在其基本的主张中都吸收了“抗日”、“抗战”的理论^②。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放弃中共问题的军事解决方针)的政治过程,就是这四种势力的政治主张统一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理论下的过程。被中共抗日民族

① 《共產主義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執行委員會の活動について:決議》,村田陽一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6卷,東京:大月書店1983年版,第162~164頁。

② 有关国民政府的“抗日抗战”论,參照[日]今井駿:《中國革命と對日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史研究序説》,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130~182,210~240頁。

统一战线政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救国会运动,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发生了新的本质性变化——“地方实力派”与中共的联合,使其基础更为牢固,最终发展为群众性抗日运动。因此,“三位一体”是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政治性质的象征,并且以“三位一体”为背景的中共旨在政治统一全国的国民党间的谈判,必然推动中国政治走向“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战初期,中共以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为目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作为中华民国基本方针的《抗日建国纲领》^①的制定,但《大纲》在部分方面与中共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共同之处。中国政坛以“临时首都”武汉为中心形成的抗日高潮,成为这一过程的有力支撑,而强力推动运动发展的,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这一系统。

有关中共在“抗日时期”转折阶段(1935—1938)的白区斗争,下述几点可以确认:第一,从华北事变开始,日本大举侵略中国,迫使中国政治开始变革。而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新方针的传播对平津地区、上海、武汉党组织的新生,发挥了原动力的巨大作用;第二,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迫使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早日破产并陷入危机,得到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有力支持的“三位一体”,也逼迫国民党放弃军事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在抗战初期武汉的抗日高潮中,国民参政会确立《抗日建国纲领》为中国政治的基本文献。在诸如此类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都发挥了不可或缺乃至中心的作用;第三,决定“抗日时期”中国政治转向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包括城市所有阶层在内的政治运动;第四,“抗日时期”的中共,将城市各阶层都纳入开展政治运动的范围,但本书的考察对象仅仅是“转折期”。可以说,毛泽东以国共重新合作为目标的抗日抗战构想的体系化,是将这些白区斗争的成果和由此带来的中国政治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而进行的。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影响

我们姑且可以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抗日民族革命”这

^① 《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

一认识的获得,以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于军事、政治构想的中国特质的确认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带来的成果是1940年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即中共的革命战略的体系化。但问题是1936—1937年尽管提出了暂缓或放弃苏维埃革命,但是为什么代之而来的革命战略并不是“抗日民族革命”呢?再者,对于苏维埃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想的在“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共产国际解散,直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①,逐步形成中共党内公认的意识形态^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安井三吉所指出的在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中共革命路线得以确立的观点,切中了问题的关键^③。

关于苏维埃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历史决议》在对中共“六大”进行评价时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决议》认为,该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即把中国革命界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提出了《十大纲领》,但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革命发展不均衡性的认识上,也“存在缺点和错误”: (1)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评价和对策; (2)大革命(国民革命)失败后,对有计划、有秩序的撤退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and 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④。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第952~1003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当初,并非得到全党的赞同,参见今堀誠二:《中國の民衆と權力》,東京:勁草書房1973年版,第14页。另一方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头部分提到:“我党成立以来,就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第952页。

③ 安井三吉:《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中國共產黨の“路綫の確立”》,東京:《歴史評論》243期(1970年)。

④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8页。

的构想,必须以放弃苏维埃革命为前提,在基本上继承六大的政治路线的同时,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代替其“缺点和错误”,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构想趋于体系化。“井冈山原点说”和以此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史的“定论”,都具有上述结构与内容,并由《历史决议》得以确立。

在度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危机并成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中共建立并扩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具有地方政府和地域势力双重性质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它是由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各阶级联合专政”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权力^①及其社会,其创造的主体是中共。中共以列宁“帝国主义论”和“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认识为前提,缺乏继承近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合理性的理论,换句话说,因为忽略了其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权力)形式上的差异,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还不能被看作是打上“民族国家”烙印、以“现代化”为志向的社会^②。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在确立军事和政治构想的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开拓和管理的空间。1942—1943年,中共一边维持包括地主在内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一边在这个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推动阶级斗争,酝酿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的“农村革命”。在提出“减租减息”口号的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的“清算斗争”,激发农民群众与地主展开斗争,意欲创造和维持前者优于后者的政治格局。1944年秋冬,中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延安:《解放》98~99期。

^② 今堀誠二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的目标点,是在民族主义所规定的抗日根据地社会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分析其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但整体来看,其关键词正在逐步实现政治的、经济的近代化。该书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不失其研究的卓越价值。这个社会“民族主义”、“现代化”由于接近西欧的理解,故该书对抗日根据地情况的描述,让人感觉与实态之间存在偏差。(参见今堀誠二:《中國の民衆と權力》,東京:勁草書房1973年版)。在这一点上,必须把抗日根据地视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田中恭子对此的描述是:抗日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方式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天地,那里的群众并非像今堀所说是民族主义的体现者,他们只不过是中共的革命过程中被迫参与并被利用而已。田中恭子:《土地と權力:中國の農村革命》,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6年版,第430页。

共开始实施彻底的减租,彻底清除旧统治阶层的权力与影响,因而出现了要求确立农民权力的群众运动的激进化现象。其结果,解放区的土地所有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地区作为阶级的地主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在权力构造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村政府将旧统治层一扫而尽,同时农会、党支部和民兵队组织了起来。通过这些组织与工作队,中共的权力渗透到了农村各个角落^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构想在抗日根据地得以实践,亦同时适用于白区的工作:(1)与国民党谈判;(2)与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的精英阶层之间合作的探索;(3)以《新华日报》、《群众》为媒介展开宣传报道活动。这些构想,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史的最后阶段(1945~1949年)围绕着宪政和建国、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矛盾为主要内容的中共政治活动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国家权力、扩大抗日根据地的空间,同时也是中共政权构想的具体实践^②。

另一方面,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而构建的中共体制下党政军关系,在1946~1954年间,从内战爆发经新中国成立直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发生变化。在确定这一过程中党政军关系性质时,笔者认为下述三点值得注意:(1)1948年11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对外时使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一名称^③;(2)实行剥夺各民主党派政治独立性的人民代表选举(1953~1954年);(3)1955年1月公布《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④。1946年后,随着内战爆发,蒋介石强制实行“训政”向“宪政”的转变,在他就任总统(1948年5月)后宣告完成。而面向新国家政权构想的中共,采取了具体而适时的

① 田中恭子:《土地と權力:中國の農村革命》,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1996年版,第79~126頁。

② 西村成雄:《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二〇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東京:研文出版 1991年版,第145~297頁。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446頁。

④ 矢吹晋:《巨大國家中國のゆくえ:國家・社會・經濟》,東京:東方書店 1996年版,第117~121頁。

应对策略。此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以中央局为中介的党领导军队的组织体制,在内战时期四大野战军编制的基础上,发展为建国初期的六大行政区,形成了新的党政军关系。1954~1955年间,与此对应的中央局取消。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胡耀邦提到民主革命时期的两个“历史性转折”: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向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向抗日战争兴起的转折。由此强调从粉碎“四人帮”(1976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转折,直到以否定文革为基调的《历史决议》发表的整个过程,都具有“历史性转折”的意义^①。1997年的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中,列举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经历的三大历史性巨变:(1)辛亥革命;(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3)改革开放。阐述了各个不同时代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报告还提出了中共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前提的“毛泽东思想”作了如下概括: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原则。经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和“七大”,确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建党24年经验得出的历史性结论^②。

这表明,围绕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危机与新生的“井冈山原点说”为基础的观点,对于“改革开放”时代正确处理所面临的诸多政治课题,仍然作为一种坚固的架构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1)1985~1986年

^①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间,从“爱国统一战线”、“一国两制”政策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①,是以“中华民族社会”的“发现”为契机,旨在实现类似“八一宣言”前后的经典性转折的逻辑论述^②; (2)2001年,以“三个代表”指导思想为标志的江泽民讲话更增强其理论性,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作为“全民族的先锋”,中共同意接受所有爱国者入党的方针^③,翌年8月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④。这足以证实,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共的发展轨迹,不仅仅停留如上所述的结论层面,作为值得参照的历史经验,它对当前的中国政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邓小平在1984年6月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参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1页。另外,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把“第三次国共合作”确定为当前具体的政治课题,是在1979~1992年的时期。参见[日]田中仁:《楊奎松報告に對する問題提起》,大阪:《現代中國研究》第8期(2001年)。

② 邢国华:《从抗日时期敌对阶级的联盟到新时期的“一国两制”:国共合作的新发展》,北京:《中国现代史》1985年8期。王克非、郑学风:《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与新时期的“一国两制”》,《中国现代史》1985年11期。孙欲声:《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中国现代史》1986年1期。黄景芳、关志刚、刘建武、欧阳国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一国两制”》,《中国现代史》1986年5期。

③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1页。

④ 姚柏林:《熔炉的断想:议论风生》,《人民日报》2001年8月2日。同样的论述有纪玉祥:《不断深化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7月5日。冷落:《总结党的历史,推进党的建设》,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7月10日。李永忠:《“纯粹”与“笔直”:思想纵横》,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8月9日。

参 考 文 献

[本参考文献以中、外文分类,先作者后论著名称,均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A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1927~1937),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B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武汉:编者1985年版。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武汉大事记》,武汉:编者1985年版。

[日]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3卷,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版。

[日]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4卷,东京:汲古书院1974年版。

[日]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5卷,东京:汲古书院1975年版。

博古〔秦邦宪〕:《为了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博古同志在七月八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瑞金:《斗争》第69期。

C

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陈广湘：《抗战时期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上海：《党史信息报》1988年7月16日。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5期。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陈铁健：《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北京：《历史研究》1987年2期。

陈夕：《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编纂概况》，《现代中国研究》1999年4期。

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程玉海、田保国、林建华、张维克：《青年共产国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武汉、重庆、南京）》，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参政会纪实：1938～1948（武汉、重庆、南京）续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丛进：《从“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辨疑》，北京：《党史研究资料》74期（1983年）。

D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F

方晓主编:《中共党史辨疑录》(新民主革命时期)上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冯雪峰:《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G

盖军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高文华:《关于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若干历史情况》,《党史研究资料》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郭利民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

郭潜:《关于金川工作的讨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郭晓平主编:《中国共青团史:1922~1992》,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郭绪印主编:《新编中国现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2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和

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3期。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H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1911~195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

何虎生、李耀东、向常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

湖北政法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抗战法制文献选编》武汉: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华飙、周维强、张政明、汤丽霞:《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1987年1期。

黄然:《关于1933年上海中央局的回忆》,《党史资料丛刊》22期(1985年)。

黄景芳、关志钢、刘建武、欧阳国庆:《第二次国共合作方式的实质是“一国两制”》,《中国现代史》1986年5期。

黄景山、张京民:《“二战”时期中共北京(平)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北京:《北京党史研究》1992年5期。

黄明发:《关于红军西征战役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研究》1986年3期。

黄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6期。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潘汉年编辑组编:《回忆潘汉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J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发言》，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2期。

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北京：《党史研究》1985年4期。

纪玉祥：《不断深化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7月5日9版。

江山、胡民新、黄朝章：《宋绮云》，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金戈、鲍小牛、刘彤璧、奥存才：《宣侠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北京：《近代史研究》1986年1期。

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2期。

K

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

凯丰：《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哪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抗战初期长江局专题组编：《抗战初期长江局大事记》，1983年版。

L

冷溶：《总结党的历史，推进党的建设》，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7

月10日5版。

李葆华：《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二月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简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李敬谦：《杨明轩》，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良志：《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第1期（1989年）。

李起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李权时、皮明麻主编：《武汉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李新、陈铁健：《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李勇、张仲田编：《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统一战线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李永忠：《“纯粹”与“笔直”：思想纵横》，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8月9日9版。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李传信：《论宋子文在国共关系中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编：《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北京：《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凌辉：《张文彬》，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刘杰诚、张飞军、余清泉：《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

1987年1期。

刘建业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陆象贤主编:《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M

马红:《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马宇平、黄裕冲编著:《中国昨天与今天:1984~1987国情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版。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未完)》,瑞金:《斗争》22期。

米鹤都:《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诺言问题》,北京:《党史研究》1986年6期。

米暂沉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穆欣:《林枫》,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P

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1840~1949》,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彭瑞复:《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北京:《党史资料丛刊》5期(1980年)。

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璞玉霍、徐爽迷：《党的白区斗争史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Q

瞿越：《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讨论观点综述》，北京：《中国现代史》1989 年 3 期。

R

人民出版社编：《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 1 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人民出版社编：《一二·九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

S

上海高校专题组：《上海地下党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梗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新四军研究会上海高校专题组编：《上海地下党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战资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申伯纯：《南汉宸派我与杨虎城联系》，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申晓云：《新桂系与西安事变》，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盛雪芬、车树实：《“西安事变”前后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北京：《中国现代史》1985 年 10 期。

施金炎主编：《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口：海南国际新闻

出版中心 1995 年版。

史亚璋：《“一二·九”运动中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北京：《党史资料丛刊》5 期（1980 年）。

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宋柏主编：《北京现代革命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宋春主编：《中国的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宋黎：《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回忆“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宋新勇、刘杰诚、李敬谦：《杜斌丞》，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孙党伯：《郭沫若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孙晓村：《“真堪衡岳比芳芬”：沈衡老对救国会的卓越贡献》，《沈钧儒纪念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孙欲声：《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北京：《中国现代史》1986 年 1 期。

T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唐宝林：《“八一宣言”最早传入国内的途径和时间》，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1 年 3 期。

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W

王炳南：《代序言》，米暂沉整理：《杨虎城将军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王桂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抗日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

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

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王金铨主编：《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王锦侠、张奇：《两广事变与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2期。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克非、郑学风：《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与新时期的“一国两制”》，北京：《中国现代史》1985年11期。

王庭科：《红军长征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汪新、刘红：《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王秀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北京：《中共党史资料》46期（1993年）。

王毓英、杨存厚：《何功伟》，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编：《湖北英烈传》第1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仲清：《关于长江局的作用、功过问题》，上海：《党史信息报》69期（1988年11月1日）。

王自成、胡新民：《陕甘宁边区历史简述》，北京：《中国现代史》1987年3期。

武可贤、孙志敏、郭桂英编：《简明中共党史辞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编者1985年版。

武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市历史学会编：《抗战中的武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武汉：编者1985年版。

武敏、姜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介》，史先民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X

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邢国华：《从抗日时期敌对阶级的联盟到新时期的“一国两制”：国共合作的新发展》，北京：《中国现代史》1985年8期。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Y

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杨奎松、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北京:《近代史研究》1989年1期。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

杨奎松:《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姚柏林:《熔炉的断想:议论风生》,北京:《人民日报》2001年8月2日。

药英、段建国:《王世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药英、冯凯:《南汉宸》,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2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殷子贤、曹雁行:《1935年10月〈秘密指示信〉考》,北京:《近代史研究》1990年3期。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余鼎章、杨拯英、李宁:《试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研究会编:《西安事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于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美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Z

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版。

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章立凡:《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广州:《人物》1984年1期。

章立凡:《章乃器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张琦:《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与共产国际》,北京:《党史通讯增刊》1986年1期。

章绍嗣、胡水清、程克夷、刘炳泽、阳海清:《武汉抗战文艺史稿》,武

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张树军：《张国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张维桢、韩念龙、周林：《1936年上海反日大罢工回忆》，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0辑（1985年）。

张维桢、韩念龙、周林、朱学范：《上海反日大罢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张玉法：《东华历史丛书：中国现代史》（第9版），台北：东华书局1988年版。

赵世臣：《西北地区统一战线建立述略》，张铁男、宋春、朱建华主编《中国统一战线大事记事本末》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赵舒：《张闻天与瓦窑堡会议》，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5期。

赵振军、温瑞茂：《中共中央在陕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郑广瑾：《长征事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大事记：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简明词典：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河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1920~198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0~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武汉市总工会、共青团武汉市委、武汉市妇联、武汉市民生局编:《武汉风云人物》,武汉: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地方历史简编:1919~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西安事变前我党就联合抗日问题与张、杨

部联络谈判的一组文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33辑（1990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一二·九运动史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资料组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编：《统一战线工作手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1978~1998年》,《中国共产党文献资料库》(CD—RO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第 15 册),编者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1 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99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救国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4、7、8、9、10、11、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简编》，北京：《近代中国人物》3辑（1986年）。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林：《1936年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北京：《党史资料丛刊》5辑（1980年版）。

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周忠瑜：《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北京：《中国现代史》1989年12期。

朱德：《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朱铃、张先智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峨眉：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上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4辑（1986年版）。

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第5、9、10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2版。

竹内实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东京：苍苍社1984年版。

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初探》，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

* * *

日文資料与论著：

池田誠、田尻利、山本恆人、西村成雄、奥村哲：《中國工業化の歴史：近現代工業發展の歴史と現實》，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

石島紀之：《中國抗日戰爭史》，東京：青木書店，1984。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卷，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7。

今井駿：《中國革命と對日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史研究序説》，東京：汲古書院，1997。

今堀誠二：《毛澤東研究序説》，東京：勁草書房，1966。

今堀誠二：《中國の民衆と權力》，東京：勁草書房，1973。

白井勝美：《日中戦争の政治的展開：1937年～1941年》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4卷（日中戦争・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

内田知行：《閩錫山の民衆統制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國史における社會と民衆：増淵龍夫先生退官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3。

王檜林著，田中仁譯：《抗日戦争史研究におけるいくつかの問題》，大阪：《大阪外國語大學學報》74～73，87～99。

郭沫若著，小野忍、丸山昇譯：《抗日戦回想録：郭沫若自傳》(6)，東京：平凡社，197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

鹿地亘：《火の如く風の如く：解放への道》，東京：講談社，1958。

加藤哲郎：《コミンテルンの世界像：世界政黨の政治學的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1。

ククシキン・カ・ヴェ著，國際關係研究所譯：《コミンテルンと中國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1935～1943》，東京：國民勞動運動研究所編《コミンテルンと東方》，共同産業 KK 出版部，1971。

久保亨：《“天安門”以降の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東京：《歴史評論》500號，1991。

グレゴリエフ・ア・エム, 國際關係研究所譯:《コミンテルンとソヴェトのスローガンのもとに行われた中國の革命運動: 1928 ~ 1930 年》, 東京: 國際勞動運動研究所編《コミンテルンと東方》, 共同産業 KK 出版部, 1971。

グレゴリエフ・ア・エム, 毛里和子譯:《パヴェル? ミフ: ソヴェート革命の戰略を練る》ソ連科學アカデミー極東研究所編著(毛里和子、本莊比佐子譯)《中國革命とソ連の顧問たち》, 東京: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1977。

國際勞動運動研究所編, 國際關係研究所譯:《コミンテルンと東方》, 東京: 共同産業 KK 出版部, 1971。

曾田三郎編著:《近代中國と日本: 提攜と敵對の半世紀》, 東京: お茶の水書房, 2001。

スメドレ・アグネス著, 高杉一郎譯:《中國の歌ごえ: 改訂版》, 東京: みすず書房, 1972。

高杉一郎:《中國の緑の星: 長谷川テル, 反戰の生涯》, 東京: 朝日新聞社, 1980。

竹内實監修, 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0 卷, 東京: 北望社, 1970 ~ 1972。

田中恭子:《土地と權力: 中國の農村革命》,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1996。

田中正俊、野澤豐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7 卷,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8。

中西功:《中國革命と毛澤東思想》, 東京: 青木書店, 1969。

野澤豐編:《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 東京: 汲古書院, 1995。

西村成雄:《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 二〇世紀中國政治史の新たな視界》, 東京: 研文出版, 1991。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 7 卷, 東京: 勁草書房, 1973。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部會編:《中國共產黨史資料集》第 8 卷, 東京: 勁草書房, 1974。

姫田光義：《中國革命に生きる：コミンテルン軍事顧問の運命》，東京：中央公論社，1987。

姫田光義編著：《戦後中國國民政府史の研究：1945～1949年》，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

平井友義：《ソ連の動向：1933年～1939年》，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4卷（日中戦争・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

平野正：《中國の“第3勢力”の系譜をどこに求めるか》，東京：《中國研究》99，1979。

平野正：《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救國運動から抗日民族統一戦綫へ》，東京：研文出版，1988。

古廩忠夫：《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戦綫の形成と發展》，東京：《歴史評論》243，1970。

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對中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古屋哲夫編：《日中戦争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

古屋哲夫：《日中戦争》，東京：岩波書店，1985。

水羽信男：《抗日民衆運動の展開とその思想》，池田誠編著：《抗日戦争と中國民衆：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査部：《抗日民族統一戦綫運動史：國共再合作に關する政治資料》大連1939年版。

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4卷，東京：大月書店，1981。

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5卷，東京：大月書店，1982。

村田陽一編譯：《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6卷，東京：大月書店，1983。

安井三吉：《抗日民族統一戦綫と中國共產黨の“路綫の確立”》，東京：《歴史評論》243，1970。

安井三吉：《盧溝橋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

矢澤康祐：《1930 年代中國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と反帝國主義》，東京：《歴史學研究》279, 1963。

矢吹晉：《巨大國家中國のゆくえ：國家・社會・經濟》，東京：東方書店，1996。

楊奎松著、丸田孝志譯：《中國共產黨史研究の歴史と課題》，大阪：《現代中國研究》8, 2001。

横山英：《辛亥革命研究序説》，廣島：新歴史研究會，1977。

李良志著、田中仁譯：《西安事變後の7回の國共交渉》，《中國現代史研究會通信》46、47、49：1989～1990。

李良志著、田中仁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樹立における王明の役割について》《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2, 1990。

* * *

田中仁：

《王明(陳紹禹)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論の形成について》碩士論文，廣島：廣島大學，1981。

《王明(陳紹禹)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論の形成について》，廣島：《史學研究》158, 1983。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をめぐる王明と中國共產黨》，東京：《歴史評論》423, 1985。

《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北京：《党史研究》1986(6)。

《中國共產黨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理論の確立》，池田誠編著《抗日戦争と中國民衆：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義》，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

《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理論的確立》，中國人民抗日戦争紀念館編研部譯：《抗日戦争與中國民衆：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

《國民政府時期、轉換期の上海における中國共產黨の組織と活動》，大阪：《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1, 1990。

《從“一二・九”到“八一三”時期的上海地下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

室編:《中共黨史資料》45,1993。同載唐寶林主編:《昨日的革命: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中國革命史中青年學術獎獲獎論文選》,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

《路綫轉換期における中國共產黨の根據地構想》,橫山英、曾田三郎編:《中國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統合》,廣島:溪水社,1992。

《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陝甘寧根據地構想的演變》,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

《1930年代における内モンゴル自治運動と日中關係》,松田武、阿河雄二郎編:《近代世界システムの歴史的構圖》,廣島:溪水社,1993。

《中國革命の歴史的再検討》,上原一慶編:《現代中國の變革:社會主義システムの形成と變容》,京都:世界思想社,1994。

《華北事變與中國共產黨在平津地區的組織和活動》,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黨史研究》85,1994。

《華北事變と中國共產黨:平津地區における組織と活動》,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現代中國》68,1994。

《武漢における抗日高潮と中國共產黨》,今永清二編:《アジアの地域と社會》東京:勁草書房,1994。

編著:《王明著作目録》,東京:汲古書院,1996。

《中國共產黨の組織再編をめぐる一考察(1934~1938):政黨・軍隊と“國家”》,アジア政經學會:《アジア研究》44~4,1999。

《1930年代なかばの西安と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における“地方實力派”の位置づけに関する一考察》,大阪:《現代中國研究》5,1999。

《楊奎松報告に對する問題提起》,大阪:《現代中國研究》8,2001。

后 记

一部书出版时,著者或译者都习惯于写一篇后记,把它问世的经历写出来,既是一种心情渲泻,也是一种学界“时尚”,更是一段友谊的见证。

与田中仁教授相识已有二十余年了。1991年8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当时作为硕士研究生的我,与田中先生初次相识。由于有师生之别,我认识他,他并不一定记得我。之后,田中教授多次赴天津、北京查阅资料 and 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共同的学术兴趣把我们逐渐拉到了一起。我知道他是本中国现代史学界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位名家,也曾拜读过他的论著,对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学术追求深为佩服。

2003年我赴日本爱知大学任客座研究员,有了与田中教授多次见面交流的机会,也读到了他的新作《一九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深为一位日本学者如此细致而系统的研究、新颖的观点而折服,田中教授想将此书译成中文以便与中国学者交流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于是我邀请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赵永东副研究员(日本立教大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刘柏林教授共同进行第一步的翻译工作。初稿译出后即与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并得到该社的大力支持。在送审过程中,又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贵祥研究员、王爱云副研究员多方帮助,素未谋面的审稿人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意见,对于此后的修改帮助极大。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生刘晖、赵永东先生和我,又再次对初稿进行了全面修改,终于有了现在的稿本。

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周俊旗研究

员、编辑高潮女士等人的大力帮助,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使得此书得以迅速出版。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作为译稿的组织者,我还要感谢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西村成雄教授等很多关心、帮助此书出版的学长和朋友。

我们希望,这部书能使中国学界了解日本中共党史学界的动向,也希望它能成为中日两国学术交流、友好的象征。

江沛识于南开大学

2007年7月5日